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BIANZHENGWEIWUZHUYILISHIWEIWUZHUYI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艾思奇 著

A I S I Q I Z H U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上篇 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第三章 物质和意识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第五章 质量互变规律

第六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第八章 认识和实践

第九章 真理

下篇 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学说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人类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发展的最高成果。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对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人类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作一初步的研究。

一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要跟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打交道，也就是要认识这些事物并且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这些事物。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些事物就得到一定的了解，形成一定的看法。起初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了一定的看法，然后眼界逐渐扩大，终于对世界的本质、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等形成一个总的看法。这样，人们就有了一定的世界观。这种认识发展过程，在任何人的头脑里都会这样或那样地发生的，所以世界观是人人都会有的，不过一般人不是自觉地、系统地掌握着某种世界观罢了。各派的哲学，就是各种世界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

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观点就是人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对于整个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因此它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它所研究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

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下面这些问题，就是哲学所要回答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从来就是物质的世界，或者在物质世界之前已经有某种精神力量存在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中，它们是怎样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主观意识、精神生活同客观世界、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有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凭空产生出来的，或者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们的意识能否正确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世界，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等等。

人们的世界观是多种多样的，从古到今，哲学家们对世界作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彼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归根到底，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到底世界的实质是物质，还是精神；到底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到底物质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思想对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我们的感觉、表象和概念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如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哲学史上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线：唯物主义的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路线。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在回答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即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

东西，把精神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主观意识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质。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对于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都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反。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着所谓“世界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产物。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共同的，即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

哲学史上的哲学派别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不能越出上述两条路线之外。一切哲学派别，归根到底，不是属于唯物主义营垒，就是属于唯心主义营垒。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企图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各自独立、互相平行的世界本质。它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因此在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

唯心主义的萌芽，在蒙昧无知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中间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灾害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由于知识极端贫乏，对这些灾害的来源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因而把它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这就是原始的宗教世界观，其中就有着唯心主义哲学的萌芽。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其社会根源就是阶级剥削制度本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剥削阶级承担着全部沉重的体力劳动的担子，社会、国家的管理事业，科学、文艺的创造活动，通常都为剥削阶级中的人们所垄断。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由于日益远离生产实践活动，总是夸大精神活动的作用，把它绝对化。他们颠倒地考察现实生活，似乎不是劳动者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料，而是他们为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似

乎不是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而是精神生活决定物质生活，把精神、意识看作宇宙万物的根源，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

唯心主义能够在阶级社会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还在于这种哲学反映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可以为他们的统治辩护，因此，一般说来，剥削阶级在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时候，总是要把唯心主义哲学提到唯一合法的地位上，给这种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以各种有利的条件。历史上的某些剥削阶级或其中的某些集团，当他们还能代表一定的历史进步的倾向而和反动没落阶级作斗争时，也可能支持和提倡唯物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人们对于周围事物认识发展的产物。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人们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然界，逐渐意识到周围事物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这种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阶级社会中，经过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加以提高和理论化，就发展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一般地说，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发展中处于革命和进步地位的阶级、集团相联系的。这样的阶级、集团，不满足现状，要求改变社会和发展生产，因而要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地位使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或迟或早会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肯定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主观意识则是第二性的。

因此，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对立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总是具有阶级性、党性的，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一切哲学派别都是直接地

或间接地为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哲学中的一定的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政策的哲学表现。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有社会的根源，也有认识论的根源。唯物主义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而唯心主义则是不正确的。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并且能够长期和唯物主义竞长争高，除了因为有剥削阶级的支持以外，还由于人们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着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如果把认识过程的某一片断（感觉、表象或概念等等）加以夸大、绝对化，使它脱离物质现实，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们，正是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把在人类认识过程中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建立了这种或那种唯心主义的体系。列宁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人们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把这种意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地加以夸大，以至于误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可以任意地创造出周围的事物来，这就是在实际上把主观、意识摆到第一性的地位上，因而也就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全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哲学史上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的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内部的矛盾性。相反，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一切事物看成彼此孤立的和永久不变的，加果说到变

化，也只是限于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变更，而不承认事物的实质的变化；并且硬说一切变动的原因在于事物外部的力量的推动。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或形而上学不是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就是与唯心主义相结合。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能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底。因为客观世界不仅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而且是永恒地变化、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源泉在物质自身。因此，只有对世界作辩证的了解，才能如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貌，才能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形而上学的观点，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不能说明物质自我运动的源泉，就给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曾经严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宗教，但是由于它不能对世界作出完全合乎科学的解释，因而不能够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和宗教。另一方面，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正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才能使辩证法得到合理的发展。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由于受到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总是不彻底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才能包含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彻底的辩证法。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存在了几千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这些唯心主义曾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发生过影响，在世界观方面腐蚀工人阶级的队伍。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在哲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伯恩斯坦等人，就公开地接受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受到反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影响的代表，就是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哲

学著作，来同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流派极其繁多，如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哲学、存在主义、新托玛斯主义等等。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曾经在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有过很大的影响。这些哲学体系之间虽然有某些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各种诡辩，把世界说成是人的感觉、表象的总和；否认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宣扬不可知论等等。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地就是批判了这个流派。

唯物主义哲学从来都是在同唯心主义哲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了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通过了对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发展的，并且以后还要不断地在这样的斗争中继续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同时学习如何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如何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还必须参考哲学史上几千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二 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的历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斗争的历史。

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具体形式，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唯物主义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经济制度、阶级斗争和科学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在奴隶制社会。手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实际需要，引起了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力学、地理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有可能摆脱氏族宗教观点的束缚，把包含在这些科学知识中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加以系统化，创立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一般反映奴隶主中的某些进步派别的利益，它遭到依靠传统宗教维持其地位的保守集团的极端仇视。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哲学家宣扬唯心主义，维护宗教迷信，反对先进的自然科学观点。哲学一产生，立即展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万物不是神所创造的，而是某些具体的原初物质变化发展的结果，一切事物又可以还原为这些原初物质。例如，中国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些原初物质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印度的研婆伽派认为，是地、水、火、风（四大）；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是水、火、气、土，或其中的某一种，等等。中国西周末年的史伯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指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希腊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微小不可分的原子构成的，不同形状和不同重量的原子构成不同的事物。唯心主义者柏拉图反对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他认为，“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路线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古希腊社会中先进的奴隶主民主派和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的反映。

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春秋时代的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宣扬天命论，维护传统的宗教仪式；他的“仁”的思想是为奴隶制的“周礼”辩护的，他提倡“中庸之道”，抹杀矛盾，反对变革。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整理工作。战国时代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唯心主义，他主张“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和孔孟唯心主义相对立，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实际上包含着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有其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思想。当时，和儒家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还有墨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和法家的韩非的唯物主义学说。

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一般的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但是它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把统一的世界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些具体的物质形态，第二，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具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它肯定世界是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其中万物皆变、皆动、皆生、皆灭。它并且初步估计到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冷和热、阴和阳、正和反等）的相互作用和斗争。

古代的某些唯心主义者也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如中国春秋时代的老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老子关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包含有相互依存的、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物极必反（“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物壮则老”）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古代辩证法的思想也是朴素的、直观的。它只描述整个世界的一般性质，不了解构成世界的各个个别部分，它对世界一般性质的了解，也不是完备的、清楚的。

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各门具体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们还不能把客观世界的个别部分，从世界的总的联系中抽取出来加以分别研究，因此，哲学也不能建立在对各门具体科学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而不得不带有直观的、朴素的性质。

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以后，直到清朝，封建社会继续了两千多年。这个时期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儒家唯心主义学说。但是在这个长时期内，代表着反对大地主阶级专横统治、要求生产力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势力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未停止过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例如，汉朝时的王充彻底否认了有人格的上帝的存在，用天和地都是物质的实体，自然界的发展是万物本身的自然状态的观点，反对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政权神授”的唯心主义思想，并尖锐地批判了关于宗教迷信、人的灵魂不死的谎言。南北朝的范缜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发展了唯物主义。他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思想，论证了精神是物质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佛教的灵魂不灭和因果报应的宗教迷信。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反对韩愈认为“天”能赏善罚恶的唯心主义观点，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天”的含义，肯定客观事物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宋朝以后，

程（程颢、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陆（象山）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逐渐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这就是宋明理学。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理”和“气”、“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明代的王廷相，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颜元，清朝的戴震，都是反对唯心主义“理学”的唯物主义者。历代的唯物主义者，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向前推进了唯物主义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方面，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另一方面，运动发展、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也在发展着。例如王船山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把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代表，他从内部矛盾的观点出发，论证了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辩证法思想。

在欧洲中世纪，是天主教占绝对统治的封建主义时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在直接为宗教和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内部，仍然展开了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这就是承认事物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所以马克思说：“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唯实论则相反，认为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并产生具体事物。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表现形式。

十五世纪欧洲的意大利，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的神权统治。反映到哲学思想上，形成了同封建的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直接对抗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上

半叶，欧洲的工商业和科学文化的中心，从意大利移到了英国、尼德兰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在英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培根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给以唯物主义的概括，肯定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是感觉经验，肯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并且初步估计到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但是，培根和洛克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带入了哲学领域，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欧洲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为着认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规律性，自然科学家首先是对自然界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对于有机体的研究，则采取解剖的方法，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是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经的阶段，它为以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大发展准备了基础。“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在这个阶段，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除了力学、数学之外，都还是很不完善的，唯物主义哲学要依靠自然科学的成就来解释世界，也就不能不受到自然科学发展不足的限制。这就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的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不带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八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以后，放弃了唯物主义哲学，宣扬唯心主义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把一切事物都看作只是存在于人的感觉领域之内的幻影，宣称：“存在就是被感知”。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拉美特里、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们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公开地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反对灵魂不灭的迷信，向宗教世界观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思想斗争，他们发展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有以下一些局限性。它是机械的，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企图用纯粹力学的原因来解释一切现象。它是形而上学的，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物质世界。它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人的意识、意见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这些局限性，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同时，也是由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革命的作用。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德国也酝酿着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德国经济比较落后，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达，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勇气，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对封建统治者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法国大革命所掀起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斗争风暴，也吓坏了德国资产阶级，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会在革命中壮大起来，掉转枪头向资产阶级开火。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哲学上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唯物主义，而是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的辩

证法的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这时，经验的自然科学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形而上学不能依据这些资料的内在的联系加以整理。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形成辩证的思维方法，从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发展上进行研究。恩格斯指出：康德的天体演化的学说第一次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但是，辩证法只是在黑格尔那里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所谓“绝对观念”，并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绝对观念”派生出来的。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在于：从运动中，从辩证的发展中，考察“绝对观念”。黑格尔以一切都在运动发展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是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猜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他的辩证法是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相矛盾的。黑格尔认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达到完成阶段的表现，这种观点违反了他自己的辩证发展的观点。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是在唯心主义体系内被窒息了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日益成熟，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唯物主义的兴起。费尔巴哈是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杰出的唯

物主义者。他坚决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在自然观方面，他坚决维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原理，彻底否认了在物质以外独立存在的精神。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在社会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反映这时已经成为独立的力量而走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适应着这个要求而出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十九世纪中叶，在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产生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吸收和发展了西欧先进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他们不仅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对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但由于当时俄国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哲学思想终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到来。由戊戌政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到辛亥革命之间，出现了许多在当时代表资产阶级进步要求的先进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等。他们极力利用他们所能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点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来说明世界。他们的世界观中，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唯物主义倾向，他们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顽固保守派思想，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斗争。但是，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特别软弱，而且它一出现就进入了迫切的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中国没有能够出现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思想。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思想中也混杂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因素。

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只有到了出现了近代大工业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可能产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产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技术都达到了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的。在欧洲，十九世纪初期，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在各国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也就随之成长起来。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表现了独立的行动，如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等等。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愈益尖锐的历史时代，革命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德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发挥其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德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创始人。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自然科学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时不只力学和数学，其他许多重要部门，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以搜集材料为主的阶段已经结束，人们已经发现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许多重要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发观，使人们对

自然界一切现象之间的辩证联系和对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大踏步的前进，使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产生提供了牢固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特别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推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产生的两个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综合以前人类的一切优秀思想成就并加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辩证法的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继承了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采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伦理的杂质，批判地采取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革命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过去一切哲学中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和过去的哲学比较起来，在性质上也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更高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哲学的不同，首先在于它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使它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前的哲学，是产生在科学发展比较低级的阶段。自然科学还不能阐明自然界现象各方面的相互联系，至于社会科学，最多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那

时科学的全部成就，还远不能给世界发展的全貌提供出一幅完整的图画。以认识世界的总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哲学，在那时虽然也力图利用每一个时代科学的最大成就，但终究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成果来完成它的任务。为着描绘世界的全体，那时哲学家就必须在许多方面，凭借自己的逻辑方法来进行推演，以补科学所提供的材料之不足。这些哲学家往往企图站在科学之上，独立地创造一套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把这种哲学叫做“科学的科学”，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应该、而且已经穷尽了世界的一切知识，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体系看做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顶峰。实际上，这样的体系，虽然也对当时的科学成就有所概括，但都包含着大量的主观臆测的成份，其中虽然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天才的臆测，对于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有过重大的贡献，但同样也包含着许多不明确、不合理的、甚至于荒谬可笑的东西。总的来说，这样的哲学体系，终究经不起科学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考验，它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共同弱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完全新的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已经开始能够用确实可靠的知识来为人们描画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迅速变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以及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里材料的积累，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已有可能发现真实的联系，排除臆造的、人为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以前那种大部分要依靠主观的逻辑推演来构成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哲学，那种所谓“科学的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时哲学的任务，只需要对已获得的全部科学知识及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总结，这样就能够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获得一个全面的了

解，就能够建立一个不同于过去任何哲学体系的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完全从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它反过来又成为指导科学的研究和实践的普遍原理，成为科学的方法论。以前的哲学只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哲学家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世界给予各种各样说明的思想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哲学的不同，还在于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用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造旧世界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绝大部分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个别的哲学学说表现着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它们都不能指导人民来为根本改变旧世界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变革世界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不承认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把它说成是代表全人类的。实际上他们的哲学思想绝大多数都只是反映着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并从属于这个阶级的政治任务，真正人民群众的思想要求和这些哲学是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公然地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公开宣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为反对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罪恶制度服务。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在阶级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情形下，硬把某一种哲学思想说成是全人类的思想。马克

思主义认为，隐蔽自己的哲学的阶级性，不但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模糊无产阶级哲学的实践任务，因此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把自己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空谈什么全人类的哲学，但无产阶级的哲学的确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广大人民群众的哲学。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历史上所实现的一个革命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有高度的革命性，又有严格的科学性。列宁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上述这些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式，成为最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密切地结合起来，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它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一切知识领域，特别是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以前的唯物主义都不曾真正解决如何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问题。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指导人们对一切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思想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但它并没有结束哲学的发展，相反地，它是在更高的基础上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

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象以前的哲学那样把自己看成包罗万象的绝对完成的知识体系，它是科学的哲学，它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严格地依据着各种科学成就，依据着人类的历史斗争经验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经验的。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要不断地丰富起来，不断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而且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行的斗争中，在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地概括了当时的科学成就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从各方面阐发了他们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的地位。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以及它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的斗争中，恢复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并且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在哲学上和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最腐朽的哲学潮流——以马赫主义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潮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深刻地批判了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列宁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天才的论述和创造性的发展。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深刻地

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列宁的全部思想是同国际的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所创立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照亮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列宁逝世以后，列宁主义的思想继续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从这个原则出发，进行了反对各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制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概括了新的历史经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帝国主义

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

通过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手中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全世界工人阶级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最后彻底埋葬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新的历史实践必将越来越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正确性，并将使它得到更大的发展。

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以及一切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并以它为指导来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为一切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政策的理论基础。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地分析了客观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实际斗争的经验，找出了工作和斗争

中的客观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制定出党的路线和政策。我们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精神，自觉地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自觉地科学地从工作中总结经验。

为了做好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各门科学是分别地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给科学研究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能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而不致在总的方向和大的关键问题上犯错误。对社会的研究，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成为完全的科学；特别是在当前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今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就不可能在社会研究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时候，必然自发地倾向唯物主义，不然他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科学上的成就。但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是不巩固的，列宁说：“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也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的研究中彻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自发地树立起来。就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也不会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必须经过学习，才能防止和克服来自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和各种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才能避免在重大问题上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错误，才能使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巩固起来，并提高到科学的程度，树立起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至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更要经过努力来根本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和克服旧的世界观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在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侵蚀我们的思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反复的。国际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用它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对抗。美国前国务卿赫脱说：“共产党宣传他们的原则，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原则与共产主义相抗衡。与马克思主义相反，我们主张世界的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的主要精神力量，人类生活的真正的动力是神，是内部的精神力量。”现代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在哲学上取消党性原则，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以反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我们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有力地抵制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为了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达到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也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学习马克

思主义哲学，必须同改造非无产阶级立场和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结合起来，必须坚决树立起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决心。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我们要在革命实践中，紧密地联系现实生活，联系群众的斗争，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用“有的放矢”这个比喻来指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的实质。毛泽东同志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作指导，具体地分析我们周围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找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和固有的规律性，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实际的范围很广泛，有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革命斗争的实际，有劳动生产的实际和科学实际的研究，以及个人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等等。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实际问题，都必须从具体材料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加以分析研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学习如何运用，就要努力运用学到的理论来研究和说明一些实际问题，来总结工作、检查思想。只有这样逐步地做去，才能锻炼自己领会和应用哲学武器的能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变成自己的东西。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应当同学习各门具体科学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学习和研究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但它

并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具备有关的具体科学知识。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果认为只要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结论，而无需再去吸取广博的科学知识，那无疑是错误的。

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

认真读书对掌握理论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只停留在书本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就会把活生生的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采取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学习理论，即使把许多词句和条文背得烂熟，也还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决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有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学习怎样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到实际中去，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轻视理论，满足于某些个人的和局部的经验，是违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另一种倾向。采取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可贵的，但绝不能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解剖刀来分析和总结各种具体经验，才能把零碎的、片段的经验提高为系统的理论。

只要我们认真地努力学习，正确地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革命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上篇 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唯心主义把世界硬说成是意识、精神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也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后者虽然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不能认识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发展着的过程。要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要研究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联系，以及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

一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的物质性。世界上的千差万别、形形色色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态。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

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成果，都证明了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性。

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都体验到外间世界的客观存在。农民种地，要和外界的土地、种子相接触；矿工开矿，要和矿山、岩石作斗争；人们为着维持生活，必须取得食物、饮料、衣服、房屋等生活资料；人们对反动派进行革命斗争，要受到反动势力的抵抗。这一切生活的实践，都使人们要和周围的事物相联系，相斗争，因而也使人

们认识到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之外，有着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凡是没有受过系统的唯心主义影响的人，都有可能从生活实践中得到这样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唯物主义哲学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和提高了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种朴素的认识。

哲学唯物主义是和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新的成就，都给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提供了新的证明，都使反对宗教迷信和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赢得新的阵地。

自然科学证明，整个宇宙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物质，能够依一定的规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任何一种物质形态都是从另一种物质形态转化来的，物质是永恒存在的，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在有意识的人产生以前，地球早已存在了几十亿年，地球有着自己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太阳系和整个宇宙天体，绝非象有神论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和“地上世界”完全不同的“神的世界”。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制成第一台望远镜并用它观察天体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无情地摧毁了神创造世界的迷信思想，逐步地证明诸天体和地球同样都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精神而存在着的物质的东西。每个天体都有自己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他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只能用物质本市的原因去说明，用不着任何神学的虚构。

生命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具有一些和无生物显然不同的特点。有的唯心主义者认为，只能用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力”来解释生命的存在和运动过程。其实这只是用理论的形式精巧地伪装起来的宗教迷

信观点。自然科学证明，生命是自然界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物质形态，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是蛋白体在一定自然条件下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过程。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一切生物——无细胞结构的生物、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的有机体，植物和动物——存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了解了新陈代谢规律，就基本上了解了生命现象，根本用不着把那种莫须有的“生命力”作为说明的依据。

达尔文根据极其丰富的材料证明，现在的一切动植物的物种，都是由单细胞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动植物所以获得现有的特性和机能，能够基本适应周围的环境而得以维持其生存，是由于遗传和变异的交互作用，由于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结果。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上帝的创造和智慧，只是物质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达尔文还指出，人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方面，也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使类人猿变成了人，这样，就出现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史。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形成了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一种不由人们自由选择、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物质生活而独立存在，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就说明：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神支配的、或者是由人的精神任意创造的唯心主义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上面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都证明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证明了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上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现象，都是物质的各种不同形态的表现。永恒存在的物质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无数物质形态的统一体，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

除了千差万别的无数物质形态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唯心主义否认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把世界的一切看做是精神或意识的产物。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因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贝克莱说：“物质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即是被感知”。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杜威说：“世界是我的观念，我的活动，我的经验”。事实上，自然界并不是在有了“我”的心、“我”的观念和感觉出现以后才有的，而是在“我”的心、“我”的观念和感觉还没有存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在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存在着，自然界是这个精神的表现，是它活动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在宇宙形成之先有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产生了物质的“气”，而后演化出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这是用哲学语言精制了的宗教创世说。恩格斯说：“……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不论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我们的实践经验都证明，精神现象决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离开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是根本没有的。

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统一于物质，它指出，精神现象只是某些复杂的高级的物质形态的属性，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则相反，它认为世界统一于

精神、意识，物质是精神活动的表现，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哲学史上的二元论者如笛卡尔、康德等，想使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调和起来。二元论认为，世界不是统一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来自一个根源，而是来自互相并行、各自独立存在的两个根源，一个是物质根源，一个是精神根源。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它肯定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前面已经证明过，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二，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二元论不能不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在说明这种联系时，二元论总是把物质说成是消极被动的，而把精神力量说成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并且往往把这种独立存在的精神力量和神的力量看做一个东西。因此，二元论归根到底必然倒向唯心主义。

世界统一于物质，但不是说统一于某几种特殊的物质属性、物质形态或物质结构。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包含着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一切物质形态都依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每种物质形态都有其特殊的属性和结构，而与别的物质形态相区别。所以，世界的统一是无限多样的统一。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物体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最简单的、不可分的基本单位，原子的某些物理学的属性——如延伸性、不可入性、具有一定的质量等，是物质唯一不变的根本属性。这种观点不能说明无限丰富的物质现象，不能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

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所谓“物的不变的实质”、“绝对简单的实体”等形而上学的说法。客观世界是变化发展的，物质特殊的结构、属性和形态也是可变的、无限多样的。任何物质的特殊结构、属性和形态都不能成为物质的唯一不变的特性。

“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列宁给物质概念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是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它既反对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也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观，整个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实在。不管它的特殊形态、属性和结构千变万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形之下，它都保存着这个唯一的“特性”。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关于物质具有某些“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物理属性的说法，是经受不住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考验的，它也抵抗不住唯心主义的进攻，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物理学上发现了某些元素的放射性现象，并发现了原子中有电子等更小的微粒，推翻了原子不变性、不可分性的观念。这些伟大的发现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一些受形而上学思想支配的物理学家却由此作出了“原子非物质化了”的错误结论。唯心主义乘机向唯物主义发动了进攻。例如马赫主义者打着“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的招牌，歪曲物理学新发现的真正意义，利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困难，大叫“物质消失了”，“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了”。然而，现代物理学的新成就不但不能成为马赫主义的依据，而且是对马赫主义的最好驳斥。物理学的新发现并不能说明物质本身会消失，只是说明以前人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界限正在消灭。列宁早就指出，绝不能把物质的特殊结构、属性和形态同物质本身混为一谈，把物质的原子的特性同物质的客观

实在性混为一谈，把人们以前对于物质的认识界限的消灭，误认为物质本身的消失。“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所驳倒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它所证实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尽管电子和原子性质不同，但电子和原子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穷尽的。在电子发现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科学预见。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电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只具有一定质量和电荷的质点，它的质量会随着运动状况而改变，从现代物理学理论看来，它的电荷还应有一定的分布，除质量和电荷外，它还具有磁矩和自旋。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电子是有特殊结构的。不仅如此，电子除具有颗粒性以外，还具有波动性，这一重要发现更使我们认识到电子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物质客体。电子只是基本粒子中的一种，目前知道的基本粒子已达二百多种，它们除了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如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颗粒性之外，还各具有其他特性，表现为不同的“同位旋”、“奇异性”等等。在各种基本粒子之间还发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过程。总之，物理学越发展，就越显得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已经把基本粒子（包括电子）的一切特性都认识完了，这样，就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断。

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曾大肆宣扬马赫主义的“物质消失了”的观点，列宁给予了彻底的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如法国的列斐伏尔又来公开地修正列宁的物质定义，说什么“物质是一种‘X’（未知数）”，并且认为它在我们的论断中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实践和科学证明，必须以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考察为依据，才能对问题做出正确的论断，只有对客观世界有了正确的认识（论断），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某些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物质说成是不可捉摸的未知数，说成是在

我们论断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其目的就是要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否认人们的认识必须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依据，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宣扬主观盲目性、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以阻挠、破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二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根本属性，物质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处于运动中，运动是物质存在最根本的形式。

科学的全部成就都证明，物质世界的一切，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整个宇宙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无一不在运动着，无时不在变化发展着。就每一个物体来说，它内部的原子在不停地运动，原子核外的电子不停地围绕原子核旋转，原子核内部的中子和质子也是不断地运动和转化的。没有这些运动，就没有原子和原子核。地球和太阳系其他行星围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同时围绕着太阳运行，太阳本身和其他恒星也在宇宙太空中不停地运转。没有这些运动，就没有太阳系和宇宙中千千万万的星系。每一个生物有机体，无论动植物机体或者人的身体，都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没有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运动，就没有任何的生物有机体。社会生活也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没有一个社会形态是永远不变的。没有社会生活，社会形态的不断运动、变化，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不能脱离运动而存在；同样，运动也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不能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也不能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

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说到运动，就必须问，是什么在运动。运动必须有运动的主体，没有任何主体的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就是认为运动的主体是非物质的，就必然要把某种精神力量看做运动的主体，这样就走到了唯心主义。朱熹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从而产生出自然界来。他断言，在没有自然界之前的运动，就是“太极”的运动。王阳明的弟子钱绪山认为，主观意识是宇宙的本体，运动只是意识的运动。他说：“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黑格尔把世界的发展看做“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万物都在运动，但只是在概念中运动。”这些就是唯心主义运动观的典型例子。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唯心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离开物质而存在的精神力量，在世界上是根本没有的，因此，同物质运动完全脱离的“绝对精神”的运动，也是不能设想的。精神的运动，概念的运动，是依赖于物质运动的，它是人脑这种高级物质的运动形式，人脑对客现存在的反映。

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宣传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荒谬观点，是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方式。十九世纪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所创立、现代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所复活起来的“唯能论”，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唯能论”者硬说物质转化成了某种非物质的“纯粹能量”，因而，能“代替了”物质，物质“消失了”，认为能是唯一的“世界实体”。现代“唯能论”者更利用电子和正电子可以转化为光子的发现，大肆宣传“物质变成能，物质消失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光子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是不以人们的意况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是不能抹煞的客观事实。光子具有能量，也具有质量，正

如电子具有质量，也具有能量一样，这正是表现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唯能论”者抹煞这个真理，设想有什么离开物质客体而单独存在的“纯粹的能”，这就是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唯能论”者宣称能是所谓“纯粹符号”，是由意识、精神决定的，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唯心主义面目。列宁说：“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不理解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归结为它的某些特殊的属性、结构或形态，认为这些属性，结构或形态是永远不变的；他们不理解物质自己的运动，把运动看做只是由外力所引起的物体的位置移动和数量增减。这就在实质上否认了物质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否认了运动是物质内在的根本属性，也就是离开运动去思考物质。不承认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就会在物质以外寻找运动的源泉，就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例如在力学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牛顿在寻求物质运动的最后源泉时，便得出了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的结论。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但不否认物质世界中有着某种静止状态。静止状态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承认静止状态，并不否认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静止的东西。事物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时期，具有质的稳定性，在这个阶段和这个时期，它的性质基本不变。例如某个生物机体在它没有死亡以前，总是这个生物，资本主义制度在它没有经过革命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以前，总是资本主义制度。这种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生物体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资本主义制度处于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不断运动中；而且生物机体

总是要死亡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要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这里的静止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事物的运动发展还没有使它变为另一事物以前的一种运动形态。某一物体在地面上位置没有移动，在力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处于静止状态中，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以及全部太阳系的运动，也完全没有妨碍组成这一物体的分子、原子的运动、变化。这里的静止状态也只是表现运动中的某一物体和某种其它物体的空间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而已。

上述这些情形都证明，事物的静止不变的状态只是相对的，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我国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就已猜测到了这个道理。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他否认“废然之静”，即绝对的静止。绝对静止不变的事物，只是形而上学者的错误的幻想，在客观世界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永恒的、绝对的物质运动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相对的静止状态。“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物质所以表现为千千万万的不同形态，正是由于它们有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只有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才能区别事物，才能认识和把握千千万万的事物的具体形态，才能分别对不同事物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否则就会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瞬息万变、无从捉摸，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

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即否认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例如中国的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他把生和死，可和不可之间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从而抹煞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它们之间的质的差别，得出了“是亦彼也，彼亦此也”的结论。又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

底鲁认为万物只是一阵旋风，因此他拒绝给事物以名称，按照他的意见，“什么也不能说”。赫拉克利特根据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克拉底鲁却修改他老师的意见，认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一条河流。克拉底鲁也是由于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而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泥坑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同辩证法之间毫无共同点。列宁说：“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泥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则把静止和平衡加以夸大，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把暂时的状态永恒化，陷入了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的错误思想。

物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同物质不可分的运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物质的运动归结为只是物体的位置移动或数量的增减，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运动观，指出物质的运动不仅限于机械运动。恩格斯说：运动“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根据现代科学已达到的认识，宇宙中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可以归结为五种基本形式。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形式。在每一种基本运动形式中，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运动形式。物质的运动形式和物质形态一样，是无限多样的。各门科学就是以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对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具体的

分析研究，不能象机械唯物主义那样，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无限复杂的物质现象。

各种运动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摩擦生热、生电，就是机械运动转化为物理运动。热引起燃烧，物理运动又转化成了化学运动。在地球发展过程中，物质经过长期的机械的、物理的、特别是化学的作用，逐渐形成愈来愈复杂的化合物，出现了蛋白质，产生了生命的运动。由于生物长期的发展出现了类人猿，在劳动中类人猿变成了人，产生了人类社会的运动。

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也就是说，运动是不能被创造或被消灭的，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物质运动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力永远不会丧失。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上述原理，它指出：在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前后，能量的总数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把这个定律叫做“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我们在科学实验室里能够准确地测定多少热能可以转化为多少机械能、化学能、或电能等，同时可以用热能的单位去测量机械能、化学能或电能等，反之亦然。在生物运动中，我们可以计算出生物在同化和异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能量和所放出的能量，并且可以用任何能量单位表现出来，通常我们是用热量单位来计算的。

在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中，各种物质运动形式是互相交错的。高级的运动形式必然包含着低级的运动形式，但是高级的运动形式决不能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低级运动形式的本质特点。例如有机体的生命运动，一刻也不能离开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然而，认识了生命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并不等于了解了生命本身。要了解生命的本质，必须把握生命运动形式所特有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性，如新陈代谢、遗传变异等等。这些运动形

式，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过程。机械唯物主义者把物质世界复杂多样的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显然是完全错误的。现代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如新实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等，都是把社会这种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生物的运动形式，例如新实在主义者霍尔特就认为，引起阶级斗争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生理情况和心理素质不同。这是形而上学的，并且是唯心主义的。

三 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物质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着的，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之外的物质运动是没有的。

当我们说到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时，首先要指明它在什么地方存在，它具有多大的规模或体积，这就是指事物的空间地位或它的广延性。要确定一事物存在的空间地位，必须了解这一事物同周围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如距离、排列秩序等。当我们说到任何一事物的运动时，必然要联系到它的位置的移动，它的规模或体积的增大和缩小、总之，不论谈到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要涉及它的存在和运动的空间形式。

运动着的物质也不能离开时间形式而存在。各种物质运动过程，具有一定的发展顺序和或长或短的持续性。离开了时间的形式，任何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不能存在的。

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所固有的存在形式，因此，空间和时间也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着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物质是永恒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永恒存在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是和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否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也就否认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意识、观念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使自己“外化”为自然，这时才出现空间形式；时间则是在“绝对观念”发展的更后一个阶段上出现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显然是同物质及其存在形式——时间、空间永恒存在的真理相违背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时空观把空间和时间看作是存在于人的主观领域的观念形式，这和它否认世界的客观存在是分不开的。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感性直观中的先天形式，人们通过这种为认识主体所固有的先天形式去感知事物，才给予事物以空间性和时间性。马赫断言，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调整了的体系”，是用来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主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科学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着，并且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发展着。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反对唯心主义的时空观，而且指出，把空间、时间和运动着的物质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也是不正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可以以牛顿的观点为代表。牛顿虽然也承认空间和时间是客观实在的，但他不理解空间和时间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他认为，空间是和物质相脱离、安放物质的不动的空框子，时间是绝对均匀流逝的和物质运动无关的纯粹的持续性，空间

和时间并不是同运动着的物质内在联系着的形式。这就是牛顿的所谓“绝对的”空间和时间。

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空间和时间的特性是一成不变到处一样的，物质的运动决不会使空间和时间有所变化。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非欧几里德几何学证明，事物的空间特性，在范围广大的天文学计算领域内，是不同于比较狭小的普通的地面计算的领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律，只适用于后一种领域，对于前一种领域则是不适用的。狭义相对论揭示出空间和时间特性的相对性。人们在考察地上的普通物体的运动和天体的较慢的运动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考虑物质运动对空间、时间的影响以及空间和时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根据相对论，在考察运动速度接近于光速的物体运动时，静止坐标系的观察者就可以测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增加，沿运动方向的长度就会缩短，在它上面进行的运动过程就会减慢，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延伸就会减小，而时间的持续就会加长。空间和时间的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运动速度上彼此互相对应的。这些事实说明，空间和时间是同物质的运动相联系着的。空间和时间随着物质运动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和运动着的物质是不能分离的，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不能分离的。

空间和时间同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可分性，还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说明。空间的三维性，就是物质的体积伸张的三维性，就是一物和其他物的位置关系上（也就是坐标关系上）的三维性。它是指通过空间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引出三条互相垂直的直线，通俗地说，也就是任何物体都具有长度、宽度和高度的广延性。离开了物和物的位置关系，空间的三维性就无从理解。时间的一维性和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只能用物质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变革来说明。“时乎时乎不再来”，是说事物的某种具体联系不可能绝对地重复出现。要“掌握时机”，要

“当机立断”，就是说，人们要趁着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有利的联系条件，迅速确定行动的决心，否则就会失去时机。这又说明，时间的一维性和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特性不能离开事物的具体联系而得到正确的理解。

恩格斯早就指出，把空间、时间和物质分离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和物质的运动脱离的、绝对不变的空间和时间，正是主观的、空洞的抽象概念。

唯心主义者利用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改变的事实，宣称空间和时间不过是人们意识的产物，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已被推翻。其实科学的新发现所推翻的，仅仅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抽象的、空洞的概念，而绝非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特性的认识将愈益深刻、丰富。物质的空间和时间的形式是随着物质本身的运动变化而变化的；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可变的、相对的，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作为物质运动形式的空间、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则是不变的、绝对的。列宁说：“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辩证唯物主义从空间和时间同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还肯定了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物质是无限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不过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无限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茫茫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的观察上，今天借助射电望远镜虽然使我们已

经可以察觉距地球超过一百亿光年的星系，但是这也不是宇宙的边缘。宇宙是没有边缘的。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是永恒地存在着、运动着，因此，在时间上，宇宙的发展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

整个物质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但每一具体的个别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则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空间和时间正是由这种无数的有限的空间和时间所构成的。这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矛盾统一。如果只看到宇宙中每一个别事物的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断言整个宇宙空间和时间也是有限的，这就会引导出一种荒谬的幻想，以为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时空、超现实的“神”的世界，就会陷入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从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必要条件。

四 物质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性

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永恒地运动着，而物质的运动是有它自己的规律性的。春夏秋冬四季的依次更替，昼夜的循环，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社会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等等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发展过程都具有某种一定不移的基本秩序，这就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唯物主义肯定规律性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物质运动的规律和物质本身一样，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规律不能由人的意

志任意地加以改变，不能为任何人所创造，也不能被任意地消灭。唯物主义既然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实在性，也就要承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早已为自然科学所证明。例如天文学发现，各个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运行的轨道，相对速度等等都服从于万有引力定律、惯性定律等客观规律。生物学揭示了物种的进化是按照“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客观规律进行的。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中，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感觉特别真切，在生产中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愿望盲目蛮干，就将一事无成。

社会现象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发的力量，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则是有着自己的意志、愿望的自觉活动着的人。表面看来，在这里似乎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起着决定作用，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存在。但是在以往的社会里，人们的愿望在很少的场合才能完全实现。人们所抱的目的，常常是彼此冲突和矛盾的，其中，有些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有些因为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不能达到。社会现象并不是由每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归根到底它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不仅人们的愿望和意志是否能够实现，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而且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和动机，而不产生其他的愿望和动机，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一定的愿望和动机的产生都是由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客观状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全部历史事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指出了这些规律的客观性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充分地证明了社会规律的存在和它的客观性质。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人们开始能够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为社会谋福利，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发展规律不再是客观的，人们可以“消灭”或“制定”规律。斯大林说：无论

是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观点。实践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严格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结果，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引起事情的混乱，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

唯心主义否认规律性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否认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客观唯心主义把事物的规律性的来源归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如“上帝”、“天命”、“绝对精神”之类。宗教迷信把事物发展的必然联系硬说成是鬼神的安排。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规律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如康德认为，仅仅由于人的理性能力的作用，才使杂乱的现象获得一定的秩序。他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这是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本来是没有规律性的，科学规律仅仅是人们为着暂时的利益而作的有用的假设。

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否认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旧的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客观规律，但往往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就使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陷入了唯心主义。

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的规律，在哥白尼和开普勒发现以前，从来就在宇宙中发生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可是在他们发现这些规律以前，它们早就在人类社会中发生作用了。不管规律是否被人们认识，它总是客

观存在着。规律不是由任何的精神力量所给予物质世界的，任何人要想把自己主观臆想的秩序强加于事物，是不可能的。剥削阶级总希望永远保持统治地位，希望剥削制度永世长存，不管他们赞成还是反对，历史的发展总是要合乎规律地由一个社会形态进到另一个社会形态。不管资产阶级如何仇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客观规律是改变不了的。

科学的研究的任务决不是如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把某种主观设想出来的秩序强加于事物，恰恰相反，科学的研究的任务是要从客观事物中发现它本身固有的规律性。资产阶级学者臆想的“土地收益递减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规律”等等，当然称不得科学规律，因为它们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所以它们在社会历史和科学的发展面前一个个地宣告了破产。

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能够认识客观规律，并利用这种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伟大目的。如果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行动，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人们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行动，就一定要遭受失败，达不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人们的行动，人们的社会实践，深刻地证明了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存在，证明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证明事物的规律为事物本身所固有；也深刻地证明了，客观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遵循着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把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物质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当作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的研究工作中，要坚决从客观

的实际事物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首先应该树立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

第三章 物质和意识

既然世界是物质的世界，那末，意识是什么，它的本质、起源和作用是怎样的呢？所有的唯物主义派别都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但是，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意识的起源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和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彻底驳斥了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观点。

一 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物质世界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而意识则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自然科学证明，地球上曾经有几十亿年没有生物，更不存在具有高级神经系统的人类，在那时并没有意识现象。无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产生了有机界，有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出现了具有高级神经系统的人类。只是在有了人类的时候，才产生了意识现象。人类的思维这种精神现象，只是在约一百万年以前才出现的。这就可以证明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物质产生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脑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而大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人类意识的产生不仅在生理方面同高级神经系统的发展密不可分，而且同劳动也是紧密相联的，就是说，人的意识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

关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曾经是科学和哲学上的最大难题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唯心主义者曾利用科学还不能解释物质是怎样产生意识的这个困难，来散布其荒谬的观点。唯心主义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真实关系，它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产生意识，倒是意识产生了物质；它断言意识是一种不依赖于物质的、独立的本体。各个唯心主义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这种谬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人的意识归结为“宇宙精神”的自我意识和神的启示，主观唯心主义者把意识的来源归结为心灵的自由创造。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各派都正确地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历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命题，并作了具有科学意义的论证，向前推进了唯物主义，使得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逐渐接近于科学的解决。我国东汉的王充把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比作薪和火的关系，提出了世界上没有“无体独知之精”的命题。到了南北朝，范缜把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肉体和精神的关系比作“刃之与利”，就是说，精神是“心”的作用，好比“利”是刀刃的作用。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唯物主义者，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作了若干具有科学意义的论证。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人脑中产生的表象和概念是由物质的现实派生出来的，人的肉体结构决定他们的精神生活。他嘲笑了那种宣扬灵魂不死的宗教信条。十九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明确地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客观存在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感觉是客观世界的映象。

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受着自然科学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都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古代有些唯物主义者认为，意识是一种最精微的物质的作用，这种最精微的物质或者是原子，或者是“精气”，它们是从来就存在的。还有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但他们不知道意识只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大脑的特有的属性，认为一切物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意识，得出了“物活论”的错误结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连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在内，在意识起源的问题上都没有辩证发展的观点，都不了解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他们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考察意识，所以就不能科学地解决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出现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流派，他们错误地把意识和物质看作同一个东西，把整个思维过程完全归结为大脑的机械的、物理的、生理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大脑产生思想，就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种观点混淆了意识和物质的界线，歪曲了意识对物质的真正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指出：“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思维的过程同大脑的机械的、物理的、生理的过程是密切联系的，但是，不能把思维仅仅归结为这种过程。意识是人脑这种高度发展了的物质所固有的特性，它和上述较低级的各种运动形态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人脑反映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机能和作用，而并不就是一种象胆汁之类的物质。”

辩证唯物主义完全科学地解决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现代科学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起源和本质的原理，彻底驳倒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科学证明，意识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辩证

发展过程。意识这一种大脑的特性，是由低级物质所具有的跟感觉相类似的反映特性发展来的。

无机界没有感觉或意识，它只具有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这是一种跟感觉相类似的反映特性，但这并不是感觉或意识，它只是物体由于其他物体的作用而发生的物理状态或化学状态的改变。

无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产生了生命。随着无机物在一定条件下向有机物的转化，随着生命的出现，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了生物的反应形式，即刺激感应性。低等动物和整个植物界没有神经系统，它们只能对直接作用于它们的环境具有刺激感应的能力。刺激感应性已经不是单纯的物理反应、化学反应，而是这样一种反应能力：它使机体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外界条件，使生物机体能保持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以维持其生存。这种刺激感应性已经包含了感觉的萌芽。感觉正是在刺激感应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低等动物发展为高等动物，适应愈来愈复杂的生存条件，有机体的各种组织也愈来愈专门化，产生了专门的反映机构，即神经系统。神经系统逐步发展，出现了中枢神经（包括脑和脊髓）和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中心就是大脑。有机体通过神经系统和环境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按照巴甫洛夫的学说，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具有初步反映外界或自己内部发生着的那些物质过程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动物的心理或低级的“意识”。当然，这种“意识”还不是人类的意识。

随着由动物界向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最复杂最完善的大脑，这是较之神经系统的出现具有更大意义的质的飞跃。人类的思维活动，不仅借助于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一信号系统，由外界物质刺激直接引起

种种条件反射，而且还必须借助于第二信号系统，由言语引起另一种条件反射。列宁指出：“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言语作为引起条件反射的信号，正是许多同类物质刺激的概括和标志。它使人的条件反射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为一般动物不可比拟的高级阶段。人脑在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活动，就是意识。所以，意识不是别的，就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程度的物质——人脑的机能。现代科学证明：意识过程是和大脑活动的生理过程密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客观外界刺激了人的感觉器官，感觉器官接受了外界的刺激，通过神经系统把这种刺激传达到大脑，引起大脑皮质的活动，才产生意识现象。当人熟睡的时候，即大脑处于抑制状态的时候，就没有意识活动；而不清晰的、若断若续的作梦这种意识现象，则是由于大脑皮质没有完全抑制、有一部分还处在兴奋状态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根本驳倒了把意识看作是脱离大脑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的唯心主义观点。

意识的萌芽和发生的历史，证明了意识在先、物质在后的唯心主义观点是荒谬的，也证明了一切物质都有意识的“物活论”是不对的。

是什么力量使得动物的脑过渡到人脑、动物心理过渡到人的意识呢？辩证唯物主义回答说，是劳动。劳动是猿变成人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产生的决定因素。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人类最近的祖先——类人猿，由于生存条件的影响，它们的前肢和后肢有着某种分工，即由前肢担任了某些类似人手的工作。但即使最发达的猿“手”也本质上不同于人手，因为它不能制造工具。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当第一把用燧石做成的石斧出现以后，类人猿的“手”变成了人

类的手，类人猿的活动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劳动。这样，主要依靠自己生理器官来适应自然界的动物，就发展成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的人类。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思想交流是必要的，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有人们在改造自然斗争中所必需的协调的共同活动。这样，“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从而就产生了语言。语言的产生使大脑能用词来概括各种感觉材料，表达抽象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

由此可见，劳动和在劳动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人脑产生和人类意识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劳动不仅在意识的产生上起了决定的作用，而且在意识的发展上也起了决定的作用。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作为思维器官的头脑愈益完善化了；另一方面，劳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意识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了。因此，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离开了社会，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人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综上所述，意识是人的大脑——高度完善、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属性或机能。它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这就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二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意识是人脑的属性，这是意识依赖于物质的一个方面。意识对物质的依赖，还表现在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大脑是意识的器官，但它不会自动产生意识；只有当外部物质世界的事物，现象通过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当大脑和外界发上了联系以后，才会产生意识。

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意识是客观世界的摄影、模写、摹本，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意识按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按其内容来说则是客观的。没有被反映者，谈不到有反映；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就不可能有任何意识。这是唯物主义各派共同的基本观点，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论证了人的头脑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首先是感觉。当客观的事物、现象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的神经兴奋达到大脑时，就产生了感觉，这是意识的初级形式。例如听觉是由于音波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而引起的。颜色的感觉是由于不同波长的光波作用于人的眼网膜而引起的。人们每天每时都要接触到外界的许多事物、现象，因而就不断引起各种感觉。冬天的夜里刮了一夜西北风，人们第二天外出劳动，接触到了冷空气，就会感觉到天气变冷了。在新学年开始时，当一位新的老师走进课堂，我们首先得到的是关于他的身材、容貌、衣着等等的印象，而当他开始讲课以后，我们又会得到关于他的音调、语态、手势等等的印象，这些都是感觉。只有人们的感觉器官接触到了某一个客观对象，才能产生有关这个客观对象的形状、大小、色泽、音调、冷热、干湿等各方面的感觉，各种感觉的综合形成了对象的完整的印象。人们在回忆中出现的当下不存在的对象的印象，是以往接触那个

对象时所形成的印象的再现。没有客观外界的刺激，就不能产生任何感觉。

感觉对客观外界的反映有两个特点：第一、感觉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反映，它的产生直接依赖于外界的具体对象，在感觉和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之间，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第二、感觉所反映的只是具体事物的一定特性，而不是许多事物的某种共性。例如它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颜色、重量，而是某种具体物体的颜色、重量，等等。这两个特点也恰好证明了感觉是客观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直接的映象。感觉是意识的初级形式，但它却是构成一切复杂的意识现象的基础，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认识。

感觉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凡是具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都有感觉。但是人的感觉和动物的感觉有着本质的差别。人的感官不仅是生物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改造了自己的感官，使自己的感官不断完善化。和动物不同，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感知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这就使得人的感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比动物优越得多。恩格斯说：“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敏锐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感觉是意识的起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就是唯物主义，只有进一步承认感觉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才是唯物主义。在感觉的来源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认为，感觉是客观事物的一定特性的映象。主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感觉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人的感觉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倒是客观世界成

了人的感觉的产物。按照这种说法，无论外界的山川、田野、草木、虫鸟，还是产生意识的器官——大脑，都成了感觉的产物。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它同科学和常识完全背道而驰。

人们对外界的反映不仅采取感觉的形式，而且采取思维的形式。思维是意识的高级形态。思维这种反映形式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的反映的本质特点。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正是通过概念、范畴、规律等等，人的思维才能够深刻地反映外部世界的各种物质运动的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不能科学地了解思维这种反映形式的特点，他们不了解思维对客观外界的反映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而把人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机械地简单地了解为照像式的反映。这就给唯心主义留下了可乘之隙。唯心主义者抓住了思维不是对象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断言思维不是客观外界的映象，而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例如康德一方面认为，经验来自客观外界的刺激；这是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另一方面又认为，思维的逻辑范畴是先验的、主观自生的；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证明，和感觉一样，作为意识的高级形态的思维也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同感觉有质的不同罢了。

感觉这一反映形式是和客观外界直接联系的，是客观对象的直接反映；思维则是和客观外界间接联系的，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事物的形象，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和规律，它远较感觉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感觉是思维和客观外界联系的桥梁。感觉同客观世界直接联系，给思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后思维才是可

能的。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思维；只有通过感觉，思维才能获得它的内容。思维这种高级的意识，是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并对后者进行了抽象和概括而产生和形成的。尽管思维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但它仍是来自客观外界，它的内容仍然是客观的，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巴甫洛夫学说证明了，人的意识，包括它的高级形态——思维在内，都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维是和语言相联系的。巴甫洛夫从生理学上论证了借助于语言进行抽象思维的这一反映的特点。根据巴甫洛夫的学说，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他不仅具有第一信号系统，而且具有第二信号系统——语言系统。第二信号系统所借以形成的语言以及人的第二信号系统，都是在劳动中形成的。第二信号系统是人的感官的补充，它可以把第一信号系统的无数信号加以抽象和概括，使人突破了感官的局限，使人的认识能够扩大和深入到感官所不能及的种种领域。由于有了第二信号系统，人就可以不必单纯地直接依靠第一信号系统保持同外界的联系。第二信号系统是构成第一信号系统的那些事物和现象的标志，是信号的信号。这种信号的信号是代替实物的刺激物。巴甫洛夫关于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从大脑活动的生理过程证明了，在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归根到底，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作为思维形式的概念、理论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它是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它不像像片那样直接反映外界对象的具体的原型，但它反映了许多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和内部联系。例如在人的思维中能够形成既不是梨又不是苹果的一般的“水果”的概念，但是在客观世界里，人们只能找到梨子、苹果等具体的水果，而不能找到一个既不是梨又不是苹果的一般的“水果”，但思维中的一般的“水果”反映了各种具体的水果的共同本质。在这里，机械唯物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它不

能解释抽象的概念、理论为什么也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概念、理论确实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摹本。例如数学，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但它仍然是客观世界的映象。客观世界虽然并不存在抽象的数目、点、线、面积等等，但其原型仍然在客观世界之中。几何学是从客观的空间关系出发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客观对象的数量关系出发的，这些数量和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各种物体的大小、宽窄、长短等等的区别和联系相适应。即使是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次微分和无限小），看起来好象是任意想象的，但实际上这一切想象的数量的原型仍然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社会科学的生产关系的概念，也不外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关系的概括反映。总之，任何抽象的概念，它的根源无一不是客观外界。

不但科学的抽象、正确的思想是客观外界的反映，就是错误的思想，各种荒唐的玄想，宗教的迷信观点，也无不可以从客观物质世界中找到它的产生根源。一种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在于它是不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而在于它是客观外界的正确反映，还是一种歪曲的，虚幻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中的各种神的形象都可以从人间找到它的原型。神是人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各民族的神都具有本民族的人的特征。阶级社会的宗教把神分成高级神和低级神，主神和一般神，并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统治和隶属的关系，这种“天国”中的等级关系，正是尘世间的阶级关系的反映。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物，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感觉和思想。这是由于人们的修养、知识，特别是阶级立场等主观条件不同所造成的。在反映过程中，人的主观条件是起作用的。然而，

这种主观作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恰好证明了客观决定主观、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

综上所述，感觉直接来源于客观外界，思维来源于感觉，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客观外界；意识，无论是低级形式的感觉，还是高级形式的思维，都是人的头脑这种特殊的物质对于在人头脑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自觉地去符合客观实际，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不断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 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认为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而且认为，意识对物质的反映是能动的，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反过来对物质发展进程起巨大的作用。不承认或低估意识的反作用和主观的能动作用是错误的。

人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在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而人的行动总是受意识支配的。意识的特点，就在于它不象镜子一样简单地消极地反映外界事物，而是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所反映的事实材料和规律性作基础，提出一定的观点、理论、思想体系，提出一定的目的、主张，计划，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斗争。以生产经验，科学技术的形式反映自然界的规律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意识，指导人们从事生产斗争，能动地改变着自然界；以社会观点，社会思想的形式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意识，指导人们从事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活动，能动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意识就是这样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而

反作用于客观世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的。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普遍适用的。

唯心主义抓住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把它加以绝对的夸大和歪曲，把意识说成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却忽略了意识的能动方面，把意识的反映客观世界看做是消极的、被动的，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意识现象，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论证了意识的能动性，给予意识的能动性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贯彻到底。

在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前提下，肯定意识的能动性，这不但没有证明唯心主义的正确，恰恰是彻底驳斥了颠倒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人的行动要受一定的目的、主张、计划等等的指导。例如盖房子要先有房子的设计图，造飞机要先设计飞机的图样，做具体工作要先制定方针、计划。方案等等。马克思说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不同于最

灵巧的蜜蜂的地方，就是建筑师在建筑什么东西之前，先要制定一个观念形式的建筑物设计图。

先有建筑设计图，然后进行建筑，这是否同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的唯物主义原理相矛盾呢？不矛盾。因为，建筑物的设计图是以人们所认识了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是以前人经过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建筑经验为基础的。这里恰恰证明了意识（建筑物计划）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它既经产生，就对人们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起着巨大的反作用。

人在行动之前，先产生某种动机，并为实现这种动机制定相应的计划。表面看来这好象是纯粹主观的、任意的，其实不然。人们为什么恰好产生这种动机而没有产生别的动机，为什么恰好提出这种计划而没有提出别的计划，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原因只能从客观现实中去寻找。人们给自己提出的任何任务和计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处于敌对阶级地位的人们会产生相反的动机，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这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人的活动总有预期的目的，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有的人就不能呢？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预定的目的和行动计划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

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毛泽东同志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

实践中失败。”这是被现实生活一再证实了的坚定不移的真理。革命的阶级或集团的行动，虽然也要经过困难、挫折和失败，但终归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动的阶级和集团的行动虽然暂时也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最后总是要遭到失败，达不到它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前者的预期目的以及为着实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方针、政策、计划等，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后的预期目的以及为着实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方针、政策，计划等，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意识的能动作用，不但不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相矛盾，而且，对于意识能动作用的正确解释，恰恰是证实了这一原理。不管意识的能动作用有多大，它总是受客观存在制约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能动性的科学解释，对于实践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由此可见，要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情况，就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引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计划、政策等等，而不能凭着主观感想办事。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计划、政策等等，越是符合客观规律，人们就越能够在工作和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就越能够实现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目的。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是按其固有规律无限发展着的。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必须了解世界是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而且必须了解物质世界为什么会发展，它如何发展，它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范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物质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所形成的统一整体。宇宙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相互依赖着、相互制约着、相互作用着。在自然界中，从巨大的天体到原子核内部的基本粒子、从无机界到有机界，无不处于普遍联系、交互作用之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虽然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的出现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且，只有在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也无不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整体，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以前者为基础的相互作用；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也相互影响着、相互联系着，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之中才有它的存在，才有它的发展。离开了这种具体的

联系，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会成为不可能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没有地球上的各种条件——大气层、适当的温度等，生命就不能存在；脱离了人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再也做不出什么事来了。离开了垄断资本主义对于资本输出和国外市场的需要，就不能理解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侵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事物的普遍联系，是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紧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离开事物的相互联系就无从考察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更说不上了解运动、变化、发展的实质。某一物体的位置移动就是它和周围物体的空间联系的改变。位置就是一种联系。脱离了与周围物体的联系就不能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也无从说明位置的变化。最简单的运动形态尚且是表现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复杂的运动形态就更不能离开事物的联系来加以理解。在事物内部各种力量的作用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己本身不断地运动着、发展着，由一种状态推移到另一种状态，由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由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也就是一种联系，即新旧事物之间的联系，高级生物是由低级生物长期发展而来的，高级生物和低级生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又是同自然界各种条件的变化、发展分不开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是促使类人猿转化为人类的一个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类人猿“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

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由此可见，就其实质来说，不论简单的运动形态或复杂的运动形态，都是由种种事物联系构成的；运动、变化、发展也就是联系。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唯物辩证法所要研究的，就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规律。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就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

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来，自然和社会只是一些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事物或现象的偶然堆积。形而上学者不是从联系中，而是把事物或现象从世界的总联系中割取出来，孤立地加以研究。因此，他们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的相互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个别事物的存在，而看不到它们的产生、发展和消灭。

科学发展的全部成就驳斥了形而上学，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质量和能量的相互转化和守恒定律揭示了各种物质状态、运动状态之间的普遍联系。细胞的发现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揭示了生物界内部普遍联系以及生物和环境之间的联系。门德列夫的周期表揭示了曾经被认为互不联系、互不依赖的各种化学元素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揭示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社会和自然的联系。

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不顾科学发展已经获得的积极成果，力图推翻普遍联系的观点。存在主义者断言：“现象间的任何有规律的联系都是不存在的，可以谈的只是历史事实的偶然性和荒谬性。”资产阶级象怕火一样害怕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是毫不足怪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就会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

既然世界上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那么每一个事物和现象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是受着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一定的事物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发展，又在一定条件下趋于灭亡。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斯大林说：“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离开一定的条件、地方和时间。甚至不能弄清“下雨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大旱之时，普降甘霖是十分有利的；而在水涝成灾之时，淫雨不止就无疑是绝对有害的了。因此，想问题、做事情都要充分估计到条件的作用，要具体地分析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离开条件去想问题，其结果只会成为没有根据的空想；不顾条件去做事情，就会成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否认条件的作用是错误的。当然，条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但人们不能任意地改变条件，条件的改变必须依据客观规律来进行。只有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正确地利用客观规律，人们才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改变不利的条件，创造出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必需的条件。

宇宙中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每一事物都这样或那样地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然而事物的联系并非都是一样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多种多样，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

系等等，它们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性。规律就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列宁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规律所表现的是现象间在一定条件下所固有的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相同的条件下是会重复出现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合乎规律的联系就必然发生作用。如力学中的自由落体的规律，并不是只适用于个别物体的、偶然的联系。一切物体在排除空气的浮力和阻力等条件下，都必然以该地的重力加速度向地面下降。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规律，只要在阶级还存在的条件下，它就必然起作用。

规律是现象中普遍的稳定的联系。列宁说，规律是现象中经常巩固的（保守着的）“东西”，“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

例如，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制造该商品所耗费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一切商品生产的一个共同的特性。任何一种生产只要它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它就必然起作用。发现和掌握规律，就是从个别中找到了一般，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中找到了相对稳定的本质。

规律比现象更深刻。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决定着事物和现象发展的总的趋势和基本过程。但是，规律并不包括现象中的一切联系，所以现象比规律更丰富。

认识事物就是要从事物的多种多样的联系中去研究事物。但这决不是说，要对事物的一切联系同等看待。要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对

事物的各种联系加以具体的分析，分清何者是本质的、何者是非本质的，何者是必然的、何者是偶然的，何者是主要的、何者是次要的，从而抓住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性。不做这种具体分析，只是甲乙丙丁现象罗列是达不到任何科学认识的。折衷主义者把事物或现象的一切联系和关系等量齐观。他们在说明一个事物或现象时总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是全面观察问题，在实际上，只是模糊事物本来的面貌。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为着讨资产阶级的欢喜，经常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使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部模糊起来。折衷主义是反辩证法的，它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辩证法要求的是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规律，机械运动、物理现象、化学变化、生命过程和社会发展等等，都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并不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的特殊规律。研究这些特殊规律，是各门具体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任务。唯物辩证法所研究的是宇宙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辩证法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它支配着一切事物的发展，在任何领域都起作用。辩证法的规律既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又是思维的规律，主观辩证法不外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论。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法的总原则，是我们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指南。唯物辩证法是帮助我们揭示各种事物的复

杂联系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有了它，才能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观察事物。

唯物辩证法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不能代替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唯物辩证法不允许将它的原理当作死公式硬套在具体事物之上，而要求以它为指导，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揭发每一具体事物本身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具体联系和规律。只有掌握大量现象材料，运用辩证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揭发事物固有的联系，才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并从而丰富一般规律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是全面的、深刻的、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它教导我们要分析事物内部和各事物之间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分析事物的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各个方面的联系。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还把对立统一规律规定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二 两种发展观

唯物辩证法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指出，在客观世界中普遍地存在着矛盾，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它又分裂为两个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部分、方面和趋势。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

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毛泽东同志把这一原理概括为“一分为二”，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我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包括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了一些关于矛盾的思想。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这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的相反的力量是运动的源泉。程颐说：“万物莫不有对”。唯物主义者戴东原说：“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这是说宇宙的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宇宙变化是由阴阳的矛盾斗争所构成的。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深刻地说明了矛盾的客观性，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存在于科学研究的一切领域。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揭示了在物质的微观结构中也充满着矛盾，有实物粒子和场粒子的矛盾，有原子核和电子的矛盾，有粒子和反粒子的矛盾等等。每一个微观客体又都具有颗粒性和波动性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中也充满了矛盾，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自从阶级出现以后，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奴，资产者和无产者，一句话，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中。

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不过矛盾的性质和旧社会不同罢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观点，创立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完整学说。他说：“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每一事物的内在矛盾是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自然界的变 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的发展，使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承认不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列宁概括了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哲学战线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深刻地阐明了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根本对立。他指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第一种观点忽视了事物内部的矛盾，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这种观点在实质上是把事物看做是死板的，被动的，它本身不具有运动变化的能力，事物的“发展”被认为纯粹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这种观点会走向唯心主义，就是从物质世界以外去找物质世界发展的源泉，把物质世界发展的源泉移到了精神世界，移到了神。既然这种观点忽视了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看不到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新的方面和旧的方面的矛盾斗争，也就不能理解通过矛盾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本身的革命变革——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事物的发展不过是同一事物在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任何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同样的事物。这种观点是在口头上承认发展，而在实质上却否认发展，因此它终归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辩证法的观点，它揭露了事物内部的矛盾，“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这种观点指明，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只有这种观点才能说明事物的革命变革，说明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旧东西的灭亡和新东西的产生。

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害怕从矛盾的学说会做出革命的结论，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否认矛盾的客观存在。现代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说：“‘矛盾’这个词是用得很古怪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逻辑理论就认为，只有判断、论断、证明才可能有矛盾，事物和现象决不可能有矛盾。”克·保皮尔说：“如果我们承认矛盾的存在，那末我们就应该放弃任何科学活动；这意味着科学的完全毁灭。”我们必须揭穿资产阶级学者这种“维护”科学的虚伪面孔。科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了，矛

盾是客观存在着的。人类认识史表明。任何科学所研究的，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事实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恰好相反，离开了对客观事物本身矛盾的分析，就没有真正的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这是事物自我运动的源泉；同时也承认，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矛盾——外部矛盾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正确地解决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对深入理解事物发展，对批判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外部原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依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其中有些条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就不能孵化为小鸡。在这个意义上说，适当的温度这种外部条件，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适当的温度不管有多大的作用，也不能使石头孵化出小鸡，因为石头没有孵化为小鸡的内在根据。所以归根到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肯定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国际援助为国内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是否能充分利用这种条件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还是取决于国内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自觉努力。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外因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但是指出它只是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只有这种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才能彻底驳倒片面强调外因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实践和科学都证明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前面已经说过，不仅自然界有矛盾，而且社会中也有矛盾，不仅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矛盾，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中包有矛盾。矛盾不仅存在于客观现象中，而且也存在于思维中。毛泽东同志说：“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他又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

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无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过程都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的。如果只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有矛盾而不承认别的阶段有矛盾，例如苏联德波林学派认为过程的开始时只有差异，没有矛盾，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矛盾，那是同事实不符的，违反了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事实上，事物发展过程开始时的差异，就是矛盾，只是没有激化而已。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使我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有了一个总的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仅懂得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了解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矛盾的各自的特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各有其特殊的本质。这种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只一般地知道任何事物都有矛盾，而不研究它们各自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更谈不上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矛盾。因此，认识和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

任何科学，都要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每一门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自然界或社会的一定过程。一定方面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各以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人们要对任何一种具体事物进行科学的研

究，就必须注意把握它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机械运动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简单地搬到其他部门，而不注意其他部门的矛盾的性质是和机械运动根本不同的。“生物社会学”的错误在于，不区别生物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矛盾，以为用生物的特殊矛盾运动规律就可以解释社会现象，抹煞社会本身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分析了社会本身所特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就是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不但世界上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有它不同的特殊矛盾（如自然界和社会），而且同一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的不同发展过程，各有它的特殊矛盾（如社会运动形式中的各个不同社会形态）；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各有它不同的特殊矛盾（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阶段和垂死阶段）。要了解这些，都必须做具体分析。

一个大的事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相互联结，构成事物的总体。我们分析一个过程，必须首先分析这个过程所包含的各个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在这个总体中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然后再把这些对事物各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这样才能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根本矛盾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而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发生了。因此，必须分析

这些矛盾在其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变化，必须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

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了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不同作用的各个阶级（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本身的特点，又从各个阶级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然后综合起来，对各阶级之间的总的关系，即矛盾的总体的特点作出结论，确定地主、买办阶级是革命的敌人，他们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而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左派可能成为朋友，右派可能成为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矛盾特殊性的范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又注意了这些阶级矛盾变化和发展的情况，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如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对这些矛盾和它们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从而为党制定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我们具体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其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特殊性，就是为了找出恰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对于具体事物不作具体分析，用千篇一律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是没有不失败的。

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

适用于一切事物的道理，没有任何例外。这是事物的共性、绝对性。每一事物、每一过程的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质，这就是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如果除去了一切过程的特殊性质的矛盾，也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普遍性了。所以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例如，对于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的最普遍的原理说来，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特殊性，但是阶级矛盾表现在奴隶制社会中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表现在封建社会中是地主和农奴的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就这些场合说来，阶级矛盾是所有这些社会所共同的普遍性的矛盾，而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的阶级矛盾有着各自的特殊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发展历史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全部阶级斗争历史说来，就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对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它又具有普遍性。

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互相联结的道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事物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不能离开特殊性去寻找普遍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去寻找特殊性。

人们认识矛盾的过程，总是从具体的特殊矛盾的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进一步去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然后又利用这种研究的成果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关于普遍的

规律的认识，作为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的指导。如此不断反复下去。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无限的认识过程。我们在观察、研究和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既必须以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作为指导，又必须从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出发。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完全符合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由于它们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会有千差万别的特点的；但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总是要遵循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一些主要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从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

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特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所肯定的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否认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普遍意义。他们宣扬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否认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现代修正主义者片面地强调特殊，把特殊绝对化，使它脱离了一般，只不过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性的一种手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离开了普遍的特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决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是使矛盾的普遍性离开矛盾的特殊性。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既不能够从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普遍原理，也不懂得应用普遍原理到实际生活中时，必须使它和实际生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

汉，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是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必须研究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它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内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又表现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的矛盾。只有抓住了这个矛盾，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复杂矛盾；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有可能逐步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其他矛盾。

一般说来，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处理的事情，总是比较复杂的，往往同时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我们捉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处理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容易解决。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正确地解决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方法。在革命斗争中，各种矛盾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革命政党只有抓住其中的主要的矛盾，才能正确地确定主要的打击方向和工作中心，才能集中力量消灭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和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无论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从来都坚决主张在一定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等等分散目标和分散力量的错误战略策略。正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善于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捉住主要的矛盾，正确地制订了革命的战略策略，集中力量，逐个地消灭当前的主要敌人和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才把革命引向伟大的胜利。

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必须抓住中心环节、抓住关键，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把整个工作带动起来。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而且适用于一切工作。在个人的工作和学习中，也总有主次、先后、轻重、缓急，也总得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关键的问题，才能事半功倍，使工作和学习

更有成效。善于捉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极端重要，不懂得它，就会在复杂的矛盾面前茫无头绪，束手无策。

唯物辩证法要求善于从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捉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决不是说可以忽视或撇开非主要的矛盾。事物的各种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虽然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影响。所以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我们就要注意适当地处理各个非主要矛盾。如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慎重地处理工农之间的矛盾，以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恰当地处理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孤立垄断资产阶级，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内部和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对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时候，还必须把主次适当地结合起来。抓中心环节，还要注意非中心环节；抓纲，还要注意目；抓重点，还要注意一般。没有其他工作的配合，中心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开展；丢掉了目，就无所谓纲，没有一般，也就没有重点。所以，正确的方法必须是围绕着中心工作，安排好全盘的工作秩序。毛泽东同志把这种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形象地称为“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既要抓住中心，反对不分主次、轻重，又要全面安排，防止“单打一”。

研究主要矛盾，还要注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问题。在客观过程的发展中，因为出现了新的条件，原来的

主要矛盾可以转化为次要矛盾，原来的次要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政党及时地注意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且预见到这种转化，就能提出新的任务、方针、政策、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集中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这样，才能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外一个中心环节，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

下面再谈主要的矛盾方面（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

一切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任何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也不能平均看待。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时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似乎势均力敌，但这种平衡会被斗争所打破，为不平衡所代替。平衡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而另一方面则居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主要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易其位。因为矛盾双方不断地斗争，在斗争中新的方面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上升为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而旧的方面则逐步由大变小、由强变弱，转变为居被支配地位的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当新的方面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时，事物就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矛盾双方这种互相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事物变革的过程。新的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曲折，有反复、有时甚至有暂时的倒退。但是，无论如何新的方面终归要战胜旧的方面而居主导的地位，新事物总要代替旧事物。这是在宇宙发展中永远不可抗拒

的普遍规律。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永远坚决地站在新事物的一方，积极地创设条件，促成新事物的成长、壮大，使它转化为居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工人阶级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研究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把握了主要的矛盾方面，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就能辨风向、识大局，如果颠倒主次或主次不分，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着的各方面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但它们又具有同一性。矛盾就是既对立、又同一。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运动，必须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的情形，即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在事物和过程中的矛盾着的各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组成一个统一体，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矛盾着的每一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相反皆相成也”，就包含着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同一性的思想。矛盾的一方假如没有和它对立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例如，没有困难，就无所谓顺利；没有落后，显不出先进；没有冷，也就没有热；没有帝国主义，也就没有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彻底解放将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灭亡。世界上任何相互联系着的双方，都是又对立又联结，组成对立的统一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对立，但又互相联系，双方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时候，原来的无产阶级就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这时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是同国内还存在着的农民以及国际资产阶级对比而言的。当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无所谓工人阶级了。战争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有了矛盾双方的转化，才有事物的变化发展、才有革命的变革。因此，它是更重要的方面。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孙子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这里包含着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孙子那里还包含着军队的治乱、勇敢、强弱的转化要有一定条件的思想；其转化的条件就是数（部队的编制）、势（战役战斗的形势）、形（如集中我之兵力，分散敌之兵力，以及选择适当的地形等等）。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自然界和社

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在数学中，正可以转化为负，负可以转化为正。在物理学中，作用可以转化为反作用，反作用又可转化为作用；电转化为磁，磁转化为电。在化学中，化合和分解、氧化和还原也都会向其反面转化。在生物界中，生转化为死，死转化为生。在社会生活中，也充满着对立面的转化。例如，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又转化为和平。在工作中，困难和顺利，也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好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坏事，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好事。失败和胜利也是这样，只要有了一定的条件，胜利可以转化为失败，失败也可以转化为胜利。

研究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最重要的是认识互相转化的条件。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只有认识了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条件，才可能在客观情况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向对革命有利的方面转化。忽视了转化的条件，不但不能把握事物转化的规律，而且会陷入相对主义的错误，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变化无常、毫无稳定性的东西。

抹煞转化的条件性，是修正主义常用的一种诡辩手法。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老修正主义者否认这些条件，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违反客观事实的荒谬说法，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辩证的转化，毫无共同之点。

互相同一的矛盾双方永远处在斗争之中。矛盾的斗争性指的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趋向。有矛盾就有斗争。这里说的“斗争”，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范畴，不只是限于政治的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都是斗争；在自然界中，吸引和排斥，阴电和阳电，化合和分解，遗传和变异等对立面的互相作用，也同样包含着斗争。

任何矛盾双方都是不断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矛盾双方的转化、矛盾的解决，而不是矛盾双方的调和。这一点，在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其他的领域也是如此。就拿社会主义社会中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来说，斗争的结果也不是矛盾双方的调和，而是先进克服落后、落后赶上先进。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新老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硬说“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谬论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长期保存下去。

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否认矛盾、否认斗争的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革命者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就必须与一切阻挡世界前进的反动派，保守派、习惯势力进行斗争。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打倒旧的、建立新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

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揭露矛盾，认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坚决站在新生事物的方面和旧事物进行斗争，以促进矛盾的转化。

“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这是学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重要原理。

如前所述，在客观世界中，矛盾双方的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都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不能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一切矛盾的同一性，又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当统一体通过斗争发展到了某一限度，出现了新的条件时，就必然引起统一体的破裂、分解，而出现适应新条件的新统一体。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但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是要破裂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是要转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可见，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是相对的。同一性所以是相对的，还因为它是矛盾的同一、对立的同一；不包含矛盾，对立的绝对同一，在客观世界上是没有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同一。因此，对立的同一性总是相对的。

矛盾的斗争是无所不在的。它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促使事物由旧的过程向新的过程转化。斗争性高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因此，无论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还是处于显著变动的状态，无论是在矛盾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的时候，还是统一体破裂、分解的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的斗争。只有通过斗争，矛盾才可获得解决。只要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存在着斗争。在它们共同反对封建主义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和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们之间都存在着矛盾的斗争。从这里可以看出，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又是认识的规律。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识别，……是辩证法的实质。”我们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都必须应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并且要自始至终贯彻这种方法。

毛泽东同志把分析矛盾的方法通俗地归结为“两点论”，就是说要分析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既要看这一方面，又要看那一方面，并且要分析其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怎样又斗争、又同一的，它们是在怎样斗争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同一的、怎样同一的。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同志分析帝国主义时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他指出：从战术的观点看来，帝国主义是真老虎，就是说它还有力量，还在张牙舞爪地吃人，从战略的观点看来，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它又是纸老虎，它并没有什么可怕，它正在走向死亡。因此，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就要一方面在战略上藐视它，另一方面在战术上重视它。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也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相反相成的。没有战略上的藐视，就会不敢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那也就无所谓战术上的重视；没有战术上的重视，就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取得胜利，也就不能真正有战略上的藐视。

国民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只有各经济部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才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打破旧的相对平衡，出现新的矛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就是研究新出现的矛盾或矛盾的新发展状况，加以调整，建立新的、更高一级的相对平衡。因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我们要看到平衡的一方面，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又要看到平衡不断地为矛盾的斗争所打破，必须及时地加以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

国民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包含着许多矛盾，例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消费，等等。这些矛盾的双方都是又斗争、又统一。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恰当地处理这些矛盾，使它们互相促进、互为发展的条件。这就要具体研究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之间的斗争性和统一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

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矛盾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在战略上的平衡，在这个方针指导之下去具体研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状况，就能正确地安排生产。

六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矛盾斗争的形式决定于矛盾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矛盾的性质决定了矛盾斗争的基本形式，而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基本的形式又有具体的差别。我们必须懂得各种不同的矛盾斗争形式的区别，才能采取适当的方法，正确地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矛盾斗争的各种形式中，区分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基本形式，特别重要。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在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炸弹爆炸、火山爆发等等。在社会生活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这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要表现为外部冲突的对抗，发展为革命。

非对抗是矛盾斗争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在社会生活中，非对抗性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者是由于非根本性质的利害关系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分歧而引起的。这种矛盾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包括某些剥削阶级。毛泽东同志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

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区分矛盾的性质及其斗争的形式，对于正确地处理矛盾、解决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一般说来，对抗性的矛盾只能通过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必须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那种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存在着敌我矛盾，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必须采取专政的办法，即打击，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就是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如果看不到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或者看不到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都是极端错误的。

现代修正主义故意混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说成是非对抗性矛盾；另一方

面，他们硬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人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性矛盾。这种颠倒黑白的反动实质就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条件，就不可能转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相反，在某种情况下，非对抗性矛盾也可能依一定的条件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由于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革命政党执行正确的政策，有可能引起敌人内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部分敌人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逐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相反，人民内部某种矛盾，如果由于处理不当或者其他原因，矛盾的一方转到敌人方面，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懂得这种矛盾转化的情形非常重要。如果矛盾转化了，我们处理矛盾的方法也必须随之而转化，否则也要犯错误。

总之，区别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认清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矛盾性质弄清楚了，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第五章 质量互变规律

事物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事物的发展和向对立面的转化，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质量互变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 质和量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没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决定一事物是这一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把它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事物的属性是事物的质的表现，是在一事物和他事物发生联系时表现出来的质。

具体的事物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这就使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人们不可能同时把握某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的质。在科学的研究中，人们总是对同一个对象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也就是研究这个对象的不同方面的质。例如对于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他的社会的质，医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是他的生理的质。

人们在研究事物的质时，应当根据客观的实际状况和实践的需要，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根本的质和非根本的质。例如，从人不同于动物的质来观察，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是人的社会的质，其中最根本的表现是：动物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而人则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积极地改造环境。人的社会本质，在阶级

社会里，最根本的是人的阶级性。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之间也有互相区别开来的质，但相对于阶级性说来则是次要的。

同一事物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它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也有部分的质的区别。例如，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它们具有共同的根本的质即资本主义，但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和自由资本主义具有部分的质的区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具有根本的共同的质，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但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又有它的特殊的质，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等等就是特殊的质的表现，这是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区别的部分的质，它较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更高的阶段。

对于事物的多方面的质，要做具体分析，不要在看到这一面时否认另一面；不要把根本的质和部分的质，把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同起来。

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于事物自己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事物的根本的质就是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事物的根本矛盾，不到过程的完结即变为另外的事物，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它的根本的质也不会改变。但是，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可能有些矛盾缓和了，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暂时地解决了，有些新的矛盾发生了，所以各个阶段又有部分的质的区别。

认识事物首先是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而为了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为了

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在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时，又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量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等。恩格斯指出，组成物质元素的各种最小粒子在空间排列的不同也表现着量的差异，即“传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的差异。量和质一样，也是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例如，一座山、一个水库、一个发电站，除了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大小等等量的规定性。某一个社会，除了它特有的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速度等等量的规定性。

质的规定性使事物成为它本身这个样子，而不成为另外的样子。质发生变化，就是这个事物变成另一个事物。而量的规定性则不同，同一类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但仍然是性质相同的事物；量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影响质的规定性。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温度在0度到100度之间的变化，不会改变水的液体状态这种物理的质。

量和质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它们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也总是一定质的量。数学是研究“纯粹”的最的科学，就是在这种“纯粹”的量中，也存在着质的差别：有正数和负数，整数和分数，奇数和偶数，等等。量和质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一定的质决定一定的量，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这就是说，量是以质为基础的，质制约着量。另一方面，质又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各种事物的量都有一定的限度，量变超出了这个限度，事物的质

就会改变。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和量的统一，在“度”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

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量变不会引起质变，超过这个界限，事物就会发生质变。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度，就是0度—100度，超过这个度就变成冰或汽了。又例如，富农和富裕中农之间也有一个确定的数量界限，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但是如果其剥削收入超过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富裕中农，而是富农了。在我国条件下，党和人民政府曾规定富裕中农的剥削收入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掌握事物的度，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度。认清了事物的度，才不至于混淆不同质的事物，才能够正确掌握质和量的统一，促进事物的发展。

事物在其一定的量的界限内，保持自己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但事物的发展，总是要超出它自己的度，而变成另外的事物，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革命者要善于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进程，不要主观主义地去超越事物的度。当有了一定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要促进事物超出它原有的度，变成另外的事物，促进客观进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量变和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量变是一种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根本性质的变革。我们日常看见的统一、相持、平衡、静止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过程中呈现的面貌。质变是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突变或飞跃。统一物的分解，相持、平衡，静止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就是事物处在质变过程中呈现的面貌。

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限度内，不引起质的变化，即事物还保持自己的相对稳定性。但是，量的变化一超出这个限度，也就是超出这个关节点，就引起了质的变化，旧质归于消灭，而出现了新的质。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由质变而产生的新的质，又开始表现了它的相对稳定性。新的质是同新的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量变过程。这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由量变到质变和由质变到量变，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构成了事物无限多样的发展过程。

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古代，人们就已经猜测到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例如，《易传·系辞下》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传·文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都包含着由量的积累引起重大变故的思想。

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了质量互变规律的普遍性。门得列也夫的元素周期表早就说明，在自然界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的质的变化。现代科学更加精确地断定，原子核电荷数量的变

化，引起元素的质变。生物的物种演化，由旧物种到新物种的转化，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渐进性的进化和突变式的革命变革互相交错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时就会引起生产方式的质的根本变革，就会发生社会革命，实现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人的认识，由肤浅的表面的认识，进到深刻的、规律性的认识，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事物所分有的或多或少运动的量的不同，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会引起事物的质变。有机化学可以证明这个原理。例如普通酒精（乙醇）和甲醚，它们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原子、六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但是由于这些原子之间排列顺序不同，就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化合物：酒精（乙醇）是液体，在78度时沸腾，能以任何的比例和水混合；而甲醚则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酒精和甲醚的化学性质也很少相象。量变引起质变规律的这一表现形式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例如在战争中，同等数量和素质的军队，由于集中使用或分散使用不同，引起战斗结果的变化也是常见的事。

在一切事物的发展中，量变是质变的准备，没有一定量的变化，不可能发生质变。量的变化积累起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质变。事物的质变，决不是偶然地、无缘无故地出现的，而是经过量变过程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不以量变为前提，不可能发生质变。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一一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

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

十九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的“激变论”认为，有机界的变是由于突然性的灾变所引起的。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它实质上是否认事物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认为生物本身是不会发生质变的，生物物种的变化只是由于某种神迹创造的一些新物种来代替那些被突然性灾变所消灭的旧物种。

在社会生活中，无政府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举行社会的革命变革，不需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和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他们不愿作艰苦的细致的革命准备工作，而把希望寄托在偶然的、侥幸的事件上。这种观点违反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必然碰壁。真正的革命者，不仅要有勇于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精神，而且在根本变革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时，要耐心细致地进行量的准备工作。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事物的发展。

量变只是质变的准备，它决不能代替质变。量变、渐进，进化只是事物数量方面的变化，并不是事物性质的变化。只有质变、飞跃、革命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才是事物由旧质转化为新质的决定环节。旧质限制了量的活动范围，如果不通过质的根本变革，量的变化就不能超出这个限制范围；发生了质变，才能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量的发展。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他又说：“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都不是一条不间断的量的

渐进线，量的渐进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中断，即引起质变、飞跃。事物通过渐进过程的中断，才能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由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转化。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化，是通过革命的急剧变革实现的。物体的物理形态和化学形态，由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也是通过根本质变实现的。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变、飞跃、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就不能实现由旧质到新质的转化。因此，否认质变、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就是从根本上否认发展、否认辩证法。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一切变化都归结为纯粹的量变。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鲁宾在《论自然》中说：“石头、槲树、马，不是人，但在它们中间，可以多多少少地看到人的粗形。……在石头和植物中，可以找到同样的生命的主要原则，和在人类机体所找到的一样；一切差别是在于这些形质的组合，在于各种器官的数量、比例、排列和形状。”这种观点实际上否认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死亡。

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以庸俗进化论的形式和唯物辩证法相对抗。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改良主义者总是利用庸俗进化论为其反动的政治观点服务。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否认根本变革，主张以“进化”来代替革命。他说：“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它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时期，一贯地坚决反对革命。修正主义者所贩卖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也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因此，坚持质量互变的原理，对于粉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新旧两个方面，当旧的一方居于矛盾主要方面，而新的一方居于非主要方面时，事物的性质暂时不起变化，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矛盾斗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方面就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它战胜和克服了旧的方面，于是事物就发生根本的质变。例如，液体的水的分子之间，具有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热扩散倾向这两个矛盾方面。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温度由0度增长到100度的过程中，水分子的热能虽逐渐增长，但凝聚力总的说来始终居于支配地位，这时液体只显现温度升高的量的渐变过程。达到了100度的界限时，水分子的热扩散作用就变为主导的力量，水就迅速地转化为蒸汽。又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矛盾的发展处在量变阶段。无产阶级经过长期革命准备，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就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根源，所以质量互变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的表现形态之一。宇宙间矛盾运动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事物循着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途径，实现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无限上升的发展过程。

三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统一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不是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而总是互相交错的。

整个事物发生根本性质的变革之前，它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有许多部分的质变。这种部分的质变，或者表现为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表现为就全局说来性质未变而其个别部分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这种部分的质变，对事物的总的质变来说，是较小范围或较小规模的飞跃。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飞跃，常常要通过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这就是说，只要事物发展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改变，事物仍然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矛盾运动的复杂情况，事物的某些局部和某些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的发生，使事物发展过程显出阶段性来。

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这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认识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例如蚕的一生，从蚕到蛾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蛾生下来许多蚕卵，最后死了，完成了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但是，在从蚕、到蛹、再到蛾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显然有部分质的变化。因为蚕跟蛹、蛹跟蛾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人从生到死，这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从童年到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些阶段的发展，都是部分质变的表现。

人死了，就达到根本的质变。事物的根本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例如，封建社会在其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以前，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转化、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化，都表现出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也是通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而完成的根本质变。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在集体所有制的根本性质上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从合作社的所有制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也是集体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今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将经过若干阶段性的变化，若干部分质变，而从现阶段的三级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还常常表现为全局性质未变，而某些个别部分发生性质变化。由于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我国的民主革命中，总的量变过程中个别部分发生性质变化的情形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取得政权、打倒蒋介石以前，从全局说来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但是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我党却在农村建立了许多块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地加以巩固和扩大。在革命根据地内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和国民党统治区域里的革命力量增长的情形是不同的，因为在这里发生了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虽然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不

能不受着全局的制约，它和一九四九年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有着性质的不同。这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对于促进全局的质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民主革命就是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然后夺取了全国胜利的。

在自然界也有全局性质未变而个别部分发生质变的现象。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由0度到100度，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达到100度时，水才大量地迅速地转化为蒸汽，形成根本的质变；在这以前，也有部分分子由于获得的能量较大，突破了它们同其他分子之间的凝聚力的束缚，首先汽化，这也是个别部分的质变。

部分质变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质变促进总的量变，并为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创造条件。当然，部分质变本身也必须有量的准备，只有量的准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起部分质变。

应当指出，不能把事物的部分性质的变化当作根本质变，否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前边我们指出，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是一种部分质变，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象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因为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丝毫也没有变化，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变化。

不仅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而且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质变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在质变过程中也有量变，即：新的质大量增长，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占领广阔的地盘，代替旧的质而取得支配地位。这个过程就是质变中量的扩张的过程。例如，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全国农村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

的根本质变，这个高潮一经到来，农业合作社就在全国各地一大批一大批地连续不断地出现，这就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综上所述，事物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运动，表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又转化为量变；在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中有量的扩张；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

四 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任何事物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都是通过飞跃即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来实现的；但是，飞跃的形式却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指出了飞跃的多样性，他说，质变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以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的。这是因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外部条件，都具有特殊性的缘故。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外部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采取某种特定的飞跃形式。

自然界的飞跃和社会生活中的飞跃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飞跃是客观规律自发地起作用的结果，而社会生活中的飞跃，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实现的。

阶级社会里的飞跃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飞跃，又具有不同的形式。阶级社会由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飞跃，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互相敌对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矛盾，而阻碍飞跃的反动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它拚命利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压迫和绞杀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因此，这里的飞跃，便表现为剧烈的阶级冲突，表现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摧毁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的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

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因此，这里的飞跃不是表现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不断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因素，把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到新的阶段，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来实现的。例如将来有了条件时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飞跃，由社会主义制度到共产主义制度的飞跃。这种变革也是社会革命，不过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社会里的革命罢了。

自然界的飞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中的飞跃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和社会的飞跃有的采取爆发的形式，有的采取非爆发的形式。

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它是新事物通过和旧事物的剧烈的外部冲突，战胜旧事物的根本质变。自然现象中的火山爆发，热核反应等，都是爆发式的飞跃。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一般地表现为爆发式的飞跃。

非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在这种飞跃形式下，旧事务向新事务转化时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类人猿变为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没有外部冲突的飞跃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而不采取外部冲突的解决办法。

实际生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种矛盾的解决，不需要采取爆发的方式。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

通常是要采取爆发式的飞跃形式。但是在我国工人阶级专政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可见，飞跃的形式是可以随着事物矛盾性质的转变而变化的。由于矛盾的复杂性，还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总的飞跃过程是爆发式的，但并不排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个别的非爆发式的飞跃；一个总的飞跃过程是非爆发式的，但其中也可能出现个别的、部分的爆发式的飞跃。

飞跃在时间上的持续，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形。飞跃和进化相比无疑是一种迅速、急剧的变化形式。爆发式的飞跃固然是这样，非爆发式的飞跃也是这样。但各种事物的飞跃时间的长短却是不同的。某种飞跃时间的长短决定于它的质变过程的特点和条件。有些飞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而另一些飞跃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列宁批评了那些认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和苏维埃民主制的任务可以一下子解决的人，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

事物的内部矛盾都具有特殊性，它们和外部条件的联系又是复杂的。我们对飞跃形式，必须采取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地看待，不能把一种飞跃形式当作一切事物的飞跃形式。在实际斗争中，认清特定事物的飞跃形式，对于促进事物的质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虽然飞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何种形式的飞跃都是质变，都是旧东西的死亡和新东西的产生，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过程。恩格斯指出，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我们既要看到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又要在飞跃形式的多样性中把握它们的共同本质。这样才能坚持彻底革命

的路线，根据客观事物固有的飞跃形式，采取适当的方法，促进事物的革命变革。

质量互变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这个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一。量变质变的互相转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进一步反映了不仅在新旧事物之间，而且在同一事物、同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不能脱离革命发展阶段论来孤立地对待不断革命论，也不能脱离不断革命论来孤立地对待革命发展阶段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总是教导我们，不要超越客观事物固有的阶段性，把下一阶段才能做到的事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但又要在上一阶段给下一阶段作适当的准备，并且在发生根本质变、全局质变或者部分质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抓住时机，采取符合客观事物固有的飞跃形式的恰当方法，把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使前一阶段和下一阶段衔接起来。

第六章 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规律，揭示了旧事物灭亡和新事物产生的规律，并且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螺旋式、波浪式前进上升的性质。

一 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

在前进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而否定的方面则是促使它灭亡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作为两种对立的力量互相斗争着。这样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否定的方面战胜了肯定的方面，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就使事物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事物的否定。因此，否定就是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就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引起否定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

任何事物都具有内部矛盾，因此任何事物都是要被否定的，都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淮南子·原道训》中曾写道：“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王船山说：“乱极而治。”这都是朴素地说明了事物会否定自己走到它的反面的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在它产生之时，已经孕育了否定自己的因素。新事物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就是事物内部这种否定的因素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于某种外力的作用。外部的条件总是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起作用的。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例如在植物的正常发展中，种子总是要被植物所否定的，这种否定是种子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又如在社会领域中，一个社会形态为另一个社会形态所否定，这种否定是前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任何东西的灭亡都是转化为另外一种事物，而不能化为绝对的无。辩证法的否定决不是简单地宣布没有。数学上的“零”是对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它具有丰富的内容。恩格斯指出：“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线，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

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环节，不否定旧事物，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任何现实存在的东西，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因此对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说，有它存在的理由，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它就会逐渐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变成了阻碍发展的消极的东西，只有经过否定，新东西代替了旧东西，事物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在生物界的发展中，一个物种转变为新物种时，该物种的某些特征消失了。这些旧特征在原有条件下，有维持生物生存和繁殖的积极作用。当条件变化以后，它们就成为消极的方面，使生物不能适应于新的条件，它们必然要被适应于新条件的新特征所否定。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候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生产关系就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东西，它就要被否定，为另一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

新事物是对于旧事物的否定，因此，它和旧事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一切新事物又都是从旧事物的内部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和旧事物之间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旧事物没有任何联系的新事物是没有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是指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但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

抛弃，而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克服旧事物，保留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正如质变的形式是多样的一样，否定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以社会生活为例，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是一种否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是另一种否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在封建社会腹内孕育成熟。在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的时候，对封建社会的制度、传统保留得很多，例如在法律方面往往“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要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彻底的决裂。

但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仍然保留了并改造了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积极成果。可见，虽然否定的形式是多样的，但是不论哪一种形式的否定都是既克服又保留。

形而上学的否定观与辩证的否定观根本不同，在它看来，否定就是简单抛弃、一笔勾销，其中没有任何的保留和继承。例如，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哲学就是采取形而上学的否定，当他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也不加分析地一并抛弃了，这就好象倒洗澡水时，连盆里的婴孩也一起倒掉一样。恩格斯批判了这种简单的否定，他说：“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

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时，同时救出了它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在否定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时，又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地否定，才能把哲学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阶段。

当旧事物被新事物否定时，渐进过程中断了，新旧事物之间有一条确定的界线，这就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同时，旧事物的否定又是该事物的渐进过程发展的结果，它表现着新旧事物之间的一定联系，表现着发展中的连续性。否定就是这种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它既是从旧事物向新事物变革的环节，又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

辩证的否定的原理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由于否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所以我们对待一切旧事物的态度，就应该是一方面同它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从其中吸取一切可以吸取的东西，加以革命地改造。例如对待文化遗产就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首先必须和过去时代的旧文化决裂。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它不能搬用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同旧文化实行决裂的同时，又必须利用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如果脱离了过去时代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它就无从建设和发展起来。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继承我国的历史遗产的必要性时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

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又指出，在继承以往的文化遗产时，“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有区别有批判地继承，必须把过去的文化“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历史上每一种新的文化在实质上都不可能是对过去文化的全盘继承，也不可能是在过去文化的全盘抛弃。至于批判什么，吸收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

既然批判和继承是辩证的统一，因此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一种是肯定一切，另一种是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错误在于它根本否认了事物的发展，抹煞了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界限，只要继承，不要变革。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就是属于这种错误。持这种观点的人，抱残守阙，拾古人的余唾，对于封建性的糟粕大加颂扬，企图以此来抵制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发展。否定一切的错误在于割裂了新旧事物之间的历史联系，只看到变革，看不到继承。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就是属于这种错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一切以往的文化遗产都是糟粕，无产阶级必须完全抛弃它，在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很“革命”，但是如果真的按照这种观点办事，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根本无法进行，因而实际上就是取消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种观点被列宁彻底粉碎。我国医学界曾经出现过一种错误观点，对于我们祖先在长期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十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极端蔑视，这也是一种虚无主义观点。这种观点遭到了党的驳斥。

二 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式或波浪式运动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阶段走向否定阶段的。一般地说，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是事物发展两次向对立方面转化的结果，这使它在外表上会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好象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用列宁的话来说，“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但它在实质上是和旧东西根本不同的、更高级的新东西。《易经·爻辞》中讲：“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这都包含着事物经过否定而达到周期性变化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没有得出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爻辞》中的“复”，老子的“返”，都带有循环论的倾向。

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地质学证明了地质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旧地层不断破坏和新地层不断形成的过程。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及风化等等的作用而碎裂，这是第一次否定。这些碎裂的物体，一层层淤积在海底，由于海水的高压又形成了新的岩层，这就是否定之否定。有些地方海底高出海面，于是又使这种最初的冲积层的一定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等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而后冷却凝结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亿万年间旧地层不断破坏，不断地形成新地层。这是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积极结果，就形成了由复杂的化学元素所构成的、适宜植物成长的土壤。

在生物的生长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例如，麦子的生长就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麦粒被由它生长起来的植物

所否定，经过出苗、拔节、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麦粒，麦粒一成熟，麦杆即形枯萎，它又被否定。又如蚕的生长也要经过一个从蚕卵到蚕又到蚕卵的过程，蚕否定了蚕卵，新的蚕卵又否定了蚕。在否定之否定阶段所出现的麦粒或蚕卵已不是肯定阶段的麦粒或蚕卵，在数量方面也多出很多倍。如果经过人工的培育，在品种方面还会大大地改进。

在社会领域中，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也是普遍的。例如在原始社会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体生产能力的提高，就产生了占有的社会公共性质和生产的个体性质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原始的公有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私有制所否定，进入了阶级社会。在私有制内部，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逐步加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得到高度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成了严重的冲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又走到了它的反面，被公有制所否定。这种公有制不是原始的公有制，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为原始公有制所不可比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这时，所有制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的性质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开始了社会发展的的一个崭新阶段。又如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不可能出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原始地结合着的，这种情形使得脑力劳动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到了阶级社会，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原始结合的否定。这种分工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又摧残着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精神才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但在长时期内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个社会成员的智力和体力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结合，这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才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否定之否定。

在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从哲学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整体的认识和对部分的认识，只有在对部分的认识的基础上，对整体的认识才可能是清晰的，深刻的；只有在对整体认识的基础上，对部分的认识才可能是全面的、正确的。这种矛盾的展开和解决，就形成了古代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初步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般状况。它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局部上显得十分简单粗糙，因此它对于整体的认识也是笼统的和模糊的，不足以帮助人们认清复杂的客观现象，它终于要为形而上学所否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虽然注意了对自然界的各个个别部分的研究，注意到了个别部分的现状，但是却割断了这个部分同其它部分的联系以及它自身的历史联系。它在局部上虽然是比较深入的，然而在整体上却是错误的。它终于又被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所否定。只有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才提供了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和部分认识的统一的方法论。

相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要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即事物运动完成一个周期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只有考察完一个运动周期，并且在考察这种运动周期时，对于推动这个运动的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把握了这个过程的具体特点，才能揭示出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的作用。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一个现成的公式到处乱套，是错误的。

事物的发展所呈现的周期性，并不象循环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循环运动，而是一个前进上升运动。循环论的根本错误在于

把一切事物看成是简单的周而复始，实质上否认了事物的发展。例如，战国末年的驺衍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五行学说加以曲解，附会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上去，创立了所谓“五德终始”说，即把朝代的变换看成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的循环，没有发展，没有进步。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这种理论宣扬人类必将退回到以前的时代，并且提出“回到中世纪去”，“回到原始时代去”等反动口号，它是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的恐惧和绝望的反映。一切循环论，无论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虽然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但都是片面地抓住了事物发展中的某些重复现象，夸大了这些现象，把它说成是绝对的循环，并且认为这种绝对的循环是一切事物的正常秩序。

和循环论根本不同，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在其发展的周期中虽然有某些特征、特性重复出现，但是这种重复决不同于循环。第一，它仅仅是在某些特征、特性方面的重复出现，仅仅是“仿佛向旧东西的回复”第二，它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重复，决不能用事物发展周期中的某些重复现象来抹煞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否定之否定阶段不是简单地回到肯定阶段，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了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运动。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地前进上升的运动，但它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这个运动的总的的趋势是向上的、向前的，但是这个运动的上升道路和前进道路又是迂回曲折的。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直线式的，否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是错误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就是犯了直线性观点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拒绝作艰苦的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工作，拒绝采取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曲折的、然而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却要发动攻打中心城市，致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左”倾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拒绝采用主动退却、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灵活的战略战术，而采取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和敌人硬拚的方针，致使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丢失。“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战略退却的理由是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同志说：“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直线性的观点对于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根据事物发展进程的必然的曲折性来有效地推动事物前进。

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运动、前进运动，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出现某种局部的、暂时的倒退现象。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所出现的倒退现象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因而是相对的，而事物的上升运动、前进运动则是绝对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趋势和迂回曲折的途径，它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例如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的应用，这是完全错误的。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当作制造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杠杆。他把一切事物都硬塞到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的框框里，常常闹到牵强附会的程度。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阶段即所谓合题被了解为矛盾的调和。黑格尔虽然是第一个猜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哲学家，并且利用了他当时所能掌握到的丰富知识来证明这个辩证规律，但他使这个规律受到了唯心主义的严重歪曲。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黑格尔的错误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和黑格尔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事物的某种先验的公式。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它的表现形式和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只能把它当作研究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作证明的工具。

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既然事物的发展无论如何迂回曲折，但总的方向是不断前进的，因此，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不为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不为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始终认清前进的方向和革命的目标，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既然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波浪式的，因此，一个革命者又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客观发展中的各种复杂情况和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障碍，进行充分的估计和认真的分

析，随时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循着曲折的道路不断前进。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一方面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另一方面又指出：“……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把最坚定、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所以才能在任何曲折复杂的环境中，引导全国人民绕过一切暗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三 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变动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青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事物不断死亡，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反复地进行着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最终必然死亡而为新事物所代替。

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步的必然向前发展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而旧事物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在日趋灭亡

的和逐渐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东西。识别一个事物是不是新事物，不能只以出现时间的先后为根据。新出现的东西并不都是新事物。如在某一生物物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性状。这些性状并不一定都是新生事物，都具有发展的必然性；只有那些适应于周围环境的、具有发展前途的性状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只有它们才能经过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那些不适应于环境的性状，没有发展的必然性，它们在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中会逐步地被淘汰。在社会发展中只有同生产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新兴阶级和社会集团才是不可克服的新生力量。凡是同新兴阶级相联系、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事物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没落，当然还会不断出现各种新花样，但是它们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最终灭亡的命运。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因此，新事物在最初的时候，总是比较弱小，而旧事物则往往比较强大。然而历史的逻辑却永远是：暂时显得弱小的、代表进步方面的新事物，战胜那些表面强大的、代表保守方面的、趋向灭亡的旧事物。斯大林说：“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

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新事物的不可战胜性，是由客观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和新事物的本质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新事物的产生总是适应着客观发展的需要，因此，一切新事物虽然在其初出现时暂时还弱小，却有着广阔的发展余地和光明的未来。相反，旧事物则由于其日益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丧失了其存在的必然性。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前所述，它否定了旧事物中一切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并且加进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内容。因而它具有旧事物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新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成语以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所形容的那样。在社会领域中，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新事物代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力量，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总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新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总是要遇到衰亡着的旧事物的抵抗，因此，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新事物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不管它如何受挫折，遭失败，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它的。在社会领域中先进的阶级常常遭到反动阶级的镇压，它在一定时期的斗争常常失败，但是对于先进阶级来说，失败是胜利的先导。相反，旧事物不管它如何反抗、垂死挣

扎，却最终不能逃避灭亡的命运。它每经一次失败，就越接近于死亡。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了人民和反动派两种根本相反的逻辑。他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民的逻辑和反动派的逻辑适用于一切新事物和旧事物。历史上第一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尝试的巴黎公社，虽然遭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但是巴黎公社的旗子却并没有倒下去，而且永远不会倒。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起义失败，但终于在1917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史，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曾经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但最终失败的不是人民，而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新事物总是要通过同旧事物的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新事物始终采取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态度，这就为新生事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会存在着新和旧、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因此，新事物仍然必须同旧事物进行斗争，才能得到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实践表明，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中，新

事物只有战胜了旧势力、旧意识的阻碍，才能得到健康的、迅速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关于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和体现者。在一百多年以前，当国际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告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他们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过程中，一贯彻底地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教育了和鼓舞了干部和群众。他最善于发现并热情支持在群众中涌现的一切新事物。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只有六户的小合作社，曾经出现了三户贫农不顾其他三户老中农的中途退社，把合作社的组织坚决保留下来的事例。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支持了三户贫农的这一做法，并且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新事物在初产生时总是比较弱小的，我们要善于鉴别新事物，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发现它。新事物在刚出现的时候总会有若干缺点，我们绝不应该对它的某些缺点采取讥笑、挑剔、非难的态度，而应该细心地帮助它克服缺点，热情地关怀它和扶植它。当然对新生事物的扶植应该根据客观条件和它的发展规律，而不要采取拔苗助长的态度。对新事物始终保持敏锐的感觉和热情关怀、细心扶植的态度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列宁说：“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

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科学的各部门都有自己特有的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如经济学有商品、价值、货币等范畴。哲学范畴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些最普遍的本质的概念。

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范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范畴先于自然界而存在，是客观事物的本源。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范畴看做纯主观的东西，是用来整理紊乱的自然现象的工具，在他们看来，自然现象本身是没有规律的。

哲学范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一经产生，反过来又指导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一定的范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一定阶段。范畴的不断丰富和日益精确，意味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逐步深入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逐步提高。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的辩证关系的反映，是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前面已经讲过的对立和统一、质变和量变、肯定和否定等范畴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此外还有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各对范畴，它们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补充。其中每一对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联系和矛盾。

一 本质和现象

本质和现象是客观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本质决定于事物的内在

矛盾，是事物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由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规定的。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以前（这个矛盾的解决只能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消灭），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本质和规律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因此，认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揭露了我们的时代的基本矛盾、本质，才能掌握住时代的发展的规律。

现象是指直接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外表形态。现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事物的本质通过现象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如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侵略、掠夺的本质，既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又在经济或文化方面表现出来；有时用战争的方式出现，有时又用和平的方式出现。帝国主义者有时赤裸裸地摆出凶残的面孔来镇压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有时摆出一副笑容可掬的伪善的面孔来进行欺骗。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其中每一现象都只是本质的某个侧面的表现。现象是比较片面的、表面的、局部的，它是多变的、易逝的。就事物的总体说来，现象比本质丰富、生动；本质比现象深刻、稳定。

现象和本质是构成客观对象的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任何现象又都是从某一特定的方面表现出事物的本质。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它甚至给人一种和事物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如帝国主义施放“和平”烟幕，来掩盖它好战的本质。但是假象也是本质的某种表现。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

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叫嚷“和平”，是和它的扩军备战的活动相配合的。这种假象又是帝国主义极端虚伪和狡猾的本质的表现。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

现象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本质是贯穿于各个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自然界具有无数的、多变的颜色，“五光十色”还不足以形容它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极其不同的颜色有着共同的本质——电磁辐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因供求关系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等复杂条件的变化而经常发生波动。同一商品的价格常常是多种多样的。但同一商品的不同价格却是同一的本质——价值的表现。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着商品的价值。

现象是本质的个别的、具体的表现，本质是同类现象中的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如前面所说的，不同价格的同一商品都具有同一的价值）；现象是丰富多变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如表现商品价值的价格是多变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现象常以曲折的形式表现本质（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通过商品交换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现象是表面的，它直接呈现在人们的感官之前，本质是内在的、隐蔽的、深刻的，人们经过抽象思维才能认识它等等。因此，现象和本质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它们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面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康德片面地夸大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否认它们的统一。在他看来，本质是“自在之物”，是处在人们认识范围以外的东西；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按这种观点，人们就不可能取得对于客观世界的科学知识。现代主观唯心主义特别明显地否认事物

的本质，否认自然界和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合乎规律的本质联系。德国的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宣称，整个世界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哲学也否认认识事物本质的可能或否认事物本质的存在。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社会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的哲学。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曾经大叫“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他要人们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和个别零星的问题，反对人们去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本质的东西——阶级斗争。这种作法无非是想使广大人民不能分清敌我，辨明是非，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胡适把旧中国社会贫穷和落后的原因，归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点。他完全抹煞了事情的本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存在。

现象只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不能把认识局限于表面的现象。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如果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把某些局部现象误认为是事物的全体和本质，当作普遍真理，就会被现象所迷惑，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为了认识本质，就要从研究大量的现象和现象的各方面的关系着手。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并对大量现象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在事物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同的趋向：主流是事物发展中由本质决定的基本趋向；非主流不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在农业合作化的过

程中，广大的农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事情的主流。在同一过程中，部分落后的农民不愿合作化，这不是事情发展的主要趋势，只是发展中的支流。

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在大量现象中区分主流的东西和非主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不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是极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二 形式和内容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形式，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是指那些内在的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内部结构或内容的表现方式等等。每一种化学物体都以一定的化学元素作为自己的内容，也都有一定的构造作为自己的形式。以二氧化碳为例，内容就是两个氧原子和一个碳原子，形式就是它们的结合方式。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只有按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同生产资料是分离的，只有在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着人对人的残酷剥削。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的财富，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和全社会的利益进行生产。这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体现了人和人之间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由社会生产关系

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而言是形式，它表明在经济领域中人和人（阶级社会中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怎样表现于政治领域，表现于文艺、道德和哲学等等意识形态之中。如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就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政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制以虚伪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形式，表现着同样虚伪的人和人之间的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的内容。

事物往往具有两重形式：一重是和内容不直接相干的、非本质的外在形式，一重是和内容紧密相关的本质的内在形式。一本文艺书的形式，可以是精装，也可以是平装，这是外在的形式，它和书的内容不直接相干。而艺术形式则是同文艺作品的内容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内在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不仅文艺作品如此，一般宣传品没有活泼生动的人民语言形式，“语言无味，象个瘪三”，那也是达不到宣传的目的的。在思想斗争和学术讨论中，不采取充分说理的形式，“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和战斗力的。因此，生动活泼的语言，充分的论证说理，是我们在进行宣传和学术讨论中不可少的内在的形式。在说到内容必须具有和它相适应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所指的首先是它的内在形式。

内容和形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它同时又是语言形式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事物的形式必须适合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例如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各种形式，是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内容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在不同民族存在的条件下采取民族的形式，是由它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尊重各民族自己的特点的内容决定的。内容决定形式并不是说同一个内容只能有一种形式，由于条件不同，它可以有多种多样形式。

正因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反对只注意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只有具备充实的内容，才可能有完美的形式。就写文章来说，“心苟未明，励劳憔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有些人不深入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脑内空空，写起文章内容贫乏得可怜，只得搬用一些华而不实的辞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们不了解“木体实而花萼振”；“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还有些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在文章中，“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这是一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这“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有两种基本情形：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它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当形式不适合于内容时，它对于内容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当生

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生产力就得到迅速的发展，相反地，当生产关系已经同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应时，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和破坏。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形式的变更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所以，在注重内容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形式的作用。善于适应内存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选择最适当的形式，促进内容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我们党采取多种形式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整风运动的形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运用恰当的形式以促进内容发展的生动例证。

新内容的发展，不但要求新形式来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并可能利用旧形式来为自己服务。新事物在萌芽的时候，它的内容就常常是在旧形式中发展的。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在一定情形下能利用旧形式的某些方面。对于旧形式中一切只能为旧内容服务的东西必须进行根本的革除，而对于其中某些可以为新内容服务的成分，又应当在改造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利用，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根本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同时又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它发展的需要，保存着商品交换以及和它密切联系的货币、银行、信用等等经济形式，并对它们进行根本的改造，把它们纳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中来，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利用旧形式，不是同旧事物，旧内容相妥协，而是为了更好地同它作斗争，更彻底，更迅速地消灭旧事物、旧内容，更有效地发展新事物、新内容。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

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在文艺方面也是一样，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并不拒绝利用，这些旧形式经过了改造，增加了新内容以后，也就完全可以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内容是比较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对于内容来说则是相对稳定的、比较不活跃的。因此，形式和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贯彻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在最初，形式同内容是相适合的，但这种适合只是基本的适合，而不是绝对的适合，其中仍然存在着矛盾。随着内容的发展、新内容的产生和壮大，二者就由基本上适合逐步变为基本上不适合，矛盾激化了，甚至形成尖锐的冲突。这时，形式不仅不再促进内容的发展，相反地，变成内容发展的桎梏；已经变化了的内容要求改变不适合于自己的旧形式，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新形式。新形式的产生，意味着旧矛盾的解决，但在更高的基础上又出现新的矛盾。随着矛盾的发展，形式和内容又由基本适合变为基本上不适合，再一次需要改变旧形式，创立新形式。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这样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由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列宁说：“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根据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我们应当自觉地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据内容发展的需要，抛弃旧形式，采取为内容发展所要求的新形式，为内容的不断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不顾内

容发展的要求，抱住那些过了时的形式不放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承认形式在和内容相适应的时期对于内容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适合于内容发展的形式，要使它相对地稳定下来，并逐步趋于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其在相当时期内的积极作用。如果忽视发展的阶段性，不顾条件过早地否定某种形式，那也是不对的，这样不仅不能有助于内容的发展，相反地会对内容的发展起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对于某种形式是采取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适合于内容的性质，是否有利于内容的发展要求。

三 原因和结果

因果联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或一些现象，都会引起另一个或另一些现象的产生；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都是由其他的现象所引起的。其中，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是原因；由于原因的作用而产生的现象是结果。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是原因在先，结果在后。然而，并不是任何先后相继的现象都能够构成因果关系，如白天和黑夜等。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秩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

唯物主义认为，现象的因果联系具有客观的、普遍的性质。任何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在客观世界中，无原因的结果和无结果的原因都是不存在的。这一思想是科学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决定论的原则。与此相对立的是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它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因果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最好证明。人们在实践中，不仅重复地看到某一种现象之后必然出现另外的某一种现

象，而且可以创造或改变某种现象，从而得到人们预期的某种结果。在实践的不断发展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无论怎样错综复杂，它们之间都有着严格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制约性。有些现象的原因暂时还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一定存在，并且终究是会被发现的。海王星的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行星尚未发现之前，法国天文学家莱维利叶曾经发现和考察了天王星运行“摄动”的现象，肯定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必然是某个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根据太阳系学说的数据推算出这个行星的位置。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在1846年用自己的实际观察证实了这个行星的存在。可以说，科学首先就是关于产生各种现象的原因的认识，不揭示事物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就没有科学的认识。

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如休谟认为，因果性的观念是由于某些感觉不断重复出现所引起的，他把因果性归结为人们的心理的习惯。康德把因果性看作是人们用“整理”感觉经验的一种先天的悟性形式，它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目的论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都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先安排好的目的，都是神的意志作用的结果，只有“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反对这种错误的、反动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据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因果联系而产生和发展的，人们头脑中的因果观念，只不过是现实事物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反映。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因果观，不给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保留余地。实践是对唯物主义因果观的最好的确证，也是对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因果观的最有力的驳斥。

非决定论在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占着统治的地位。马赫宣称：“原因和结果是我们思维的创造物……。”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詹姆士说：“关于为什么总有某种事物出现于世上，我所能想出来的唯一现实的根据，就是有人希望它出现。”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用唯意志论的观点来否认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制约性（社会中的因果联系早已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论证，并为社会生活实践所证实），这是反动阶级垂死挣扎在哲学上的反映。帝国主义者妄想依靠政治上、军事上的力量随心所欲地决定经济生活的过程，决定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内经济危机的深刻化，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巩固和强大，这一切都证明客观因果规律是帝国主义者的“意志”无论如何也抗拒不了的。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企图从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成就中寻找反对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论据。他们认为在微观世界中，电子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因果制约性。事实上，现代物理学的每一步发展，都进一步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因果规律。人们在利用原子能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微观世界中因果关系客观性的最好证明。

物质世界是无限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因此，只有当我们把所要考察的特定对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引出来，才能具体地确定：某一现象为原因，另一现象为结果。由于客观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同一现象在一种关系中是结果，在另一种关系中又是原因。例如摩擦生热，热是摩擦的结果，而热又能成为引起燃烧的原因。在一定条件下原因和结果可以相互转化，一种原因产生一定结果，这个结果又反过来影响原因。例如政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是最后的根本的原因，但政治反过来又会成为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原因。

形而上学者看不到因果联系的复杂性，认为原因只是原因，结果只是结果，二者不能互相转化。这种机械的因果观不能正确地说明事物的联系。

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结果往往不只是一个原因所引起的，而是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例如农业上收成的好坏，就是自然气候的变化、耕作技术水平、人的主观努力程度等等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多种原因中，又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等的区别。同一原因，在不同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的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由于主观努力程度的不同，产量就会大不相同。要研究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必须全面地揭露造成某个结果的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各个原因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且具体分析因果联系中的各种条件。

正确地把握因果联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条件。在工作中，只有正确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善于估计工作的后果，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在总结工作经验时，不仅要肯定成绩，发现错误，而且要找出取得成绩的原因和产生错误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扬已有的成绩，避免重复发生同样性质的错误，分析成功的和错误的原因也就是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

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肯定我党历史上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同时指出在斗争方法上有缺点，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

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把握了事物的因果联系，才能通过实践消除产生坏结果的原因，实现对我们有利的结果。

四 必然性和偶然性

当我们深入地观察和研究因果联系时，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必然性就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的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趋向，必然性产生于事物的内在根据、本质的原因。例如，种瓜得瓜，磨擦生热，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与此相反，某一偶然的现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外在的，非本质的原因而产生的，它对这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说来，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例如，某一株农作物在它整个生长期中是否会遇到冰雹的灾害，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个国家正好在哪一天取得胜利等等。

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必然性和偶然性虽然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的两种不同的置情形，但它们之间绝不是互不相关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这种矛盾现象是由于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产生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是由它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这种必

然趋势的实现，又因为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许多偶然的联系而发生多种多样的摇摆和偏差。地球上的北温带区，从一月到七月，气温逐渐增高，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这是由太阳光对该地区从斜射到直射的变化这一根本原因所决定的。但是，在总的过程中，某一天的气温是否一定比前一天高，就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的云层分布、气流的个别特点等复杂条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气温上升这个总的必然趋势，是在无数偶然的波浪起伏的复杂变化中实现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胜利的持久战，总的过程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必然的，它是由敌我双方矛盾的根本特点及其变化的总趋势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所决定的。但是，由前一阶段进入后一阶段的具体时日，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最后胜利哪一天到来等等，又具有偶然性，它受着国际国内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由此可见，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事物发展的进程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科学的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偶然现象中，揭露出事物过程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

形而上学者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绝对对立的，并由此提出两种极端相反的错误看法。一种观点是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成必然的，否认偶然性的存在，认为偶然性只是由于人们

不知道某些事情发生的原因而产生的纯主观的范畴。在这种观点看来，这一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是必然的；这条狗的尾巴是五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也是必然的；某一个帝王的消化不良，侵略者心脏里血液的沸腾等等，和战争的发生也都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它把事物发展中的根据和条件，本质的、主要的原因和非本质的、次要的原因相提并论。这种看法，表面上似乎是十分强调必然性，可是如果把一个豌豆荚中有几粒豌豆这一事实和能量转化、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等必然规律同等看待，就在实际上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纯粹的必然性，把事物发展中的一切细节都看成是早已注定了的，似乎人们只能消极地等待必然性的支配，这样，就把必然性神秘化而导致宿命论。这种对偶然性的了解是唯心主义的。事实上，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偶然的现象都有它的原因，并且可以被我们认识。在我们还没有认识某种偶然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它是偶然性，当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因时，它仍然是偶然性。

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观点，是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作偶然的，认为偶然性支配一切。例如，实用主义者胡适公开宣扬所谓“偶然论”的观点，他把任何细小的偶然事件都看作是对于历史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原因，借此来抹煞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他（即‘小我’或个人——编者注）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那大我（即宇宙——编者注）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种观点是反科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的、捉摸不定的，那末，人们就既不可能对客观事物的现状和发展前途有任何确定的科学的认识和预

见，更不可能依靠这些正确的认识和预见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只能消极地服从偶然性的支配，或者依靠偶然的命运进行盲目的冒险活动。这是现代资产阶级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常用手法，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在市场竞争中的盲目投机冒险行为在哲学上的反映。

必然性和偶然性不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物种发展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内部原因和外界条件的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最初只是某一物种非本质的、不稳定的性状。其中有些变异，因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断固定下来，最后使有机体发生根本的变异，产生了新的物种。原来偶然性的变异，就变成了该物种的必然性状，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反之，原来的必然性状在条件变化之后逐渐退化，失去必然性。它还可能出现，但已不再是稳定的，而是偶然的了，例如生物进化中的返祖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转化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中。在原始公社里，自然经济是必然的，产品的交换是偶然的现象。随着生产的增长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就从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

既然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我们就必须着重认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要善于根据必然规律来正确地规定我们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在我们工作中抱着“守株待兔”的侥幸心理，把希望寄托在偶然事件上，是极端有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不注意偶然事件。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在认识必然性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及偶然性，而要透过偶然揭示必然。要善于在实践活动中充分估计到各种偶然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

素来促进事物的发展，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要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弱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五 可能性和现实性

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比前面所论述的各对范畴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联系。

现实就是现在存在着的客观实在。现实性这个范畴并不是简单地说明个别事实的存在，而是客观实在种种联系的综合。现实是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现实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它既是过去的“现实”发展的结果，又是引起将来的“现实”出现的原因。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是由于它内部深刻的规律性，必然性所决定的，它的某些具体特点，细节又受着偶然性、可能性是和现实性相对而言的。某种事物和现象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它才会转变为现实。任何必然性都是通过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而实现的。

客观事物的发展所以是一个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由它内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包含着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根据。但是，只要这种转化还没有完成，他事物的出现终究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一方克服了另一方，这种可能性才转化为现实。生物有机体内部遗传性和变异性的矛盾，决定了一种生物有演变为另一种生物的可能性。当着在一定条件下，特定的变异性克服了某一种生物原有的遗传的保守性，新物种的产生才由可能性变为现实。

可能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客观的根据。不可能的东西在现实中没有客观根据，它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实现的。例如，石头孵出小鸡，永动机的制造，帝国主义本性的改变，反动派会发善心、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等等，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某一过程中某种事物、现象之所以可能出现，首先是由这一过程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没有一定的客观矛盾，就没有根据，就不可能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中，区分可能和不可能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人如果撇开可能办到的事不去办，硬要办那些不可能办到的事，只能是浪费精力。为了愚弄群众，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总是力图把种种不可能的事说成是可能的；同时又把可能的事说成是不可能的。

在可能性中，我们还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现阶段已经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已经可以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的问题；一种是只有在以后的阶段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不应该把它提到当前的工作日程上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把现在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看成只有在将来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根本不可能变为现实，因而失去远大的目标，丧失革命的信心。他们不去努力设法实现现在已经可能办到的事情。这样做，只能使他们自己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左”倾冒险主义者把将来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当做目前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要在当前就去实现将来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这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它和周围条件的复杂联系，事物发展的趋势往往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互相对立并不断斗争着的两种相反的可能性。例如一粒种子落入泥土中，有可能生根发芽，但也有可能不生根发芽。在具备了革命形势的时候，

发动革命斗争，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但由于敌我力量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错综变化，也有失败的可能。两种相反的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其中每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都必须具备自己特定的条件。在发展过程中对实现前一可能的有利条件就是对实现后一可能的不利条件；前一可能的增大就意味着后一可能的缩小；前一可能的实现就意味着战胜了后一可能性。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是由各种具体的条件决定的。但是，从总的趋势和长远的过程来看，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可能性是具有必然性的；旧事物战胜新事物产生的可能性即使成为现实，也只能是暂时的。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谈到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力量时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在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两种对立的可能性的矛盾斗争。两种对立的可能性的矛盾斗争，在自然界中是自发进行的。社会生活则不同，社会发展规律总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发生作用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社会集团或个人总是力求使对自己有利的可能变为现实，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性往往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支持着的。因此，变可能为现实的过程，总是通过人和人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来实现的。

在变可能为现实的过程中，客观因素是丝毫不能忽视的。在客观因素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主观努力可以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战争时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

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为了加速新事物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必须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各种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经过主观努力和积极的斗争，创设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力争实现好的可能性，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工作中，必须同时准备两手，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就是说，在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同时，估计到坏的可能性，并为克服坏的可能性积极准备条件，这样，才有利于去同坏的可能性作斗争，并且即使在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而能够有备无患，应付裕如，继续为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斗争。

第八章 认识和实践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一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就是人们的头脑对外间世界的反映。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出发点。人脑好比一个加工厂，它的原材料都来自客观世界，意识就是在人脑这个加工厂中对客观材料进行加工后的产品。如果脱离了客观世界，人的头脑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这点在前面《物质和意识》的一章里已经说过了。

认识和照镜子，摄影有相类似的地方，但又有着根本的不同。人脑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它具有镜子、照像机以及动物大脑所没有的特殊性能。它不仅能反映外间世界的表面现象，而且能深入地，正确地反映外间世界的本质和它的规律性。人脑的这种深入的，正确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取得的。这样的认识反过来又帮助人类实践活动取得积极的成果。因此，人类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世界平静的、呆板的、表面的反映，而是与实践紧密相联的深刻的、能动的反映。

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修改和加深自己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类的认

识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改变着人的主观世界——人类认识的能力。在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中，人们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经验不断丰富，眼界不断扩大，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不断提高。认识愈深入、愈正确，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愈有成效。人类的认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做了扼要的说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

在认识论问题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唯物主义的路线是从物质到意识，唯心主义的路线是从意识到物质。

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在人脑或灵魂以外有一个独立的神的世界或理念的世界，人的认识的来源不外是神的启示或绝对观念。如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的来源，是人的不死的灵魂对于在他诞生于尘世以前所居住的理念世界的回忆。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认识看做是人们心灵的自由创造和想象的产物。王阳明认为，一切知识的根源是“良知”，“良知”在人人心中，但为私欲所蔽，冲不出来，只要去掉这种障碍，知识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从贝克莱以来，经过马赫一直到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

主义者都认为，认识只是对自己感觉的整理，他们坚决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实用主义者胡适把认识的对象完全归结为各人自己的感觉。他说：“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轻、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是大不相同的。”根据这种推论，胡适断言，意识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实在倒是由于人的主观意识任意塑造的产物。他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的确，由于诗人和植物学者的主观状态不同，他们对景物的感受，“心目中的实在”也可能不同。但是无论诗人和植物学者的感受如何不同，他们的意识都是同一个客观存在的宇宙的反映，只不过反映的方面、重点不同罢了。胡适抓住了认识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加以歪曲和片面地夸大，得出了“实在就是感觉”，人的感觉不同，也就有不同的宇宙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有一些唯心主义者根据逻辑理论思维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的作用，把它加以歪曲和夸大，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把科学看做是纯粹理论思维的产物，并且以为数学是确切的例证。他们认为，数学是从一些先验的概念和公理出发，单纯用逻辑的方法推演出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

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恩格斯又指出：纯数学“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都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认识论上坚持从意识到物质的错误路线。

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路线的基础上，肯定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和各种形式的不可知论根本对立的。不可知论否认人们有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否认人们有完全反映客观世界的可能。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他片面地夸大了知识的无限性和个人生命有限性的对立，而不了解人类认识是一个世世代代的无限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引出了人们追求知识是徒劳无益的错误结论。在欧洲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休谟认为，人类的认识不能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在感觉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外间世界存在，是无法知道的，至于对世界本质的认识，那就更谈不到了。康德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并且承认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所引起的，但是他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人们只能通过感觉认识某些现象，而不能透过现象进一步认识外部世界的本质。感觉本是人们意识和外间世界相联

系的桥梁，但休谟和康德却把感觉看做是隔离意识和外间世界的鸿沟，认为感觉以外的客观世界是不可知的。或不能完全认识的。

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者和一些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荀子就明白地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费尔巴哈从感觉论的立场完全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反对了不可知论。他认为，自然界绝不隐藏起来，对象及其属性都是可以认识的，正如空气通过口、鼻和毛孔钻进我们体内一样；“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够的感官”，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认识到。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例如，黑格尔既然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把认识说成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那末，在他看来世界无疑是可以认识的。因为思想当然可以认识那早已是思想内容的内容。黑格尔正是在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所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空洞的，抽象的、设想出来的东西，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认识并不是把人和自然界“隔离开来”而是“结合起来”。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所有的哲学派别都不能彻底粉碎不可知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对驳斥不可知论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

了。”不可知论的哲学是在自然科学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为宗教信仰服务的理论。列宁指出：“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

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这是指可能性说的。就现实情况来说，自然界有很多现象对人类还是一个谜，有些谜暂时还无法解开。把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总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在每一个时代，人们的认识又是有限的。恩格斯说：在认识中遇到的矛盾是“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不可知论利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认识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来否认人类认识的无限的可能。人类认识的历史一再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我们暂时撇开理论思维对认识的作用不谈，仅就人的视觉来说，在没有光学仪器以前，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感觉器官的局限性并不是人类认识的绝对界限。自从发明放大镜以来，特别是发明显微镜以来，人类的视野大大地扩大了，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无限复杂的微生物世界。光学显微镜放大的倍数是有限的，但它也不决定人类视觉所能达到的终极界限。人们有了电子显微镜就能把物体的形象放大到十万倍以上，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一定能发明比电子显微镜具有更高效能的仪器。我们决不应该抱怨感觉器官的局限性。生产实践的日益发展，人类工业技术的不断

进步，给人们提供了不少仪器，并且将提供更多的仪器，靠这些仪器的帮助，可以无限地提高人们感官察觉外界世界的各种事物及其属性的能力。

十九世纪德国的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茨的“符号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也是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它们虽然在认识起源问题上是唯物主义的，承认感觉是由外界物体对感觉器官的作用而产生的，但是它们不把感觉看做是外界对象的模写，而认为只是对象的“符号”或“象形文字”。列宁指出：“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定要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因为符号完全可以同对象不相似，而且可以代表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构的事物。

反映论是所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首要前提，它是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不可知论完全对立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旧唯物主义把认识看成是照像式的机械的反映，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它不把人类的认识看做是由不知到知、由不深刻的知到较深刻的知的一个无限发展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辩证地理解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和联系，它不能正确地解释尚未认识的东西如何转化为被认识了的东西，因而为不可知论留下了把柄。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完全科学

地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也不能彻底地粉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彻底粉碎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在认识论上的进攻，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谬论。例如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攻击反映论说：“譬如墙上的钟，我们闭了眼睛可以想象钟的模样，那还可说是一种摹本。但是我们心里起的钟的用处的观念，也是摹本吗？摹的是什么呢？又如我们说钟的发条有弹性，这个观念摹的又是什么呢？这就可见一切不能有摹本的意象，那‘和实在相符合’一句话又怎么解说呢？”象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那样，把认识看作在实践的基础上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就不能予以充分的有力的回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旧唯物主义不同，不是把认识看作照像式的消极的反映。照片当然不能反映出钟的用处和发条的弹性，但是人们的思维却能反映它。钟的用处和发条的弹性都是钟和发条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人们意识中的关于钟的用处和发条的弹性的观念，正是这些客观属性的反映，而决不是主观意志的任意创造。这些观念也是客观实在的摹本，不过不是直观的形象的摹本罢了。当然，人也可以随意设想钟有充饥或御寒的作用，发条没有弹性等等；但是实践会教训他们，这是和客观实在不符合的。因此，詹姆士的诡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们特别要注意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只有这样，才能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彻底粉碎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企图使认识离开实践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以前的一切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的现点引到认识论中来，从而科学地解决了认识论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缺陷，彻底驳倒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实践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社会的实践。社会实践包括许多方面，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向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斗争。没有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就谈不到其他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人们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和人之间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又结成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实践除了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外，还包括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基本的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基础。除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并以它们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活动，如科学实验和艺术活动等等。

唯心主义把认识看作是天赋的或者主观自生的，不看作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当然也就否认认识依赖于人的社会实践。有些唯心主义者也提到“实践”或“行”的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常常提到“践履笃行”，并把“践履笃行”看作做学问的重要功夫；但是，他们所说的“践履笃行”，不过是脱离社会的纯粹个人的修身养性，并且认为，这种活动是为了实现某种

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这种实践观是唯心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正确地承认认识是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但是，他们都不了解认识对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的依赖性，他们把认识看作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消极的直观。例如费尔巴哈，他虽然有时提到实践，但是并不能真正了解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只是把客观对象当作感觉的对象，而不是把它当作人们用自身的活动来改造的对象，他把人的活动了解为只是消极的直观，而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

社会生活表明，客观外界不仅是人们思想的对象、感觉的对象，而且首先是人们的实践对象，即人们用自己的活动加以改造的对象。动物的感官也反映着客观世界，但是动物只是在生物学地适应外界的过程中感受外界，它只能消极地反映外界，它对于客观外界的反映只能停留在低级的水平上。人类不仅能够适应环境，需要的是能够改造客观外界；所以人类的认识不限于消极地直观地反映外界，而且能够在改造客观外界的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感性认识，并且进行抽象思维，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又能应用规律性的知识指导实践。这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

在改变自然界的生产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自然界的各个方面，从它的外部逐步深入到内部，逐步发现自然物的各种属性，了解到自然现象之间的种种关系，认识到自然界的各种发展规律。在生产实践中，人们还在不同程度上逐步了解到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

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方面的活动，人们进一步了解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对社会生活本身逐渐有了认识。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实践是各阶级的实践，人们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认识社会的。

毛泽东同志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在阶级社会里，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一般说来，不是和阶级利益直接相关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也会和政治斗争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曾经因为哥白尼的地动说不利于作为封建的上层建筑的神学而加以反对；宗教裁判所曾经残酷地迫害自然科学家，等等。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尚且如此，对直接牵涉到阶级利害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就更不必说了。

社会实践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概括这两种知识的哲学，也都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类认识史表明，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认识的新课题，都是由社会实践提出来的。社会实践向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新的问题，才推动人们从事新的探索。没有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便不能提出认识的任务。而且，人们也只有总结了实践经验，才能对于社会实践提出来的新问题，给以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回答，产生新的科学知识。认识的历史性和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是相适应的。

自然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生产进一步发展，又向自然科学提出新问题，并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材料。离开生产需要和生产经验，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例如，畜牧业和农业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水利工程和建筑的需要产生了力学，测量土地面积的需要产生了几何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就是说，生产的需要是推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大学和专门研究机关的创设，归根到底是由生产需要决定的。社会实践不仅向人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提供了供科学研究进行概括的生产经验。离开生产经验，科学发明是不可能的。例如，十四世纪以后，由于欧洲手工工业的巨大发展，纺织、钟表制造、磨粉对于力学、染料生产、冶金、酿酒对于化学，透镜制造对于物理学，等等，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观察的材料，因而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才产生了真正系统的自然科学。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农业生产中积累了培育蔬菜、观赏植物和家畜的新品种的丰富经验；为寻求工业原料和市场组成的探险队，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动植物品种的资料。达尔文就曾经参加过探险活动，他仔细分析了这些丰富的经验和大量的材料，创立了他的物种进化的理论。

生产实践还给认识不断提供新的技术工具，加强了人的感官，帮助人们深入自然，揭示它的秘密。天文学的发展需要望远镜的帮助，人的肉眼只能看见五、六千颗星，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多得多的星，包括距地球十亿光年以上距离的星体，用射电望远镜甚至可以觉察到距地球一百亿光年的以上星系。光靠人的肉眼看不见微生物，也发现不了某些疾病的病菌；如果没有显微镜，就没有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物理学家没有强大的加速器，就不能深入研究原子核内部的运动。

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虽然也在逐步地发展和进步，但是，从总的方面看来，对于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只有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展开的时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们，才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十九世纪初期的傅利叶、圣西门、欧文为什么只能提出空想的社会主义，而不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充分发展。大工业在英国刚刚产生，在法国还完全没有。正如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到十九世纪中叶，当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并在这个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前人思想的优秀成果，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空想的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新的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依靠本能适应环境的原始的野蛮人，不能把自己和周围环境区分开来。由于改变环境的实践活动，人才把自己和环境对立起来，把思维和存在对立起来，即把环境当作改造和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改变环境的实践活动，又把人和环境、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即使人的认识逐步符合于客观实际，使人

的行动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在这种对立的统一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逐步改变了环境，另一方面又发展了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步产生了反映客观事物的各种概念和范畴，也形成和发展了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

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认识的社会性。每个人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在和其他人的联系当中形成自己的认识的。不能设想有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个人和个人认识。表面看来，某些科学工作可以由科学家单独进行，似乎他的研究纯粹是个人活动，和社会无关。其实，不仅他的工作所需要的材料、他所具有的科学基础知识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成为他研究对象的某些问题的提出也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实践看作是各个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看作人们的社会活动，首先看作人民群众的活动，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劳动人民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的主体，他们的斗争对于人类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起着首创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一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初源泉。虽然他们的经验是分散的，没有系统的，需要经过综合、提炼，才能成为有系统的知识，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社会斗争经验，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能产生。因此，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我们坚决反对把群众看作“不知不觉”的“阿斗”，而主张把群众看做我们寻找新知识的第一个先生。一切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科学工作者都必须眼睛向下，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除了实践以外，认识是不是还有别的来源呢？没有了，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人们只有在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才能进行科学的抽象思维，达到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

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当然，这绝不是否认人们学习间接经验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又说：

“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

接受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是重要的。每一代人都是把前代人的认识的终点作为自己认识的起点，而后把自己在实践中取得的新的知识增添到人类知识宝库中去，通过语言和文字传留给下一代。如果事事都要取得直接经验，极而言之，如果每一代人都要从钻木取火开始去获得火的知识，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书本知识却只是知识的“流”，而不是“源”。关于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这段话，适用于整个知识领域。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但是反对把书本上的知识当作认识的根源，因为那样就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会采取

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书本知识，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接受书本上的科学知识。

我们要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又要采取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方法认真地读书。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革命干部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时写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才可能正确地、深刻地、有批判地接受书本上的军事知识，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丝毫不轻视读书，相反地，我们一向提倡多读书，但是在读书时，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地死啃书本，主张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指导下，越是多读书，就越有益。

三 认识的辩证过程

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辩证的过程。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不同质的两个阶段。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感官直接接触事物，接受事物的各种刺激，这些刺激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形成一定的颜色、声音、冷热、软硬。气味等等感觉以及由这种种感觉形成的关于客观对象的印象。这就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特点，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直接反映外部世界。在感性认识阶段，人们认识的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生动的直观，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在感性认识和客观事物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就在于

它直接反映现实。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是认识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就没有往后的第二步，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

然而，正因为感性认识是事物的直接反映，它也就有着局限性。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和规律。一般、本质和规律等等不是感官所能直接感触到的。人们通过感官只能感知日出月没、星辰的位置变化以及昼夜交替等现象，而不能把握天体运行的规律。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阶段。

人们在实践中对于某种对象的感觉和印象反复了许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就产生了概念，从感觉印象到概念是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概念所反映的，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循此渐进，进行判断和推理，得出理论的结论，这时，就可能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例如，人们到一个人民公社去，首先接触到这个公社的许多具体材料，然后经过思索，从这些具体材料中抽出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共同点——都是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等，又抽出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不同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等等，逐步理解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本质，这时，对人民公社就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我们去调查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起初了解到各个生产队的情况和具体做法，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这时候，人们就要用脑筋来想一想，进行判断和推理。“这个公社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就是一个判断。进一步研究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有什么经验，缺点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教训，以及今后怎样改进工作等等，这就需要进行推理。如果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真实的，思维的方法又是正确的，就能够引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

论。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形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这就是理性认识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的特点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理性认识已经不是个别事物的印象，而是综合了许多事物或各个方面的感性材料，经过思考作用，舍弃了次要的东西，从中抽出事物的共同本质和事物运动的规律。例如，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接触到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等等，看到它们的不同的特点、生活习性和用途，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科学家对积累起来的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概括，舍弃了各种植物的个别的、次要的、具体的特征，概括出它们的一般的、主要的、共同的本质。这样就形成“植物”的科学概念。

由此可见，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就是经过抽象的概括、分析和综合，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

概念、理论的抽象虽然是离开了个别的具体事物，但是只要是根据实践经验而进行的科学抽象，不是任意摘取事物和现象的个别方面，不是凭主观想象，那末，就不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的认识，而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并没有包括个别地主或资本家的具体活动的一切细节和被剥削阶级在每个个别场合所进行的斗争的一切具体情况，但是这个概念却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质，这个科学概念能够指导我们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的每一具体现象。人们运用科学的概念，正确

地进行判断、推理，就能根据现有的知识去考察新的领域，得到新的知识，依据事物的规律性，预见未来。天文学根据天体运行的规律，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月蚀发生的时间，制订未来许多年的历书。地质学根据地层变化和地壳中发现的生物遗骸等等，可以确定地层的年代和成因，进而推断出矿物的蕴藏。气象学根据各地的气压、气温、湿度等等变化，可以作出天气预报。对于社会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预见的巨大威力。

理性认识的上述种种特点和作用，都是感性认识所没有的。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是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认识的任务。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性，首先必须占有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合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然后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思考作用，进行逻辑的加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事物的现象表现着本质，个别之中有一般。感性材料既然是现象和个别东西的反映，那末，它也就包含着本质和一般的东西但是，感性材料中所反映的东西，却是真象和假象、本质东西和非本质东西混杂在一起，是事物的各个片面和表面的联系。因此，必须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对感性材料作全面的分析和综合。这就要去伪存真，发现事物的真象，不为各种假象所蒙蔽；要去粗取精，抓住事物本质的东西，不要粗枝大叶，为非本质的东西所迷惑；必须由此及彼，把孤立的材料联结起来，发现其“来龙去脉”，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满

足于片面的、零碎的了解而看不到事物的全体必须由表及里，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探索其内部联系，不要浮光掠影，不求深解，停留在事物的外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指导我们对感性材料整理和改造，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系统的基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的规律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我们认识了它，自觉地用它进行思维，它就成为我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辩证的思维，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这就是要求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综合客观材料，在每一步分析中都要用事实、实践来检验，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任意乱套。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被证明完全正确的理论原则，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结论只能是进行具体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

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概括，充分地估计了认识特殊事物的重要性，没有对于特殊的认识，就没有对于一般的科学认识；又充分地估计了一般理论对于继续深入认识特殊事物的指导意义，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特殊和认识一般的辩证法。

就人类的认识秩序说来，总是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能进行概括，认识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但这决不是说只有把所有事物的特殊本质都研究过、都认识清楚了才能认识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在研究问题时，感觉材料搜集得越全面、越丰富，就越有利于抽象、概括的工作。然而，要把所有事物的特殊本质都研究过、都认识清楚然后才进行抽象、概括，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们在感性认识中所接触到的对象的数目总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麻雀，决不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麻雀。但一般寓于特殊之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能够认识天下所有麻雀的共同生理结构。研究麻雀如此，研究其他事物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抓住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事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认清其特殊的本质，就可以借抽象思维的力量，进而认识该类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没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之所以可靠，因为它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胡思乱想、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然而，感性认识又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是不完全、不深刻的反映。只有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全面地、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把握它的内部联系和本质。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这种辩证的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在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各坚持一个片面，唯理论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是可靠的，而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经验论则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是可靠的，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

哲学史上的唯理论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不仅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而且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客观事物，不包含客观内容，认为理性认识是天赋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者，例如斯宾诺莎，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和客观事物相适应的，但认为感性认识在欺骗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客观外界必须绕过感性，而仅凭理性的直观。

经验论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例如洛克认为，经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可靠的知识，但否认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认为理性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不过是纯粹的名词而已。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例如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都把经验

看成是纯主观的、第一性的，而客观世界则是依赖于经验的、第二性的。

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完全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是它们都把统一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绝对对立起来，因而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但是由于它否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也就不能解释理性认识怎样来源于客观世界的问题，当它否认感性认识的真实性时，实际上就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离开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由于否认理性认识的真实性，不把理性认识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在认识论上就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给那种认为理性认识是主观自生的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

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也都不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者犯了类似唯理论的错误。他们轻视感性经验，不了解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来自实践经验，实际上把真理看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主观自生的东西。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而是当作教条，不懂得理论必须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们是思想懒汉，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硬要客观实际服从千篇一律的公式。这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经验主义者则犯了类似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错误。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否认感性认识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因而，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片面当作全体，把现象当作本质，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要客观实际服从主观的狭隘经验，这种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运动是否结束了呢？没有，认识运动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能够指导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达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目的。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不付诸行动，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同时，理论结论是否正确，在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认识是否正确，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应用理论于实践，达到了预想的目的，理论的正确性才得到了证实。而且，原来的认识即使是正确的，也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估计到客观情况的全部变化，在实践中总会发现许多前所未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必须总结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感性材料，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修改或补充原来的认识，使其得到发展。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从认识方面说，又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在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而证明了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就完成了对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然而，就过程的推移而论，认识的运动还没有完成。因为，物质世界的任何过程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当随着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物质世界的发展是永恒的，人的认识运动也永无止境。

在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循环不已。毛泽东同志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

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对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基本概括。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即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坚持下去，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再回到特殊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领导者先作群众的学生，再作群众的先生的观点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结合起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九章 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强有力的武器。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重要的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和献身于真理，因为真理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追求真理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

一 客观真理

人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把我们意识里所包含的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叫做客观真理。

关于真理问题的观点是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紧密地联系着的。唯物主义者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他们就必然承认客观真理。列宁说：“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他们就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否认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世界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认为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在宗教看来，上帝是真理的化身，真理是上帝的启示。这些观点都否认了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因此就在实质上否认了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真理。

从贝克莱、马赫主义者到当代的实用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都用不同的方式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者主张，凡是有用的、有效果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东西，就是真理。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说：“既然工具本身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假就不是命题的特性了。工具只是有效的或无效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实用主义者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可见，实用主义者眼中的“真理”，只是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要求，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工具而已。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当然，人们掌握了真理，能够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们带来利益。不过，真理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给人们带来利益，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符合于客观实际。决不能把凡是能够满足某些人主观需要的，对于某些人有用的、有效果的、能带来利益的东西，都叫做真理。投机家、冒险者，骗子手的谎言和谬论，有时也会产生某种效果，攫取到某些利益，但是，谎言和谬论永远不会成为真理。有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声称：“真理就是不断重复着的谎言。”这就一语道破了主观真理论的实质，充分暴露了这种反动哲学的腐朽性。主观真理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混淆真假，颠倒是非，把知识和迷信、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宣扬蒙昧主义以愚昧人民，强词夺理地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辩护的反动工具。

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真理，有些唯心主义者为了摆脱这种取消真理的必不可免的逻辑结论，

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真理不是个人承认的，而是社会上多数人承认的东西。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社会的、全人类的经验形式”。所谓“社会的、全人类的”词句，是掩盖不住主观真理论的荒谬性的。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偏见和宗教里的天堂、地狱，妖魔鬼怪等等邪说，曾经在一个时期比科学知识还普及得多，为社会上一般人所公认。相反，新发现的真理，常常不能立刻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承认。当然，一种意见只要是真理，迟早一定会得到公认。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但是无论怎样，一种观点是否是真理，不能以承认的人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多数人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仍然是意识范围内的事情，把真理说成是社会一般公认的东西，也还是主观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受阶级的影响和制约的，人们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客观事物、特别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更是如此。反动阶级站在反动立场上来观察社会问题，由于它们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客观必然趋势相反，它们不承认，也不能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其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能有一定的认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的根本条件。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认识客观真理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真理的学说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只有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去追求真理，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行动，并在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只能把人们引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从主观愿望出发，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头脑是思维的主体，头脑之外的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人是能够改变客观实际的，不过，为了有效地改变客观实际，就必须认识客观实际，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客观实际中寻求真理。办工业必须从资源，设备、劳力等等实际情况出发；从事农业生产必须看天看地看庄稼；进行科学的研究，必须尊重事实材料，从事材料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依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根据客观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任何人如果不做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从中抽引出事物的规律，他就不可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就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一个革命政党要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切合实际情况，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同样，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中，也必须经过各种形式的周密调查，搜集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才能发现科学规律，形成科学理论。没有哪一种科学真理，不是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而轻易得到的。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是我们根本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也是我们根本的学风。

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行调查研究，是一个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的原则，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党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没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都不懂得正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犯了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研究问题有两种根本相反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从主观愿望出发，轻视调查研究，就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大敌，是科学事业中的大敌，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和主观主义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只有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把握客观真理。

二 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同时又是绝对的和相对的。从它的内容来看，真理是客观的，从认识真理的过程来看，真理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人们对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人们把握客观真理的限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承认相对真理。

任何真理都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不存在脱离绝对的相对。每一真理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对物质世界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然而，任何真理又确实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所以它同时又是客观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列宁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使认识僵化，就会使我们在走向绝对真理的道路上停止前进，甚至可能使真理转化为错误。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就会抹煞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原则界线，走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包含着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长河”，那么，相对真理就是这条“长河”中的“水滴”。每一科学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无论古典力学或量子力学，都没有穷尽对

物质客体运动规律的认识，更没有完结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可是，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例如从古典力学到量子力学，都使人们的认识向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都在这条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增添了新的“水滴”。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以无数相对真理的“水滴”，汇成绝对真理的“长河”，逐步地认识永久的绝对的物质世界。

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和相对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个相对、绝对的道理，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截然分割开来，因而走上了两个错误的极端。

独断论者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否认了它的相对性。他们认为，人们一下子就能完全地、绝对地认识物质世界，把已经达到的有限的知识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在他们看来，真理只是绝对的，不应当有任何的发展，他们把绝对看作是排斥相对的绝对，不懂得真理是一个从相对到绝对的无限深化的过程。

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形而上学独断论的一种表现。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抽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企图一劳永逸地按现成公式行事。他们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抓住了真理的绝对性，丢掉了真理的相对性。他们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生活的发展中不断地发展的，但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其正确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和死亡的规律来说，是绝对

真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在实践中就必须遵循这个真理。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并且张牙舞爪，威胁世界和平，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这正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我们从来都认为，对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进行新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这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真理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而且也是真理同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自然科学是在同宗教迷信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任何时候，和真理并存的总有错误的认识。真理在同错误作斗争中，虽然要经历曲折的道路，但终归要战胜一切错误，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深入人心，掌握千百万群众，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真理在同错误作斗争中，本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得到提高，得到发展。

无产阶级要同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纠正自己队伍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或者由于受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犯的错误。和这两种错误作斗争，对于真理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不但可以增强自己身上对于这些观点的“免疫力”，并且可以使真理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错误是无产阶级自己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能从错误中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种错误就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由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所造成的错误，不但今天会有，就是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会存在。因此，不断地克服错误，就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仍将是真理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真理和错误的斗争过程中，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就能发展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错误可以转化为真理。反之，在和错误作斗争中，如果由于反对一种片面性把真理的某一点、某一方面加以夸大，而走到另一种片面性，也就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因此，在和错误作斗争中，决不能以一种片面性代替另一种片面性；只有全面地具体地掌握真理，才能克服和防止一切片面性的错误。

通过相对真理而日益接近绝对真理，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真理，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我们懂得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自觉地利用它来追求真理，促进真理的发展。

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觉地运用真理发展规律、促进真理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通过科学界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压服的方法。不让错误意见发表，它仍然存在着。只有通过正确的意见和错误意见的斗争，才能辨明是非。真理愈辩愈明，而谬误总是经不起认真的争辩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认识达到客观真理，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当某一个问题的客观真理还没有为我们掌握的时候，就必须鼓励人们从各种不同方面，经过各个不同途径进行探索，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进行自由的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追求真理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学术问题的争论，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固然也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因此而害怕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事实证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符合于真理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极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

三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从来没有人作过科学的解决。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从认识本身中寻找这种标准。或者是以已有的某种教条作标准，例如从汉代以来，作为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儒家，通常总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汉代的扬雄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者是以自己的观念作标准，例如明代王阳明的所谓“良知”是“自家的准则”，“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法国的笛卡儿认为，概念的明白和清楚是真理的标准，这也是从认识本身中寻找标准。黑格尔虽然说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是，他把实践只理解为精神活动，所以也还是以观念作为自身的标准。实用主义者詹姆斯说：“凡是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并使我们获得效果的东西就是真理，这也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显而易见，这是公开地否认真理的客观性。

旧唯物主义者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他们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作为真理的标准，但是他们不理解社会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怎样去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完全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离开实践争论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一种烦琐哲学。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意识范围内的认识是否符合于意识范围以外的客观事物，这在意识范围以内是决然得不到证明的，客观事物本身也并不来直接回答人

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为了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只能从认识回到实践。这就是说，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规律性的认识以后，拿着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如果把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等变成了现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么，这就证明了，这种认识是符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只有人们用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作指导，通过实践去改变事物，客观事物才通过实践的结果，给人们以回答。检验认识的标准不是主观的，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人们只能通过实践的结果来判断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凡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都将被实践所证实，凡是反科学的、错误的理论，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拿到实践中就要碰壁。原子内部构造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人们能够用关于原子内部运动的知识，在工业和其他方面利用原子能，这就证明人们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它的真理性在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得到了证实。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它经受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排斥逻辑的证明。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逻辑的证明是重要的手段。某项工程设计，某一方针，政策、计划，在其实施之前，即在受到实践检验之前，对它的正确与否，应该而且可能作出一定的判断。人们可以拿已有的某些知识为前提，进行推理，来判断这个设计、这个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这里是否出现了两个检验标准呢？不是的。逻辑的证明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任意作出，它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中的前提必须是在已往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逻辑推理中又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且被人类社会

实践所亿万次重复检验过了的。而且有许多事情，逻辑证明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这是因为已有的知识有限，而在事情的发展中还可能出现不能预计到的情况的缘故。对于这些事情，在经过逻辑证明以后，还必须再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真理性。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对这一标准不应该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认识是否正确，应该用而且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所证实的一切都是客观真理，一切谬见归根到底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此，实践的标准是绝对的。但是实践的标准同时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实践都有局限性。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不能完全证实或者驳倒一切的认识。某个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实的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是有限度的，超出这个限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实践所不能证明的，终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于实践标准的意义，列宁写道。“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实践证实真理，揭示错误，人们根据实践的结果修正，补充原来的认识。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认识，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

四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追求真理，掌握科学知识，无非是

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去改造世界。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探求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规律，是为了从事生产斗争，征服大自然。我们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总之，一切认识都是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的。

理论，知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只有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导，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若不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

人们为了正确地行动，避免盲目性，就必须了解事物的发展进程，具有科学的预见能力。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性的，通过实践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就能预见未来，指导实践。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科学预见。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的进程，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就越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将来。一般说来，科学预见只能大体上推断出事物发展的基本进程，而不可能周全地预知到它的一切细节。科学预见越是准确、越是深远，根据它拟订的行动计划、方案就越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我们的行动就越能发生应有的效果，就会更顺利地达到行动的目的，有力地加速客观事变的进程。

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才能有效地和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人们在实践斗争中就能够掌握主动性，行动就获得了自由。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在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在工作和斗争中就处于被动地位，行动就没有自由。人们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必然性去征服自然，

才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自由并不排斥必然，而恰恰是依据着必然；违反必然，就没有自由。人的自由总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所以，真正的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人们不能任意“消灭”规律或者“创造”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当人们认识了规律的时候，必然就转化为自由，人们就能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客观规律的主人。也只有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客观规律性。

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必然性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错误观点。一种是抽象地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可以脱离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随心所欲地任意行动，这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任何人违背了客观规律性、必然性而任意妄为，其结果必将是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自由，而且一定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另一种是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必然性看作对自由的否定，认为人们只能作客观规律性、必然性的奴隶，只能消极地依从客观规律，而不能利用客观规律有所作为，这是机械论的观点，人类实践的历史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能把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绝对地对立起来，只承认某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只承认客观规律性，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或者相反地，不顾客观规律性，鲁莽从事，都会使工作遭到失败。

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的奴隶变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的历史，就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愈来愈深刻的历史。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改造了主观世界，又促进着改造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不断的变革，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一重又一重地打破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眼界的限制，人们的主观世界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就一步一步地提高。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对人的统治（即生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为人对物的统治所代替了。一直作为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发展规律，开始被人们所掌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主人。恩格斯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充分的可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高度有效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改造世界，创造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鼓足革飾千劲，力争上游，奋发有为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仍然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进一步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求越来越深入地洞悉大自然的奥秘，越来越深入、越准确地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越来越充分地发挥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一步步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共产主义的加速实现。

共产主义时代是人们都能自觉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时代。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永不会完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人们永远要在实践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不断地发现真理，排除谬误，不断地得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使人类社会被改造得更加美妙，人类征服宇宙的巨大威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下篇 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列宁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给与了不同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在本书的前面各章，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指出，这个过程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不论对自然界或对人类社会，都应该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加以理解。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同样，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本身所固有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客观过程。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以前，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许多抱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理论家都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他们不能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抹煞或忽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广大的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杂乱的堆积。按照这种理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只能等待某一杰出人物的偶然的出现，等待他头脑中偶然迸发的明亮的思想火花照亮黑暗的大地。这些理论对人民群众是精神的桎梏，叫他们安于困苦不堪的生活，最好也只是叫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性上。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曾经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中国，例如春秋时代的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东汉的王充发挥了管仲的这个观点。王充认为，人们的善恶行为，并不在于人的性质，而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于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生产的丰歉则由于自然界的原因（风调雨顺或水旱成灾）。由此，王充得出结论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王充把社会治乱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观点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在运用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上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并肯定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因果联系，他否定意志决定论，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由其生活环境所决定的。

在欧洲，例如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对于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下面的看法，他认为，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没有住所、衣服和工具，他们以偶然获得的食料充饥。

他们“受到需要的教训”，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需要的影响下，“双手、智慧、机灵”就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生活。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了“环境决定意见”的观点。例如爱尔维修认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的结果，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但是，他们在提出这样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公式。这两个观点是直接对立的。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循环，他们仍然不

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先知先觉的人物的身上。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列宁曾认为在黑格尔的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出现过很多的唯物主义派别；而在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内，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统治的地位，因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在任何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精神劳动的特权，被剥削者承担从事体力劳动的沉重义务。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不同的剥削阶级以及同一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抹煞被剥削者——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的特权，总是把某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神的意志或某种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因此，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坚持唯心主义的阵地。只有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彻

底革命的阶级才能够摆脱剥削阶级的一切偏见，只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不可能产生，还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大机器生产才提供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可能。恩格斯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得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把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族各民族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也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所以不能够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除了阶级立场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外，还因为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有它的特殊的认识根源。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天体运动和微粒子的运动，声、光、热、电，化学变化，以至于生物的生存演变等等，这些物质的运动变化，都没有自觉的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表现为一定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的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形式。这个特殊的形式很容易使人发生迷惑：如果人们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不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就会以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而不是遵循着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唯心主义者就是利用了和片面夸大了这个表面现象，把人的思想、人的主观意志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特别是把英雄人物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说成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社会历史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每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性格、才智、意志都各不相同。由于不同的人物和许多其他复杂条件的影响，各个历史事件的具体状况是不会完全同样地重复出现的。被这种现象所迷惑的人，就会否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规律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为了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必须冲破笼罩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的这种迷雾。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一切人的一切活动固然都有其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但各个人的意图和目的，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常常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这些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意图和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都能够成为现实。历史上，在人们还没有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应用这样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情形下，人们的主观意向，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所引起的结果，都不是所预期的，甚至是和预期相反的；只在很少的场合下，人们的期望能够如愿以偿。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曾经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声称这个口号将引导人们去建立起永远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在实际上所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必须解答：第一，为什么同一个社会里，人们的主观意向会有种种不同甚至于互相矛盾、冲突？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中间发生这样的矛盾？第二，为什么各种不同的主观意向，有的能够得到实现，有的不能实现，有的似乎实现了，但实际的结果和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很明显，这些问题，决不是在人的主观意识本身中可以找到解答的。认为“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主观意图，结果就只能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陷入一团混乱。如果不能弄清楚隐藏在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曾经试图有系统地答复这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机以及真实的动力，都根本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应当加以研究的。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黑格尔虽然批判了“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但他不是从历史本身去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历史外面，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里把这

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在他看来，支配人类历史的“民族精神”无非就是支配整个宇宙的神秘的“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恩格斯指出，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研究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指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状况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贯彻。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做了一个经典的说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提供了客观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形形色色的复杂的，偶然的社会现象所迷惑，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因而它就完全打破了以往某些历史家否认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任何重复性的观

点。的确，社会现象的完全重复是没有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却存在着共同的本质，这里就表现着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复性。列宁指出：当人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因为这样就不能区分社会中哪些现象是本质的、重要的，哪些现象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

社会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从根本上说来，除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之外，一般都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历史形态。凡是奴隶制社会，不管其民族特点如何不同，都充满着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它的基本矛盾都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说明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普遍的和不断重复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但它决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污蔑的那样，似乎低估和轻视社会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同样科学地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就在于：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如果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它就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新的进步的社会意识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掌握了群众时，它就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进步的社会意识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

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他又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社会意识的重大作用是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但是，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因为，当着它成为某一历史事变的原因之前，它的产生是另一更深刻的原因的结果。这一更深刻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最基本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社会意识本身只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进步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的新生的进步势力的要求的反映；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腐朽落后的势力的要求的反映。例如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着某种决定的意义；但是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只是由于它适合于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由于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恩格斯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生存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

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

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能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那么，到了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社会历史就只能提出极其反动的解释。他们或者用新的形式重复那些早已破产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按照生物机体的结构来解释社会现象、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注意社会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回避对社会发展本质问题的研究。而根本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用各种形式宣扬非理性主义，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要倾向。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个人的心理状态，企图从心理状态方面对社会生活做主观的任意解释，所有这些都是为粉饰资本主义日益混乱的秩序，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不可解救的痼疾提供药方。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历史中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存在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从而说明了，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现象在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以后必然会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社会主义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理想，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光辉的现实。这一事实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研究社会生活方面的各门学问能够成为科学。社会科学的各部门，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分别地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过程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个部门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它所研究的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和一般的规律，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作用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能适用于社会科学各部门，为这些科学部门提供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它作为标签硬贴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曾出现过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现象，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现象时写道：“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成为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透彻地理解的事情。依靠这种科学的认识，人们不但能够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而且能够获得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历史唯物主义使一切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看出了明确的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并且能够有把握地进行自己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是领导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共产党的可靠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下面各章将分别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原因，也是整个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为着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为什么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一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社会面貌。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

地理环境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条件。物质资料生产的对象是自然界供给的，或者是人们从自然界取得的。人们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也是用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明显地受到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马克思说：“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会发生影响，致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国内，会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并在其他情形相似的限限度内，使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不一致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费时较少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的发展就会快些；反之，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费时较多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的发展就会慢些。

但是，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斯大林说：“欧洲在三千年内已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内，欧洲境内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更，便是变的很少很少，甚至地理学也不肯提到它。而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环境方面一种稍许严重的变更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社会制度中甚至最严重的变更，也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就够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地理环境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底主要原因、决定原因，因为在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那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在发展的主要原因。”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企图用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更替。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等）直接或通过事务及职业类别来影响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决定人类的嗜好，气质，并通过这些决定整个社会制度。这种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法西斯主义的地理政治学派（这种学派在希特勒德国的先进的美国都很流行），则是利用政治由地理因素决定的谬论，来为帝国主义的所谓争取“生存空间”的侵略战争以及公开的掠夺殖民地的暴行做辩护。人口的因素也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虽然其他条件和别的地方一样，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慢一些。人口多少是生产发展的一个因素。

人口的增长虽然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也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因为第一，人口的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第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说明为什么某一个社会制度恰好由某一个新制度来代替，而不是由其他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第三，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成为改变社

会制度的革命的原因。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硬说中国革命的原因是由于人口过剩。毛泽东同志在驳斥这种谬论时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捏造出所谓“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硬把这种“规律”说成是自然的法则，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人口太多。他认为只有减少人口，才能解决失业、贫困的问题。这种错误的观点只是为着要掩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决不是由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事实上在应用进步技术的情形下，生活资料的增长远比人口的增长要快。现代资产阶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侵略政策直接联系起来，用来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和掠夺殖民地的行为辩护。马克思主义认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抽象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各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具体的人口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人口的增长

也应该是有计划的，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做到计划生育。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物质生产。

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首先要能够生存。为了生存，必须吃喝穿住，这就是说需要有食品、衣服、住房、燃料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离开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了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

人们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所表示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们除了在生产过程中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生产方式。

一个社会的面貌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是由于那时的生产力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才分裂为阶级，人们之间才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产生了各个

敌对阶级的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会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可能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随着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消灭，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阶级剥削的现象才会被消灭，新的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风尚才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巩固。

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当一种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时期，不得不为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目前在不少国家中已经实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是为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前面已经提到，生产力的要素包括：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以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物质标志。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了或者能够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和其它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中的物的要素。

仅仅有物的要素还不能构成生产力，物的要素必须被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工具和其它劳动资料只不过是一堆死物，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都是通过劳动者实现的。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

前面也已经提到，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关系的特征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斯大林说：“生产力底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人们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又决定着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关系的内容包含着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3）由前面两种情况所决定的产品分配形式。上述的三个方面，组成为生产关系的整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其中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

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以原始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在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其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被迫处于服从的地位；由于前者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支配后者的劳动力，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而劳动者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活命、甚至难于维持活命的生活资料，这样，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表现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在构成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为相对固定的形式。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从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社会生产永远不能中断，改造自然的活动永远不能停顿。由于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不断地积累和增长，就有可能在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逐渐改进生产工具和创造发明新的生产工具；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它在生产技术上的应用，更能加速生产工具的变革

过程。生产工具的每一次显著的改进，都要使人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不同，为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人和人的这种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才能顺利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其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使用石头工具的极低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铁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就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终于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从使用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这就是说，某种生产关系的必然出现，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来，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更。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这个原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固然有着决定的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的东西，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每一个历史时期所达到的生产力，都要求与自己的发展情况相适合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之内，生产力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它就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技术设备可能得到高度利用，生产力诸要素可能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在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存在着失业大军，技术设备利用率很低，生产力各要素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重大的障碍，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是很迟缓的。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但是，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总是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而不是在此以前。生产发展的辩证法总是这样：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前提，必须是在经济生活中迫切地提出了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的内部已没有发展的余

地，不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使生产力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新的物质技术的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实现，又有待于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当新的生产关系一旦确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巨大革新。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的高速度的飞跃发展，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把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在经济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如果忽视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那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原理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比较活跃易变的，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合的，这时候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还处在数量变化阶段，还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当着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原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亲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陈旧的生产关系，这时矛盾就日益激化起来，

就必然要提出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要求，就由量变的阶段进到根本的质变的阶段。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不适合又转化为适合，从而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时期，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向上发展的无限运动过程。

生产方式由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活动到自觉的革命活动的过程而实现的。历史上每一代人开始生活时，必须适应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当人们在旧生产关系内部改进生产工具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到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眼前的直接的经济效果。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现了从烧熔的石块中淌出来的流质冷凝后的块状物，比磨制的石刀还要锋利，于是，逐渐把石器改变为金属工具，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将会引起奴隶制的诞生；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采用大机器，他们没有想到，伴随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无产阶级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仍然要竭力用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革命活动，就不可能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时在先进阶级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思想和要求，这种新的思想和要求，一般地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需要。在这个新的思想和要求的指导下，进步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

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进入自觉的革命活动，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总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这是客观的必然规律。为了保证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旧的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必须被打破，而且也一定能够被打破。生产关系不能长远地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作为最革命的、决定的因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要冲破束缚自己的桎梏，为自己的发展开拓道路。革命阶级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要素，生产力的解放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劳动者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奴隶暴动冲垮了奴隶制度，农民起义动摇了并最后摧毁了封建制度；目前在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推翻了资本的统治，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必将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曾经用臭名远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他们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抹煞了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群众自觉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只是单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必经过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需要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

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公开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并且大肆宣扬“议会道路”，“和平过

渡”，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的翻版。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的消失，恰恰相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这正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列宁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客观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个客观规律。当着生产关系（如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打破过时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此就必须同维护旧生产关系的一切反动落后势力，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当着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就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环节上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得到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某种生产关系应当加以变革还是应当使之相对稳定，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合。毛泽东同志指出：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党之所以正确、所以不可战胜，就在于它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

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就在于它科学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领导我国人民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强大的发展。

三 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历史上五种基本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原始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是和当时极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石制工具，如果不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就无法进行生产，就不能生存。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它的社会形式必然以原始公社为单位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原始人没有任何私有的观念。某些同时用做防身武器的生产工具，只是为着使用起来顺手，才固定归个人使用。原始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任何剩余，与此相适应，产生了平均分配的制度。这时还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最初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后又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和产品的交换。而这种社会分工和产品的交换必然引起私有制的出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产品除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外，还有了些微的剩余，这就造成了剥削他

人劳动的可能。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只有采取最粗暴的奴隶制的形式，才能从他人的劳动中压榨出剩余产品。于是，原始社会便合乎规律地由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所代替。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可以象对待牲畜一样地买卖甚至杀死奴隶。这是一种最粗暴的赤裸裸的剥削制度。尽管如此，奴隶占有制的出现仍然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现象，比起原始社会来，它提供了较高的社会生产力。金属工具的使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分工，特别是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力。古代中国、埃及，希腊、罗马的宏伟建筑和巨大水利工程，都是奴隶劳动创造的。

在奴隶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越来越把劳动看成是下贱的，可耻的事情，奴隶受着惨无人道的待遇，体力和智力遭到严重的摧残，他们对劳动失去了任何兴趣，并以怠工、逃亡、破坏工具、暴动作为对奴隶制的反抗。这样，奴隶制不仅成为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且危及到社会本身的存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对劳动感兴趣的生产者。奴隶暴动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于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以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为特征的。在这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地主所有。农民对地主有着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要服从地主的支配；在封建制发展的某个时期，地主还可以把农民随着土地出卖或赠予别人，只是没有任意杀死他们的权利。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劳动产品绝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交纳给地主。农民和奴隶不同，他们有着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自己的经济，他们可

以把交付地租之后所剩下的很少的劳动产品作为自己所有，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农民希望生产更多的东西，以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这就有了积极劳动、改进技术的兴趣。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力量。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农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和技术，如在金属冶铸，农田水利、蚕桑业，陶瓷业，煮盐业、酿造业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地主阶级利用人身依附关系（也叫经济以外的强制关系），对农民所进行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在封建剥削下，农民愈来愈贫困，破产，以至根本无力扩大生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来愈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因此就引起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冲击着日益衰朽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在农村中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又叫做自然经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逐渐分化出独立的手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日益增长，城乡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新市场的需要，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在这里，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对资本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却为饥寒所驱使，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曾经对生产力发展起过强大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发明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在工业中实现了一个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两个世纪内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封建社会的个体生产和自然经济，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人数甚少的资本家手里。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增长的趋势和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使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严重地破坏着社会生产力，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一小撮大资本家的手中，终于形成了垄断资本。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它操纵着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市场价格，从而引起了停滞和腐化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垄断组织不但没有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它们更加严重。作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为一体的政治资本的统治以及资本输出的结果，使单纯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叮在数以亿计的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寄生虫。为了瓜分和争夺殖民地，垄断组织还不惜一再把千百万人民投入世界大

战的血海。总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的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地区的胜利和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进一步走向崩溃，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不稳定性更为增长，生产无政府状态更为加深，经济危机的周期更加缩短，生产停滞、开工不足成了经常性的现象，国民经济军事化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小撮垄断组织同广大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者拼命使用各种手段，妄图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加紧扩军备战，到处玩弄战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这一切都表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发展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所有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平运动，等等，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伟大革命洪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企图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凭着其日益集中的经济势力，大大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把垄断组织力量和国家力量合为一体。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根据这种变化大肆喧嚷，硬说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已被“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代替。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建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在

客观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更成熟的物质条件，它本身决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由垄断组织代理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能是垄断资本的驯服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垄断资本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它决不能缓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只能使它们更加深刻化和尖锐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决不可能由它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注定了的。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胜利，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但在肯定这个一般的社会进程的时候，还应当估计到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或者在某一时期出现几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例如，旧中国没有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引起了我国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把革命的领导权坚决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因此在民主革命获得全国胜利后，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之后，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了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我国社会的巨大飞跃，并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四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个新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对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等个体经济——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才能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首先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对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排挤、没收的方式或者“赎买”的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并用，把它们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基地，个体生产者时刻向着贫富的两极分化。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所以只有实现了对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

销）、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一系列步骤；对个体手工业也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标志着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由此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论采取排挤、没收的办法还是“赎买”的办法，都是要使它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个体的农民和个体的手工业者虽然是私有者，但他们是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们采取剥夺的办法来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使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而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属于集体所有制，我国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的农村人民公社，也属于集体所有制。此外，在农村经济中，还存在附属子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小规模个人所有的家庭副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和助手。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比起集体所有制来，是高级的公有制，它是和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则不能作到这一点。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集体所有制是与农业、

手工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相适合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相脱离，而是直接结合起来，生产资料不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是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生产的目的、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等，都起了根本的变化。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劳动者不再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全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而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是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以前一切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特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反复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停滞，恰成鲜明的对照。

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开始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说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能够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提高。国家工业化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不断增强的保证。但是社会主义工业不能离开农业孤立地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出多少商品粮食和原料，取决于社会除了从事必要的农业以外，还能提供多少劳动力。正确地安排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促使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

我国人民正在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以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是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取得完全胜利和巩固起来的保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不等于说它和生产力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矛盾，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上还会不断地发生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性质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象资本主义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而是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不断地得到解决的。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由于公有化的水平不同，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和办法不同，因而存在着某些矛盾。在工作中，需要经常注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处理和解决，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矛盾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由于农民的生产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产品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时，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斯大林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

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般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将来还要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在国家所有制中，某些具体的关系，例如中央和地方在生产的管理体制上的关系，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经营范围划分等，也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助合作关系，这里不存在阶级社会里的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但这种互助合作关系，也是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工

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安排工农业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地安排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来加以调整，上面所说的在产品交换方面必须遵循等价的原则，也是调整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经常注意使脑力劳动者同工农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同时，在企业和行政工作方面适当地采取各种必要的调整措施。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通过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大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措施，对于调整和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保证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能够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能达到实行“按需分配”的水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才能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着正确实施这个原则，又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分配中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等）适时地予以解决。为了使工人和农民意识到必须把目前的、个人的利益和长远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必须对劳动人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和物质保证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中，经常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能使国家、

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利于生产的发展。

调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通过对生产力的诸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改进和提高，来加以实现。开展劳动竞赛，推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逐步实现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合理地配置生产力和合理地安排劳动力等等，对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那时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残余也消失了，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将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所代替，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飞跃，就将得到实现。

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的基本矛盾，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制约；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一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前面已经说过，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迟早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情况，而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但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它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由资本主义思想占着统治地位，从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生产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理想、法律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地建立起来的。例如，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相适应。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设施通常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或者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最有力，最广泛的传播。这保证了他们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

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不但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政治的制约，从属于政治。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出发就能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

展规律作出精确的科学的说明，就能够根据一定的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情况，来把握这个社会的全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定的上层建筑。任何经济基础以及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一切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一般社会”的抽象议论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这种抽象议论的实质就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性，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

现实存在的具体社会形态是复杂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都有着某一种生产关系占居主要的地位，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般的主要特征，也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里，还会存在着曾经孕育过这个社会形态的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也会出现即将产生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政治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物质前提，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又使这个社会形态表现出自己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期间。”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必须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即要首先找出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又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个社会内的旧制度的

残余或新制度的萌芽。具体地分析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情况，对于把握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经济基础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就产生了以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表现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与此相应，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包含着阶级对抗的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着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必然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当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

的独立性，各有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它们并不都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但是，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迟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则是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它又指出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产生，就是要为经济基础积极服务的，它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它为新的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当它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例如，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的，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先进的，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民主思想等），曾经对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为这种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统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等等）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极端反动的力量。

上层建筑是怎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样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呢？

上层建筑能够帮助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就在于：统治阶级要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更具体些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政权，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文化等机关，大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其它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以保证自己

的思想统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保证。反之，如果统治阶级不能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与教育文化机关的影响，来确立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那么，它就不能克服被统治者的反抗，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要动摇，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必将加速趋于崩溃。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斗争情形是密切联系着的。经济基础中存在着一定阶级的统治，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那么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就有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有着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对立。统治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及其思想影响，战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思想影响，它才能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相反地，如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能够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战胜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和思想影响，那就必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当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即使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只有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日益高涨，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并终于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取得统治地位和顺利地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才得到巩固。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

如果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如果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宣传还能够欺骗人民群众，那么，资产阶级就仍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暂时不至于崩溃。所以，要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广大劳动群众，发动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在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辩证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种谬论在否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的同时，还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引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结论：否认推翻旧的上层建筑的必要性，即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地、绝对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全的地方，总不可能立刻就充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的阶段，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某些局部的质变，经济基础中的这种变化，并不会立刻就在上层建筑里得到反映。这样，就会不断地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某些方面不适应的情形，使两者之间要经常发生某种矛盾。只有对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适当地加以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情况，才能够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

当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根本不相适应的时候，当经济基础已经濒于灭亡的绝境的时候，反动阶级在上层建筑方面的调整和修补，虽然能暂时延缓一下腐朽的经济基础的寿命，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挽救它的死亡。因为反动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只有根本摧毁反动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种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基本性质虽然不变，但发生过由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重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政治制度来说，主要是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这同当时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不能成为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就要把它的上层建筑加以若干改变，使之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时，资产阶级采取了更野蛮的形式来镇压愤怒的劳动人民，以求在风雨飘摇之中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从而延长其经济基础的寿命。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都露骨地或者隐蔽地趋向法西斯的统治方式的根本原因。

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这只是暂时的情形。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已走上发展的顶点，只有根本地变革生产关系，社会才能前进。垄断资产阶级的以法西斯统治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竭力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维护腐朽的经济基础。这种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变革经济基础的要求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矛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摧毁反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于一切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产生、形成以及两者的矛盾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对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制。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在这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无产阶级首先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求得经济上的解放，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由经济上的原因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集中的程度，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能从大

资产阶级的手里，把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接收过来，把它们改造成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从而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还没有形成，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居于领导地位，能够给无产阶级国家以强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日益巩固和逐步地完备起来。

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经过一个改造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其他的经济成分（主要是个体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步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以便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斗争，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经济方面有着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和斗争，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在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中，也就必然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总是要利用它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进行各种活动，力图动摇和破坏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借以阻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对资产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还必须继续进行政治

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保证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就不可能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来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

从多种经济成分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过程中，在经济上有着两种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政策正确，处理得当，资产阶级分子被大势所迫，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他们就不需要进行对抗的斗争，至于对一部分坚决抵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争不能不是对抗的。经济上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也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这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包含着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日趋完善，保证它能够充分适合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善于分析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的决定性胜利，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适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杠杆，而且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的工

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的来源之一，是它的民主集中制。它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着集中统一的领导，又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只有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地发展，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日益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和发挥着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它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起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党和国家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发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在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教育下，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的形成，促进着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加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以往的文化、教育组织活动的阶级内容和工作方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帮助它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它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在适合之中也还存在着不适合的方面，也就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某些矛盾。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一旦建立起来就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总不免在某些环节上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二，资产阶级

的政治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被消灭之后，也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存在，它们当然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它们的影响，也会造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缺陷。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虽然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有着不断的量的发展和某些部分的质变。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它的基础总是处于又适合又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发展的。

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和坏习惯的存在所引起的，人民大众同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人民中间由于受到某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影响而形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

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本身某些局部缺点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极其伟大、极其艰巨的崭新的事业，为着实现这个事业，人们必须在各方面积累经验；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经过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和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之前，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不免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人们能够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及时地纠正上层建筑中的某些局部缺点，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上述这些矛盾的不断解决，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断地互相适应和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国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接着在1957年又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还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中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样，就在上层建筑方面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健全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制定和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是在我国的条件下具体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结果。我们还将继续运用这些规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逐步

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创造条件，准备在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四 家庭、民族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特征，也规定着家庭和民族等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和社会共同体的特点。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在原始公社末期私有财产发生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个体家庭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最初的原始群中，由杂交发展为实行各种形式的群婚，逐渐形成了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母系氏族公社。这是由于早期氏族公社生产力稍有发展，男女在生产中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男子从事狩猎，妇女从事采集，初步种植植物），妇女的生产比较稳定可靠，并在原始公社生产中占居比较重要的地位等等原因而产生的。原始公社的生产由狩猎向畜牧和农业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主要由男子负担，于是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母系氏族公社便为父系氏族公社所代替，并逐渐出现了父系家长制的家庭。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力再向前发展，生产已有可能不依靠群体的共同劳动来进行，而由较小的个体单位来进行，同时，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要求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这样，就逐步地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在阶级社会里，是建立在男性支配和奴役女性的基础上的，这里的一夫一妻制的义务，实际上只是片面地要求女方遵守。掌握财产所有权的男子方面的多妻生活和社会上的卖淫制度，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制度经常的补充。这种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

庭形式，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必然的产物，是为私人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继承权服务的生活组织形式。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其自然基础，又以私有制为其经济基础。它既担负着繁衍后代的职能（对劳动者家庭来说，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职能），又是私有财产占有的单位。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它也是一个经济单位。个体生产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家庭是生产的单位。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都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进行生产，家庭就成为单纯的消费单位，而不再是生产的单位。工人的家庭不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或者是作为消费的单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只是提供剥削的源泉。由此可见，家庭的性质、职能，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家庭的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律观点，也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产生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家庭内的尊卑等次——父子、兄弟、夫妇的不同地位，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国法家规和道德观念。在封建家庭里，族权、父权、夫权控制着一切。农奴阶级的家庭，对于封建主阶级处于从属地位。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实质上是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原则”。在工人家庭中，由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把妇女吸引到生产劳动中，使妇女开始从宗法制度和家长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剥削制度的消灭和公有经济的日益发展，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妇女成为自由的、具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只有到了这个

时候，一夫一妻制对于男女双方都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制度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律观点。建立真正平等，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新家庭。

总之，作为社会的生活组织形式的家庭，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也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它同整个社会形态，首先是经济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它的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迟早都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家庭制度。在不同阶级间，家庭关系也有所不同。生活方式决定于生产方式，家庭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家庭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可以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中得到说明。

民族这一种社会共同体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密切的联系。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使人们打开各个地区闭关自守的界限，在广大的地域里结合为民族，这首先要各地区之间发展交换关系，扩大商品流通，使这些地域的居民之间形成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除此而外，要形成民族，还需要这样的条件：共同的语言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这样，民族这种社会现象，是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关系，又包括一定的思想关系的综合形态，但在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中，物质生活、经济关系则处于主导的地位，它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实质，决定着整个民族的根本特征。

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是两种类型的民族，它们有本质上不同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民族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思想感情，以至于不同的文化。在文化领域内，同一个资本主义民族里，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劳动人民的民族文化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决不会因为属于同一民族而有所减弱。不过，由于民族在生活习惯、思想传统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使得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某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共同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共同感情在一个民族受到外来的侵略时就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成为被压迫民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尽管如此，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不同的阶级在实际上仍然有着不同的态度，坚决反抗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是劳动者阶级，而剥削阶级则很容易趋向于妥协和投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作用，但是不论在压迫民族或者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总是夸大共同的民族感情，以此来抹煞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巩固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统治。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但造成了民族内部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造成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罪恶现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造成互相歧视、互相对立倾向，破坏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过程中，它成为民族侵略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方面要求重视民族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求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反对反动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成了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的社会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逐步得到改变，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经济根源，形成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以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民族，由于国内先进民族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可以超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高到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各民族的繁荣和兴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是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使世界各民族在乎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一个长久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逐步地达到民族界限的消亡。

由此可见，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归根到底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历史现象。

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东西。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都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人类最早时期——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免于饥饿和死亡。这时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从而也就没有任何阶级的存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促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各个氏族和家庭之间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便发展起来。氏族内部分化出了氏族显贵，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和其他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自己职位的方便，侵占一部分公共财产，并利用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发财致富，甚至形成了以战争为专业的集团。财产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发展，在氏族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剥削者，这就是最初的奴隶主。

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对象——奴隶，开始时是由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来充当的。战争和暴力对阶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加速和

加深了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战争和暴力不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掠夺不能创造财富，它只能把财产从一个所有者的手上转到另一个所有者的手上。把俘虏变为奴隶只有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可能。在社会生产力极低，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可供剥削的时候，俘虏通常都要被杀掉，只有在生产可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被用作被剥削的对象。使用奴隶的制度进一步发展以后，奴隶的来源就不再以战争的俘虏为限了。本部落里穷困的人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企图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都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过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里，各有两个基本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各基本阶级内部的各部分人之间还有某些具体区别，例如，封建主阶级中有贵族领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农奴中有依附于地主庄园的农奴和佃农的区别，等等。这些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各个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在各个阶级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例如，在奴隶制社会里，有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奴隶的从事劳动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个体劳动者。有些非基本的阶级属于旧生产方式的残余或新生产方式的萌芽。例如，在封建社会初期存在一些奴隶主和奴隶，在晚期出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阶级地位分别属于其所服务的阶级。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了。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对这个事实作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提出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社会集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主要地就是在经济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奴隶阶级、农奴阶级、无产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前一部分人就能够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实行经济上的统治，从而占有他们的劳动，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既然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就能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或者脱离社会的生产劳动，从事生产劳动以外的活动。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被剥削者不得不全力从事繁重的、折磨人的体力劳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以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的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取得它们所支配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截然不同。例如，

资本家能够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增殖其财富，工人只能获得勉强能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工资。

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对立也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但是，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特点，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它们的经济地位。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常常根本抹煞社会阶级的存在，有的虽然承认阶级的存在，但却歪曲阶级划分的原因。有的人杜撰出一些生物学的，种族的、心理方面的、个人能力方面的以及其他非经济的原因来解释社会阶级的划分，借以证明阶级的存在是永久的、合理的现象。有的人虽然接触到经济问题，但只是孤立地从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来解释阶级。例如，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组织论”者硬说阶级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职能不同而分为“组织者”和“执行者”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企图这样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资本家在社会生产中有着“组织者”的职能，因此就应该永远居于统治者、生产领导者的地位。其实这是把事情说颠倒了。事实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对社会生产有着组织者的职能，才在经济上占有统治者和领导者的地位，相反地，他们只是由于占有了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居于统治的地位，所以才成为生产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分配论”者则把阶级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其实，经济上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收入来源的不同决定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按照“分配论”者的说法，似乎只要把分配方式改变一下，无需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可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还常常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旧中国的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封建等级制度和阶级混为一谈，硬说中国只在古代社会有“阶级”（如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到了现代就没有什么阶级的区分了。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在于抹煞阶级的区分。其实，在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出现过的那种等级制度（如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的特点，主要是在法律上，道德上所规定的等级差别和一部分人的特权制度。但是等级不等于阶级，阶级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同一阶级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公、侯、伯、子、男），同一等级也可以包括不同的阶级（如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无产者、农民和城市贫民等），因此决不能把等级和阶级等同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在法律上取消了等级制度，但是阶级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主义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剥削阶级为着维护和加强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其剥削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最大限度的剥削是剥削阶级要求的一般的趋势），必然要用一切方法，首先是政治统治的方法，来压迫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能不起来进行斗争，不能不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个斗争总是对抗性的，它集中地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样的阶级斗争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会形成集中地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政治组织。这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是政党。政党是阶级中最积极的、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的斗争，最集中地表现了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就会发生最尖锐的阶级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想尽办法去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从来没有一个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建立和成长，才能使一种过了时的社会形态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仅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被剥削阶级为着反对统治阶级日益加强的压迫和剥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剥削阶级的统治，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奴隶的革命暴动，如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里，都不是和新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斗争中提出建立一个较进步的社会形态的纲领，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奴隶、农民的起义和他们的革命战争，对于破坏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总是要依靠或者利用农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在资本主

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跟过去的奴隶、农民不同，无产阶级是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而出现的先进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能够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的战斗纲领，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能够通过革命斗争使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得到解放。

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右翼社会党的领袖和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至抹煞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说什么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态，是互相残害，说什么只有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合作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中心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论调的基本错误，“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修正主义者以阶级合作和阶级利益调和的谬论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还努力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百般的粉饰，硬说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了。这些说教者在口头上反对阶级

斗争的存在，实际上却正是在全力帮助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阶级压迫。

阶级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能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脉搏。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现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了解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了解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了解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的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分清敌友，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和阶级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阶级，没有供一个阶级专门用来统治其他阶级的政权机构。这样的机构必须有一系列的暴力组织（武装部队、监狱、及其它强迫他人服从暴力的工具）作为自己的核心，必须有成批的为阶级统治服务的专职人员——官吏，才能保证真正具有统治的力量。这一切在原始社会里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不需要的。原始公社里为全体成员共同利益而服务的组织，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这些组织包括氏族、部落的议事会，和具有最高权力的氏族、部

落成员大会等等。氏族、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经过选举产生，并且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在这里，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也依靠族长和首领所享有的威信。原始社会不需要用特别的武装组织来维持社会内部秩序，仅仅在和其他部落发生冲突时，才由全体成员共同进行武装活动。

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为着保证对奴隶及其他劳动者的经济上的统治和剥削，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上的统治。奴隶主是少数人，而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不能不引起奴隶阶级的强烈的反抗，不能不引起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从奴隶制社会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着镇压奴隶的反抗，为着有可能压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强使他们遵循不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奴隶主就必须使用有组织的特别的暴力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奴隶主掌握了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掌握了对于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权，来保持为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是在阶级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表面上看来，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施行压迫的力量；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而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证他们能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的机构。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列宁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一整套的有组织的暴力机构。剥削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压制被剥削阶级，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这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的最基本的、主要的职能。国家除了这种对内的职能以外，还有对外的职能。剥削阶级的国家保卫本国的利益不受他国侵犯，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对外实行侵略，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国家机器中，军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历史上一切善于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人物和集团，没有不注重掌握军事力量的。随着国家的出现，出现了大规模的专门的武装部队。这种武装部队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和阶级的冲突，国家和国家的冲突，以至同一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都会发展为战争。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有时采取和平的手段，有时采取战争的手段，有时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战争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是为这阶级的政策服务的。在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以后，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战争时，根据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剥削阶级国家为掠夺其它国家人民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和为镇压本国人民革命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人民的革命战争和被侵略的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它也要进行暴力专政。不过，它的性质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本不同：它不是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及其他阶级的工具，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少数被推翻了的剥削者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一整套有组织的暴力机构，那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国家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对内职能，除了要镇压那些不甘心被打倒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外，还要组织人民群众全面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思想教育工作（包括对那些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剥削者的思想改造工作）。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需要，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时候，它还具有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职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并且在帝国主义如果一旦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就要用正义的自卫战争来消灭这种非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还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要支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要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或政权构成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存在着议会民主

制。为着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某一特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代则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真正的性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加以区别，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各种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问题直接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在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和“君权神授”等说法，假借所谓

“天命”或“上帝”的旨意，掩盖他们的阶级统治的实质。在中国古代也有与此相对立的，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认为最初的君主是杰出的人物，为人民办了好事，由人民拥戴而产生的。例如战国末期的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但韩非的这种说法也未能正确地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骚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说成是由于人们相互约定而形成的。这种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国家学说的，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政权的要求，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它的国家学说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反动的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自然学派，崇拜斯宾塞的反动的“社会有机论”，硬把生物的有机结构用来比拟人类的社会组织，企图以此来给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涂上一层“合理”的油彩。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认为，社会上的各种集团是由于这些或那些“心理刺激”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而国家就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调和者。至于社会学中的神学派，至今仍然胡说什么国家政权是从神那里产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脱离社会本身的物质条件，脱离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事实，来曲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本质。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资产阶级辩护士却把它说成是各阶级利益的“调节者”，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体现者。资产阶级在革命年代里，曾经举起“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地主的统治，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封建主义的国家比较起

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一种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它只不过是以雇佣奴隶制代替了农奴制；它也没有消灭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压迫和统治，而只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封建主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面，“民主”，“自由”对于劳动人民，都是骗人的空话。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平等”和“博爱”的。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总的趋势和特征。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整个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则已成为财政寡头追求最大利润的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随着垄断集团对国家机器控制的加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抛弃以往的虚伪民主的遮羞布，走上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者执行着最反动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执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动的军事官僚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了空前庞大的地步。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规定了许多新的法规，在实际上剥夺了美国宪法所承认的那些公民权利；按照史密斯法或麦卡伦一伍德法，可以任意逮捕那些根据美国刑法不能构成任何罪行的人。逮捕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拥护自由、民主、和平。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好象是垄断资本集团服从于某种超阶级的国家。因此，他们大肆宣扬：只要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断施加压力，争取在这种国家机构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就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公开背叛。

三 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社会发展起着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它是阶级斗争历史上的“最后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其它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所不能实现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这个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由于：它是同大生产相联系的劳动者阶级，是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不象小生产者那样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日益壮大，它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它在革命斗争中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形式和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解放一切劳动者，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养成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使他们有可能在斗争中锻炼成极坚强的战斗队伍。由于无产阶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只有它才能把一切被

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领导他们去摧毁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

无产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贪得无厌，无止境地追逐利润，永远不能满足发财致富的欲望，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这个本性驱使它以无情的手段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奴役的枷锁一开始就套在无产阶级颈上，而且越来越沉重。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枷锁，不得不进行反抗，而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这种反抗总是进行残酷的镇压。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只是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处于自发的阶段。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工会。经济斗争有许多形式，罢工是经济斗争最重要的手段。

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而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斗争。例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法国里昂的织工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都是无产阶级早期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和其它职工组织，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的出现，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先锋队伍——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便从“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便从自发的阶段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成为无产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的中心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包括政治罢工、示威游行，议会斗争、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等等。政治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列宁在驳斥自由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在经济斗争中，只是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无产者反对自己的剥削者，而政治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保卫的是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政治斗争所追求的则是整个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经济斗争不管取得多大的胜利，它最多只能暂时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能根本取消这种剥削；只能暂时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不能根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只能起“止痛剂”的作用，而不能“铲除病根”。只有彻底进行政治斗争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使一切劳动人民得到解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可以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工人得以生存下去，而且还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通过经济斗争，可以使无产阶级受到锻炼，逐步使他们提高觉悟，为进一步走上政治斗争阶段准备条件。在无产阶级已将政治斗争提到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的时候，经济斗争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无产阶级如果局限于经济斗争，那就只能养成分工联主义的意识，只看到自己的职业利益。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才能使广大的无产者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而且在他们中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用一切方法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奴役。因此，无产阶级为着政治斗争的胜利，又必须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方面的斗争。思想斗争的任务在于揭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欺骗宣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帮助他们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思想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出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把斗争引向胜利。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最狡猾的形式；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领导。它的作用就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者起着帝国主义和右翼社会党所不能起的反动作用。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种斗争形式，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而政治斗争是主要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工人运动中的一切经济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企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永远局限在经

济斗争范围内，使政治斗争永远局限于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的范围内，永远不去触犯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要能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组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它能够结合每一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为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为全体党员所自觉遵守的纪律，它能够经常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自己在工作和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它把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它能够和本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应该领导，而且能够领导其余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它能够实现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坚强的领导，把这个斗争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一切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政党，是有根本区别的。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社会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上层分子是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

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四 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必将导致阶级的消灭。马克思说：“（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般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阶级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出现了使阶级消灭终于不可避免的物质前提了。恩格斯说：“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可能性，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占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对于教育和精神指导的垄断，成为经济、政治和知识的发展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妨碍了生产力的充分利用，妨碍了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侵略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加深，毁灭

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过去阶级的产生曾经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一样，阶级的消灭也终于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阶级的产生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的必经途径。和剥削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永远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己本身），并使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归于消亡。

列宁指出：“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消灭阶级，不但要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而且要改造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这个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比消灭剥削阶级更为复杂的。无产阶级的政权要通过说服教育和示范的办法，把广大生产者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消灭阶级，就要消灭剥削制度赖以滋生的经济基础。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阶级剥削制度就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就不再存在。但是，阶级斗争现象还会存

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阶级斗争还不会熄灭。残余的和新生的剥削分子、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破坏、危害和削弱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还会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为反对和克服上述现象而进行的斗争都具有阶级内容。

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消灭阶级对抗，而且还要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一方面，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为这些差别的消失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些工作做好了，上述的三个差别都消失了，这样，才有可能进入彻底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国家也就随之失去作用，国家的消亡和阶级的消灭一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在阶级消灭以后，政党也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消亡。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和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国家的消亡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国家消亡问题上的反动谬论，阐明了国家消亡的条件。国内反动派的彻底消灭和阶级的消灭，是国家对内职能消亡的必要前提；消灭了帝国主义，铲除了爆发战争的根源，才能消灭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时国家的对外职

能才会消亡。在国内外反动派没有消灭和阶级没有消灭以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但不应该消灭，而且还应该加强，否则就不能对付这些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就不能粉碎有时还会特别增强起来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捣乱、破坏活动，不能制止或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所以，国家的国内镇压职能和反对国外反动派的职能，只能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完全归于消亡。任何脱离上述条件而空谈国家消亡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恰恰是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为了在将来完全消灭阶级和使国家归于消亡，目前还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正是革命的辩证法。

第十四章 社会革命

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具有暂时的、历史的性质，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将为另外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一切社会形态的更替都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彻底实现。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

一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通过革命的变革

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的规律。社会革命要变革经济制度，即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而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顺利地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变旧的上层建筑，使它成为与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

在阶级社会，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就这一点来说，政治革命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反动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之下，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革命任务，通常都不得不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说：“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一系列的起义，内战，粉碎了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才取得了彻底胜利。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经过了1776—1781年的独立战争，而且经过了1861—1865年反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德国、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使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走着改良的道路，但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并且在新旧阶级取得妥协之前，仍然经过了或大或小的国内战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武装起义而取得的，并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干涉的战争，才得到巩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二十二年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先进思想与革命理论的创立和传播，对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革命理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揭露旧制度的腐朽性，造成社会舆论；夺取政权，建立革命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上更高的阶段。

革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形成了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的时候，即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才会爆发革命。列宁说：“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

利。”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有客观的革命形势以外，还需要主观条件的成熟，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形成足以摧毁反动政权的强大革命力量。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来，主观条件成熟的集中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只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失时机地领导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使革命走向胜利。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过程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革命的变革越是深刻，人民群众的发动就越是广泛同时，人民群众发动越广泛，革命的改造也就越深刻。劳动群众积极参加了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革命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次法国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发动最广泛、最充分，他们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涌现出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总尽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右翼社会党人都企图以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们认为，只有和平的进化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途径，而革命则似乎倒是“反常现象”，应当用所谓“和平抵抗”来代替阶级斗争，用所谓“和平斗争”、“民主手段”来代替革命行动。改良主义者力图用小恩小惠来分裂工人队伍，欺骗工人

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阶级斗争。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的工具。列宁曾经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右翼社会党人正是提出某些资产阶级所容许的、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例如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和收入，财产的“公平”分配等等），作为他们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纲领，借以反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拒绝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但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改良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日常的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副产品。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谁如果只把改良当作自己的唯一任务，就必然要堕落到充当“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

无产阶级把改良作为积聚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

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革命，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由于革命所解决的社会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所以这些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同，革命的对象，动力也各有不同。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决定于社会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而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在旧经济制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要反对革命的，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这个经济制度中处于被压迫和

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他们就会起来革命，或赞成和拥护革命，就成为或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要正确地指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对社会经济的状况和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确定当前社会的性质。并以此为根据，确定革命的性质，规定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提出指导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仍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仍然是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将消灭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再不会有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了。

二 民主主义革命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阶段。这时，在一些封建地主阶级还占着统治地位的国家，还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时期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七—十九世纪西欧各国的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

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展开，资产阶级趋向于和封建势力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营垒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十七——十九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的那种积极作用，它已不能够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联合农民，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破坏沙皇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真正胜利。

在指导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且对无产阶级也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需要革命进行得不坚决、不彻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需要把革命进行得十分彻底，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然以有利于农民和无产者的形式来实现，必然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些思想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残酷压迫，阻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为了便利其无止境的掠夺，帝国主义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大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

政权垄断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终结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必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却不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罪行，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人民结成战斗的同盟。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就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分不开的。苏联的支援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鼓励了战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每一斗争，都给予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更加便利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濒临全面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了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外，还有许多国家由于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取得了政治独立或部分独立地位，成立了民族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获得独立，是不甘心的。美帝国主义力图采取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来实行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

并取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新殖民主义不是用赤裸裸的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而是以“援助”为钓饵，通过经济控制。政治收买和军事条约的束缚，达到旧殖民主义所要达到的同一目的。新殖民主义在表面上允许被侵略国家保有形式上的“独立”，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它比旧殖民主义更为危险。被压迫民族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就是一种资本输出，这种“援助”是为了加强对受援国的侵略、剥削和控制，攫取最高利润，是为了使受援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已经取得独立和正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为了保持斗争的成果，进一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在和帝国主义者所采取的各种侵略手段作坚决的斗争。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中国人民革命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是，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中国革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获得了新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

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代表它们利益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组成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全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买办资本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有矛盾，因而他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对买办资本的革命运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理人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具

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当着无产阶级发动了广大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时，他们就会害怕革命，甚至有时还可能叛变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程度，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决于阶级矛盾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改造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的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农村环境，如何把党的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的战斗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包括贫农和中农的广大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对农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的工作，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领导农民革命，就是要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的问题上曾经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但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反对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有联合包括中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必要，结果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

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势力，孤立反动势力，无产阶级还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一方面要在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革命；如果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不注意联合他们，就会犯“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不在斗争中坚决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反对工农群众和反对共产党的倾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就会犯右的错误。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错误的。

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但是，无产阶级也可以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之中的某些势力，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和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共同抗日这一点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同时和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反复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包括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势力的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积极地发展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只有充分发展这个主体的力量，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阻止中间力量的动摇，把它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不断地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

式，而武装斗争常常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对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武装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可能经过合法的斗争取得真正的解放。为着使民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必须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时候，建立一支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善于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以及这支军队所借以活动的根据地，并使敌人统治地区的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

“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把这三个方面概括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创造了从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标志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代理人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集中到打碎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的国家这一点上。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

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使革命由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处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以往的一切革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却是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创造条件，使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为了实现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变革，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发动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斗争中，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之后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的历史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实现。后来，他们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爆发，但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更尖锐的性质。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矛盾就极端尖锐化起来，其中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个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从而使得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时机，突破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但是各国发生革命的先后，并不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革命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最成熟的。在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超额利润，并且培植了“工人贵族”，分裂工人运动，革命力量的成熟就受到了阻碍。确定某一个国家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成熟，不能仅仅看这个国家内部的发展程度，还应看它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是不是在这里已经摇摇欲坠。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产生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抹煞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宣传所谓“超帝国主义”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从而实际上否认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他们硬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无产阶级还没有造就足够的管理国家的干部的时候，便不能夺取政权。列宁痛斥了这些谬论。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其在条件成熟时能够主动地去冲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致消极地坐待革命的“总爆发”。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是适合于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官僚军事机构，而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是夺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不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马克思强调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集中到这样一点上：“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般都要经过武装斗争，但是并不排斥在特定的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即使是革命和平发展，也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人民最有利的。只要有这样的可能，不管它实现的机会是怎样微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重视的。从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这个客观事实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在阶级力量形成某种特殊对比的情况下出现的。共产党人一旦遇有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时，总是紧紧地抓住它，努力利用它来实现革命的目的，但同时又要准备，一旦这个时机逝去了，就仍然要用武装斗争来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存在着“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巩固起来，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时，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

埃”的口号，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不久以后反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组织起来，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匪军用暴力镇压了工人士兵群众的和平示威。于是列宁宣布，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俄国工人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有了很大发展，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准备，所以战争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某一个资本主义小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包围之中，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反动统治阶级仍然可能采取“困兽犹斗”的行动，因此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估计到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这些集团是

不是采取暴力。”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在于资产阶级和反动统治者能不能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既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

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一般地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积聚力量的过程，不能设想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轻率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在积蓄力量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包括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

现阶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形成了极其尖锐的对立。这种情况就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实现一些民主任务的号召下来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为实现民主任务而进行斗争，这不但适合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能加强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的威望。但是，争取民主任务的斗争，还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斗争，这些任务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觉悟的无产阶级决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把民主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改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的真正出路。

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进一步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彻底消灭阶级，并进到无阶级的社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列宁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之所以成为可耻的叛徒，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无耻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散布种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就彻底地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独裁”，是“极权主义”。针对着反动派的攻击，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于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同反动派对于人民的反革命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因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才能够真正得到翻身的机会。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

的人民，不能坚持这一项对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放弃或放松了自己的革命专政，反动派就会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受天大的灾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的巴黎公社，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阶级敌人过分仁慈，对反动势力没有实行彻底的镇压。1956年，丧失了政权达十一年之久的匈牙利资产阶级反动派，曾经一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实行反革命的复辟，也是由于过去匈牙利没有充分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国内反革命势力予以足够的打击。所以，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的反动派还存在，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镇压反动派的一切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不仅千方百计图谋复辟，而且还有力量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因为剥削阶级被打倒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留着某些财产，保留着某种知识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剥削阶级的政治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绝不甘心社会主义的胜利，它们时刻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破坏，颠覆活动，与国内反动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是互相支持的。由于上述这些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能不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必不可少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领导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巩固联盟，也就没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农两个阶级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动政权，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也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除了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外，还存在着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一个联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进步人士等等，它团结了劳动人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力量，动员他们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事业服务，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斗的联盟。专政是对付敌人，对付国内外反动派的武器。对人民自己，对联盟内部，则不能实行专政，而只能实行民主。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必须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对反动剥削阶级的专政、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另一方面又对于广大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它能够充分发挥千百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社会进步力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能够战胜一切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由于它是对绝大多数人，对劳动群众和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们的民主，所以它标志着民

主、自由的空前巨大的扩展。它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证一切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证除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民享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在中国，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宗教集团都享有民主权利，他们的代表人物还参加了政权机构。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被公认为领导党，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为了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有力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强人民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人民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

一般地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

去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逐步摆脱贫资产阶级的影响，摆脱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的影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种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国人民内部，长期行之有效。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方面——对反动派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处理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在执行国家的任务时，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样就能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力量，对敌人的破坏活动给予最有力的打击，就能最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这两类矛盾，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

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权的力量，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经济战线上，工人阶级国家的任务，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着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党和国家还必须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把全国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并造就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国内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国际上还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援。

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总会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每个国家又必须遵循着一条共同的道路。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这就是：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和复辟活动，保卫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生

活水平，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这些基本经验，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的斗争实践，更加发扬光大。

四 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任务是要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达到这个总的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连续的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各个革命阶段的不同的性质加以明确的区别，在进行前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时，不过早地执行下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又力求使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紧密地连接起来，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根据客观可能积极地为下一个革命阶段准备条件，以便在前一个阶段的斗争胜利后，使革命不停顿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在某些国家里，它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对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方向，以便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后，立即就开始斗争去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要求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他们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使革命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理论的正确性。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曾经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过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不断革命论，在本来互相衔接的民主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之间，隔上一道资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否认这两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否认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有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前途。他们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革命胜利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中国还出现过“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都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过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批判了和纠正了上述两种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下一个革命过程。……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坚持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不容许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由无产阶级坚决掌握领导权，以便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

为了正确地把握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在思想工作上，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把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而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成熟、更发展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

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掌握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而不要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看不到前一个过程和后一个过程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革命应该停顿在它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上，不再继续前进。“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革命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因而混淆不同质的发展阶段，企图超越某些必经的过程，而跳入那些目前还不能达到的阶段。认识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对待各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克服和防止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才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推向前进。

第十五章 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为了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仅要正确了解经济、政治的现象，而且要正确了解社会意识的现象，正确了解社会意识及其形式的特点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的认识。社会意识的内容，不管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甚至是纯粹出自幻想的，都是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可以从社会存在找到它的来源。社会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

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存在、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发展的水平不同，社会意识也就不同。社会意识的发展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绝对独立的。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意识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原始公社全体成员所有，人们共同生产，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于集体。当时人们的这种生活状况，不可能产生私有观念，而只能有朴素的、原始的集体观念。随着私有制、剥削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就产生了私有观念和发财致富的欲望，并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意识的对立。随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最后消灭，公有制经济的高度发展，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就逐渐成为全民的意识。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阶级社会，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等不同的社会形态里，社会意识也各不

相同。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没有抽象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社会意识。

一定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观点的总和，构成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超阶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不同，在同一个社会关系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习惯风尚和道德观念，会有不同的以至根本相反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对立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精神上也必然居于统治地位，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他们提出意识形态超阶级、无党性的观点。这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他们需要在劳动人民面前掩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本性。其实，无党性的说法正是资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经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全民的思想，他们自认为是全人类利益的捍卫者。这些口号在当时的的确曾经起过动员群众摧毁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现实表明，“自

由、平等、博爱”这种思想所要求的实质上是剥削和竞争的自由，是虚伪的形式上的平等，是掩盖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纯粹金钱关系和相互倾轧的空话。因此，“自由、平等、博爱”从一开始就不超阶级的东西，而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成为反动的社会势力，它们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化。它们的思想代表所说的“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意识形态，他们所说的“全民”利益只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公然申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党性的，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无产阶级不需要掩盖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真正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它将是全人类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肯定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某一种社会思想和理论，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根本改变之后，还可能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落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与落后的社会意识相反，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起指导和动员的作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杰出的启蒙主义者，以特殊的方式预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十九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已做了某些臆测，虽然带有极大的幻想的性质，但也具有一

定的合理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全面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的前景作了科学的预见。这些都表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旧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不可能在它的物质基础消灭之后长久地存在下去，新的理论只有在社会存在的发展能够提出新的任务时，才可能产生。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都同先前这方面的思想成果有着继承的关系。每一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在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时，都要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把它们加以改造发展，使社会文化向前推进一步。每一民族的文化，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春秋战国儒家传统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和继承了古罗马基督教运动传统的欧洲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各有着显然不同的特色。但是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文化遗产的继承不会是无条件地原封不动的接受，而是对以前文化遗产的加工改造。怎样进行加工改造，摈弃哪些，发展哪些，这从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情况和思想家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继承了的是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则继承了历史上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优秀文化成果的集大成，它绝不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以外产生的，而是人类过去伟大思想发展的继续。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不估计这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企图单纯地用社会经济条件来说明社会意识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各种社会意识的特点。这也表现了社会意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不了解欧洲中世纪宗教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那个时代哲学发展和斗争的特点；脱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无法从说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不估计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影响，就不能完全了解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的许多特点；在今天，不看到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革命文艺发展的规律。但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同政治法律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历史上有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思想领域内却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如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十九世纪末经济落后的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产生这些思想的国家里的阶级矛盾在当时特别尖锐，使它们成了革命的中心。十八世纪末法国是欧洲革命的中心，十九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十九世纪末革命中心又转移到了俄国。这种思想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经济矛盾的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经济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所以能够出现先进的思想意识，仍然是以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为前提的。假如德国和俄国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达到一定的水平，没有相当成长了的无产阶级，那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产生是不可能的。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坚持唯物的、辩证的观点，既反对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的唯心主义，又反对否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它的能动作用的机械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决不是说社会意识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消极的结果。相反地，社会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

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也就是说，取决于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还是落后势力的要求。先进的社会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它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先进阶级，先进的社会势力的精神武器。它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发挥伟大的动员、组织和改造的作用，就能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与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反，反动的社会意识形态同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它反映着腐朽制度和反动阶级的要求，歪曲现实，散布各种要劳动人民安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迷信说教，因而起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反动的思想、理论决不能长期地蒙蔽广大人民，阻挡先进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解放作用，它最终必将被先进思想战胜，必将随着旧制度的消灭而逐步归于灭亡。

各种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不同。它们的作用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先进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受到狭隘的阶级眼界的限制，都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反映当代历史发展的前进趋势，不能全面地认识社会运动各方

面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性。它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能帮助先进阶级动员人民起来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但终归不能成为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精神武器。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完全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掌握最广大的群众，最广泛、最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能够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这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变化相适应，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改变了在旧社会的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由于政治地位的根本改变和经济上的解放，他们更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越来越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以能够发挥特别巨大的威力，还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着国家机器、生产资料等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物质手段。

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的存在，都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是共产党的经常任务。

二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社会意识有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具体形式。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是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和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同时，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一）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

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经济基础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它们同阶级的利害关系最为密切。

历史事实表明，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除了表现为理论形式以外，还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法令当中。它直接维护着现存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统治。

被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这种思想是为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服务的。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虽然不能形成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的理论，但代表农民利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提出了一些和封建统治根本对立的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如东晋的鲍敬言就提出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无君论”思想，我国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出现过平均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对农民起义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随着无产阶级走上阶级斗争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的政治思

想、法律思想也产生了，它起着动员劳动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重大作用。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时，它才能取得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能够指导劳动人民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这种根本改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成为现实。

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思想上层建筑中阶级性最强烈最鲜明的部分，它们比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政治。法律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着主导的地位，它给予其他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以重大的影响。

（二）道德

道德在历史上比法产生要早，在原始社会里就已经存在。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规范和法不同，它不是由国家强行制定和强制执行的，而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人们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法还要广泛，它对人们行动的支配，有时显然是法所不能做到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行为，就是道德观念起作用的表现。但是，道德没有法的强制作用，要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单靠道德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法的作用。道德和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的。道德和政治、法一样，也是生产关系的比较直接的反映，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法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引起道德的变化。道德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是比较直接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理论都是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来考察道德规范的。它们或者认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是上帝规定的，或者认为道德规范是合乎人类不变的自然本质的，就是说道德规范是永恒不变的。例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所说的道，实质上包括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封建的道德规范。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正象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法说成是永恒的、合乎人性的一样，把道德也说成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性。它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荣誉和耻辱等等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没有的。任何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道德规范具有阶级性。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在原始社会里，虽然还没有形成道德理论，但人们却有着公共的道德标准。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第一次感到公社成员的义务和权利的统一，这时，最初的道德观念就产生了。在氏族和部落内部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爱同胞、服从集体决议、为同胞复仇和为部落英勇作战的义务，这都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在某一时期，杀死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战争俘虏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允许的。这样的道德标准，是由生产关系的公有性质和生产力的水平极其低下所决定的。

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社会中就没有统一的道德，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把体力劳动看作是最大的耻辱，把买卖、鞭打，甚至屠杀奴隶的行为看成是合乎道德的，把奴隶的逃亡和暴动看成是极不道德的；与此相反，要求解放的奴隶则把逃亡和暴动看成是合乎道德的。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西方是基督教的道德，在中国则是封建礼教。所谓“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被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说成是天经地义、永世不变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是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受着封建道德的严重压迫和束缚，同时农民在劳动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例如勤劳，勇敢，艰苦朴素、济困扶危、互助友爱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它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曾经以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名义，推动人们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为基础的个人发财致富的要求的反映。它在结束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之后，就只是要求把个人的利益建筑在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之上，它表现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等等。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道德标准。马克思说得好，资产阶级可以这样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这是对资产阶级拜金主义道德的极深刻的揭露。目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腐朽相适应，现代资产阶级在道德上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穷奢极欲、虚伪、奸诈、诲淫、海盗、谋杀等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它甚至公开提倡非道德论。

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完全否认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客观标准，它以个人或一定集团的情绪、愿望、爱好和利害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实际上是抹杀道德的非道德论，是为着替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作辩护，企图对帝国主义的罪行作出“合乎道德”的解释。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以自己的道德观念评价别人的行为。但是，道德是有客观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

马克思主义肯定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不否认道德本身的发展和继承。先进的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念总包含有一定的积极内容，这些内容被以后的先进阶级所继承和发展。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品质，是在他们世世代代的劳动和解放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规律对人们行动的决定作用，诬蔑马克思主义否认对人们行为作道德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们有意志的绝对自由，却承认人们有意志的相对自由，就是说在客观规律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范围内，对几个可能的行动，有主动地选择其中某个行动的一定的自由。人们的这种选择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因此，人们对其行为是要负道德责任的。坚贞

不屈的革命者和变节分子，革命叛徒在道德品格上截然相反，这是因为他们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列宁说：“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

马克思主义绝不排除对人的道德评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观，它要求客观地历史地去评价人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过去劳动人民中所表现的勤劳、朴素、勇敢、友爱互助等美德，对一切献身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业、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关怀人民的优秀人物的道德行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充分的肯定。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些美德，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共产主义的道德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它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高尚的道德。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道德观根本相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道德只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所具有的品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共产主义道德将逐步地

成为多数人的行为的准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道德就会成为全民的道德。

培养全体人民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彻底克服剥削阶级的道德观点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对广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同剥削阶级的道德影响进行坚决的不断的斗争。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巨大的作用；对于将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三）科学和哲学

科学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应人们的实践的需要、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是以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由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运动形式，而每一门科学通常都只是研究世界发展过程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因此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科学部门，但归纳起来不外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科学的发展表现着特别明显的继承性。后一代人的科学研究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不能把现代科学同过去的研究成果割裂开来。天文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占星术，化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炼金术和炼丹术，近代原子论也和古代的原子假说有联系。不仅自然科学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批判地

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注意的合理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不同。自然科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经验的总结，并且是为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

自然科学反映的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任何阶级的人从事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规律，如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规律，可以为各阶级的人们所发现、掌握和利用。因此，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怎样被利用，为什么目的服务，这是由掌握它的阶级所决定的。从而，它的发展也就受着阶级利害的严重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用自然科学来提高生产技术，使自然科学成为增加利润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用来发展生产、为人民谋福利和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由于没有资产阶级那种狭隘利益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技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要受到哲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

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在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须有某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之相适应。这种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唯心主义观点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例如，在欧洲，神学和经院哲学曾经严重地阻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唯物主义哲学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伟大的解放作用，尽管当时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但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相适应，因为那时自然科学主要还是搜集材料、积累材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的阶段。近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深刻地揭示了各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要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近代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则起着促进作用。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身，虽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是同阶级利益、阶级斗争直接联系着的，因此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就必然以阶级利益为转移。社会科学是人们对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而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某一剥削阶级当它还是进步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它的利益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一般地还没有抵触，能够多少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它也受到它的阶级私利的限制。当它取得统治地位走向反动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取得政权以后，“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

讨让位于辩护的坏心恶意。”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是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它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是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但是，哲学对现实的反映更概括、更具有普遍性。哲学在全部意识形态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一切意识形态都不可能离开哲学思想的影响，不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相联系，就要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相联系。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有强烈阶级性的，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彻底粉碎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任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要逐步地清除资产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因为这种偏见妨碍人们对于事物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但是，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偏见的问题同学术性质的是非之争混淆起来。人类对于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要经过艰苦的摸索过程，许多问题不经过反复的讨论，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学术性的是非之争，并不一定都受到阶级观点的影响。有些不同的意见是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面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同和认识的深度不同而引起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由于研究的传统不同，观察的自然界的方面不同，研究资料的来源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这种不同的学派的争论，就更不能看作是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的争论。对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必须容许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学派展开充分的争论，才能有利于认识客观真理的目的，才能有利于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正是根据科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

（四）艺术

艺术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过，艺术不是象科学那样用概念和逻辑的体系来反映世界，也不是象道德那样用道德规范来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评价人们的行为，而是通过生动、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

艺术的产生和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是分不开的。它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出现了。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艺术逐渐成为精神活动的一种独特的形式。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等形式。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艺术理论家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精神本性”，或起源于动物界的“自然美”，如鸟类的啼啭，美丽的羽毛和动物的嬉戏等等。这些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社会劳动。原始人最初的歌唱是他们的劳动“号子”。原始艺术中的舞蹈、壁画、雕像等，是原始部落劳动活动的再现。艺术在原始部落中不过是生产实践的美化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艺术和生产的联系复杂起来了，往往不再是直接的联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的是社会经济制度、阶级斗争、政治直接影响着艺术的性质及其发展，宗教、道德、科学、哲学等意识形态也给予艺术的发展以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反映阶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的要求的，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各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阶级斗争，不仅要有政治、法律思想等武器，而且还要有艺术这种武器。艺术是有阶级性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先进阶级的艺术和反动阶级的艺术。先进阶级的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中的进步要求，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它或者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和黑暗，鼓舞人民群众对旧制度的反抗；或者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高尚的品德；或者唤起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先进阶级的艺术，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表达着健康的、高尚的情感。它通过对活生生的形象的描绘，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规律性；并以它的感染力培养人们的良好品质，鼓舞人们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同时使人们得到健康的娱乐和美的享受。反动阶级的艺术则起着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它鼓吹敌视社会进步、敌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使人们消极颓废、精神堕落，追求低级趣味。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片阴暗、颓废、没落的景象。在那里，进步的文学艺术受到迫害，反动的文学艺术到处泛滥。最典型的是美国，诲淫诲盗的影片和文艺作品、荒诞的抽象主义绘画广为流行，甚至把黑猩猩奉为“画家”。这一切腐朽透顶的“艺术”，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现代资产阶级用“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与阶级斗争无关”等谬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中国过去“新月派”的代表梁实秋等反动文人宣扬“文学一概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文学家不会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会有为某阶级利益的成见”等谬论。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跟着资产阶级大讲其抽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否认艺术的阶级性。他们把人类心理的某些共同属性片面夸大，硬说“共同的人性”、“人类之爱”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否认阶级社会里“人性”的阶级本质和艺术的阶级本质。他们的说教在实际上は力图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同志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同样的，在阶级社会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人类之爱”，人的爱和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地主、资本家不可能爱农民、工人，而农民、工人也不可能爱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资本家。“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艺术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艺术有阶级性，这是就艺术的一般的社会本质来说的，但是艺术本身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性。每一个时代的好艺术作品，都能够用生动的、典型的形象集中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矛盾关系，用精炼的形式和技巧，鲜明地表现出某种思想和情感，使千百年以后的人们还能从这些作品里面认识到当时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逼真的面貌，还能深深地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感染。它的美的感染力在长久以后还能发生作用，它的进步的思想内容还要被后代的艺术家加以继承和发展，它的形式和技巧还要成为后代的艺术创作的借鉴。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许多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为艺术家所借鉴，为党和国家所珍视。但是，任何杰出的古典艺术都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且有不少作品是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这些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是为了创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文艺。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无产阶级文艺是教育和鼓舞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武器，是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武器，是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即使是有相当高的艺术性，也不是好的作品。政治上愈反动的作品，艺术性愈高就愈有害，愈应加以排斥。而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无论其政治思想内容怎样正确，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批评有

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又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无产阶级文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同时又要求在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等等方面开辟最多样、最宽广、最富有创造性的新天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十分广泛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要求丰富多彩。因此，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多样性，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客观需要。艺术风格、形式、体裁、题材的自由发展，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作家和广大群众的艺术才能的必要条件。只有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繁荣和发展。

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需要的，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五）宗教

宗教也是现实世界在人们主观意识里的一种反映，不过，它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唯心主义不能科学地解释宗教的起源和实质。旧唯物主义者对宗教作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若干有科学意义的见解。但是，他们把宗教产生的原因，或者归结为群众的愚昧无知和僧侣的欺骗（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或者归结为人和人之间的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如费尔巴哈），这些都是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从主观上来找宗教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宗教并不是社会的永恒现象。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产生的。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法抵抗，对自然界千变万化的现象不能理解，对自己身体构造和梦境无法说明。这样，人们便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形成了最初的宗教。

当社会出现了阶级对立，人们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又加上了社会力量的压迫。这种社会的压迫往往比洪水猛兽、瘟疫等等自然灾害更为惨重。劳动人民为了摆脱这种压迫和剥削，在历史上曾经进行过无数的艰巨斗争。但是以往劳动人民的斗争，都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摆脱了旧的枷锁而又带上了新的枷锁。因此，人们对社会压迫和对自然压迫一样，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以捉摸。列宁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统治阶级总是极力地培植，支持和利用宗教，把它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精神武器。

人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氏族社会的较早时期，存在着图腾崇拜（崇拜一定的动物和植物等等）。随着氏族公社联合为部落，就出现了部落的神，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到了奴隶制社会，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从部落神中分出了至高无上的神，其余的神都从属于它。人间有了等级，神也就有了等级。单一的，全能的神，只是伴随着君主专制的大国出现而创造出来的。一神教的出现是和地上的君主专制的产生相适应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在西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基督教就发生了相应的改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虽然有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宗教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消灭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破产、失业，饥饿和贫困，时刻袭击着人们，从无产者到资本家都充满着恐惧心理，这就是宗教继续存在的条件。

由此可见，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在历史上，奴隶和农民有时也曾利用宗教来联合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斗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宗教终归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工具。宗教使劳动群众迷信神灵，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宗教要人们顺从和忍耐，把希望寄托在天国和来世，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这种精神麻醉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是很有利的。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反动资产阶级和以往一切统治阶级一样，把宗教作为维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到处维护反动制度。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在他的“圣谕”中宣布：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制度，而“工人应毫无怨尤地接受天意恩赐给他的地位”。天主教会的中心——梵蒂冈，是一个拥有大量资本和许多分支机构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政治组织。它曾经公开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仍然为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服务。梵蒂冈和其他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宗教组织一起，都充当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精神棍棒。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利用宗教奴役本国人民，而且以宗教为幌子进行罪恶的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每年都要化大批美金，雇用“传教士”渗入别的国家，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我国解放前后，美帝国主义曾通过梵蒂冈和美国教会控制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人民革命进行过疯狂的破坏活动。

宗教和唯心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不同的是，宗教采取感性的，通俗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则采用理论的，逻辑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是精制了的宗教，而宗教是最粗鲁，最拙劣的唯心主义。

科学和唯物主义是宗教的死敌。科学的每一发现，都打击着宗教迷信。科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和所谓“神的意志”的宗教教义根本对立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许多坚持真理的科学家遭到教会的残酷迫害，甚至被活活地烧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力图把科学和宗教教义“调和起来”，并且用各种办法迫害正直的科学家。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遭到过和科学家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宗教斗争。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范缜等等，很早就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驳斥了对于鬼神的迷信。

十八世纪的西欧唯物主义者，如霍尔巴哈，狄得罗等人都是战斗无神论的坚强战士，他们在反宗教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它揭示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指出了宗教的反动作用和克服人们的宗教偏见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个历史现象，随着宗教产生的根源的消失，宗教将必然消亡。对广大人民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宗教的消亡需要首先根本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普及，无神论越来越多地占领阵地。但是，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以后，人类才能最终地从宗教偏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摧毁了宗教的社会基础，大部分劳动者摆脱了宗教偏见。但是宗教的长期影响在某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没有最后消灭，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然灾害有时还能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水平还没有得到极大提高，所以宗教偏见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仍然存在。克服宗教偏见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任务。

克服人们的宗教偏见是一个耐心教育的过程，要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

而不发，跃如也。’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马克思主义者要宣传无神论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和在政治上联合宗教教徒为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在政治上排斥宗教徒，同样，也不能因为后者而放弃无神论的宣传，调和宗教和科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政治的分野提到首位，不能把宗教的分野提到首位，否则就会使工人阶级中的某些人和民主派忽视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无产阶级政党要耐心地努力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克服群众中的宗教偏见首先是要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

我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是允许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而是要求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给予坚决彻底的打击。我国的这一宗教政策得到爱国的宗教徒的热烈拥护。

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宣传无神论，向宗教迷信作坚决的思想斗争。随着社会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教育的深入，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必将逐步消亡。

第十六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出发，肯定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同时承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也有重大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和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对于正确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它有时表现为唯意志论，把个别人物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认为少数英雄人物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历史的进程；而人民群众则不过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是“惰性的物质”，是这些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它有时又表现为宿命论，认为决定社会历史的是神秘的精神力量，如“上帝”、“天命”、“宇宙精神”等。在宿命论者看来，英雄人物是“上帝”命令的执行者或“宇宙精神”的体现者，而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从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

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从根本上说来，都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治国”就是“牧民”，即把人民群众看作应该是被他们任意驱使的牛羊。中国

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说：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

十九世纪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说过：“照我看来，世界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实质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伟大人物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露骨地表示了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现代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家们，极力喧嚷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抹煞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妄图破坏被压迫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信心，瓦解他们的斗志。

与历史唯心主义根本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样一个结论。这是唯一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观点。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例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国王、贵族和僧侣，则是人民的敌人。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

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但是，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不首先取得生活资料，就不可能从事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劳动者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但创造出物质资料，而且不断地改善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而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又是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使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起来，反动统治阶级还能够阻碍着社会的前进速度，就是在这种时候，推动社会前进和最后决定历史进程的也还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活动。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唯一源泉。

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在于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作了概括和总结。科学的理论把人们的实践经验概括成系统的规律知识，文艺作品以集中的，典型的形式表现着人民的实际生活。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提高和推进的作用。掌握前人已经达到的文化科学的成就（这些成就也是在过去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能够创造出新的成果的重要条件。但是，他们的创造和发明的最后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作基础，就不可能有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是直接依据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素材、并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和提高而成的。例如，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楚辞，就是吸收了当时大量的民歌民谣写成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都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精华发展而成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我国古代的著名的《本草》，就是由历代的药物学家、医学家，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农业科学方面汉代的《汜胜之书》、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等，也是直接总结了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和饲养经验编写成的。

历史唯心主义者，特别否认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们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没有高尚理想和智慧”，“智力有限”的、“低贱的物质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由于剥削阶级对科学文化的垄断，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受到摧残和压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劳动群众中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人类最初关于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等的知识，丰富多彩的建筑、雕刻和绘画，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等等，无一不是劳动人民的天才创造。历代有许多闻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出身于劳动人民。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近代欧美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现电的作用的佛兰克林，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等的爱迪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兹根，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罗蒙诺索夫，世界大文豪高尔基等，他们本人都出身于劳动者。

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那些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阶段，有的剥削阶级和集团虽然也能参加这个斗争，有时甚至还是这个斗争的领导者，但是，劳动人民终究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当奴隶制度已经过时，封建制度已经萌芽的时候，是奴隶的英勇斗争动摇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的基础，没有他们的斗争，封建制度就不可能战胜奴隶制度。当封建制度已经过时，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兴起的时候，起来结束封建制度的决定力量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制度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地惧怕群众，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个原理，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是普遍适用的，决不会有例外。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时刻想发动核武器战争，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及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其他战争狂人进行斗争，核战争是可能防止的；即使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竟敢发动核战争，其最后结果也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彻底灭亡。归根到底，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核武器，不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而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作用发挥的情况是有所区别的。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他们经过斗争，虽然能够动摇以至于摧毁当时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上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但斗争的果实，总是落到剥削阶级手里。奴隶暴动的结果是封建主代替奴隶主成为统治阶

级；农民起义最后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取得统治的阶级却是资产阶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型的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不但能够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能够领导一切劳动人民，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遭受种种压迫，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受到了压抑和限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全体劳动群众得到了解放，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下，深知是在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和所有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而进行斗争。这就使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并具有全新的意义。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创造性和积极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说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事实正是这样。解放以后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的面貌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自觉性组织起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着伟大的创造作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地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 and 文化生活的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

志昂扬，意气风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昂首阔步地前进。

二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前提之下，承认杰出人物的活动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绝对对立起来，否认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是不对的。

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上一节已经提到了，下面着重说明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表明，当先进阶级及劳动人民为了解决新的历史任务和衰朽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时，必然会产生出一些领导运动的杰出的领袖，政治家和思想家。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杰出人物也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他们自己却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比其他人看得较高较远，他们的思想能够及时地集中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当时条件下人们的某些进步愿望和要求。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和前进能够起重大的作用。

任何一个时代，人民群众要对腐朽的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斗争，都必须在一定的共同思想指导之下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有了共同思想的联系和鼓舞，有了相当的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就能形成一个伟大

的势力，就能打败那些腐朽的统治者。人民群众的斗争所需要的这种共同思想总是由某些杰出的人物首先提出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总是由少数人发起和组织的，杰出人物则起了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所出现的农民运动领袖，如陈胜、吴广、樊崇、张角、窦建德、黄巢、宋江、方腊、李白成，洪秀全等，都对组织农民运动，指挥农民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推动我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杰出的不朽的作用。在我国周秦以后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如、周公、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清代康熙皇帝等，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进趋势，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某种方面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说的杰出人物，是指的对于社会发展起某种进步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社会的先进势力的代表。至于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和集团的首领，当然不能算杰出人物。反动阶级首领是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势力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活动可以使历史发展进程多少延缓下来，但这种局面决不会支撑很久，迟早会被人民群众的力量所打破。

不同的杰出人物，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相同，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地说，在客观方面，杰出人物的作用的限度，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在主观方面，某个杰出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反映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他们个人

的品质和意志的强弱，也对他们所起作用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的杰出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和领袖，杰出人物的面貌是由阶级所决定的。他们对阶级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决定阶级的面貌。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正确程度，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取决于他们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过去历史上所出现的杰出人物，由于受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够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某些剥削阶级的杰出人物，为了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统治地位，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与群众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他们又为了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压抑群众，和群众逐步疏远，最后走到完全脱离群众，以至走到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反动立场上。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领袖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强烈要求，但也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散漫性，甚至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给予农民的某些影响。他们虽然能够率领广大农民起来暴动，严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力所受的束缚，因而多少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不能领导农民求得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过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根本不同，他们所代表的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锻炼起来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才能站在彻底革命的立场，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给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只有他们才能把终生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最高职责，一贯地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站在人民群

众之中，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他们站在革命的集体之中，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正确地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因此，他们能够成为团结全体劳动人民的核心。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以往任何杰出人物都远不能比拟的。斯大林曾经把列宁和彼得大帝作了一个比较：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则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无产阶级的许多杰出的革命领袖是最坚强、最勇敢的革命家和组织家，同时又是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总结科学的全部成果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并不断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给了工人阶级以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不能在没有革命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发性的斗争达到彻底解放自己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在工人群众中间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人物对革命事业都起了重大作用。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几十年来，他始终站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前列，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

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表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毛泽东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从自己的实践斗争中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对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无限热爱，是从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和他们的切身经历中自然形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反对和厌弃资产阶级的庸俗的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把个别人物神化，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反对低估和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的观点是一种自发论的观点，这也是极其有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威信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建筑在同广大人民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的。革命领袖的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人民的威信，它是人民群众的最宝贵的财富。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热爱和个人迷信根本不同，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爱护在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

三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和争取，才能获得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

度就无法推翻，新的社会制度也无法建立，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总是把人民群众的首创作用放在首要地位，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大胆地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他们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热情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愿望和意志集中起来，以明确积极的方针，实事求是地领导着群众前进。

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从事反封建的斗争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曾不得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他们所许可的范围，触犯到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待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第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二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三种是反革命的态度。

资产阶级革命家竭力夸大群众运动中某些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缺点，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非难革命的群众运动。与此根本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相信群众有能力克服运动中的偏差和缺点，并积极地帮助群众克服这些偏差和

缺点，而克服偏差和缺点的正确办法也是由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而得到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由两种根本相对立的世界观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是由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出发的，也就是由唯物史观决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是从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出发的，也就是由唯心史观决定的。

群众运动必须和革命政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人民群众包含着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部分。必须使全体群众跟着先进部分的方向走，而不是跟着落后部分的方向走，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事业才不会走错路，才有可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间的先进部分的人所组成的战斗队伍，它的中央领导机关是由最有斗争经验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自己国家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人物和干部集团所组成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这样的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政党及其领袖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说：“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同志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近百年来，从鸦片战争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

革命斗争，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了中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要实现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外，还要正确地处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党和群众的关系、党领导群众的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规定，把它们概括起来，通俗地称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正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群众运动健康发展的保证。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首先在群众中进行一点一滴的、细致的、艰苦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工作作基础，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础上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这就要求，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反对任何恩赐和代替群众斗争的错误观点；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反对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反对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的错误观点；要求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看作党的根本利益，反对把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对立起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要求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反对轻视群众，不相信群众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的错误观点。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先作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作群众的先生。只有作群众的好学生，才能作群众的好先生。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地全面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在任何工作中，必须把一般的号召和个别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是，如果只有一般号召，领导人员不找一个地区或单位具体地直接地组织和从事所号召的工作，就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号召的内容和用最具有说服力的生动事例去动员群众响应号召，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

在任何工作中，还必须形成一个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组成的领导骨干，并把这些领导骨干的活动和广大群众的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应用上述的方法时，领导者必须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正确领导的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都必须以这个根本方法为基础。例如，在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从许多个别的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又拿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去付诸实践，从而检验和丰富一般意见，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深刻地全面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它正确地处理了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实际工作和斗争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公式变成行动的指南，这些公式就是：认识运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再由理性更深刻地抓住感性，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无限上升的过程。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具体工作方法熔为一休的杰出典范。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群众观点是统一的，是不容分割的。没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单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而无正确的领导方法，也不能把工作做好。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既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是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必然要犯错误。

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正确关系，体现了党以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对于群众的领导作用。党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时候，对人民群众中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经常要应用马克思

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群众中最革命最积极的阶级和阶层作为斗争的主要依靠，同时坚持团结中间的阶级和阶层，努力争取落后的阶级和阶层。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事业中，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精神。每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动员、鼓舞了我国亿万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它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形成了巨大无比的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就能把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引向胜利。